



2011

第二期

# 闻 道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级硕士研究生班主办

靡石有初，绳志有终。  
冯绍雷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与“闻道”学子共勉

林礼云  
2011年3月10日

封面题词：冯绍雷

《闻道》编辑部

主编：李沛

执行主编：田艺伟

副主编：孙超 李荟 王娟 程艳阳

编辑：陈洁琼 李秋悦 李婷 刘佳琪 柳文  
纪媛楠 马新伟 秦珊珊 张元

封面设计：何晴倩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  
理科大楼A座四楼

邮编：200062

电子邮箱：ggwendao@gmail.com

闻道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级硕士研究生班 主办  
2011年6月 第2期  
(双月刊)



注：未获本刊事先许可，任何  
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本刊内容

## 主编的话

春天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季节，也是一个生长的季节，更是一个变化的季节。在这个不平凡的季节里总是有那么多的变幻。

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这无疑是一个变动的时节。始于突尼斯的中东北非风云继续变幻，在这个季节尤其引人注目。而利比亚的局势，更是扣人心弦。对于这些变局，各方众说纷纭。然而，利比亚硝烟正浓之际，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已悄然飘入人间。日本地震与海啸带来的不仅仅是震撼，而且让我们在核泄漏与核扩散的阴影下，体会到全球化的另一番含义……还有种种的国际变局，无法一一历数，但是此时此刻的世界让我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变动”二字的含义。

将视野转到中国本身，同样给予我们变化的感受。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也看到京沪高铁如中国经济般风驰电掣的奔驰在这片九州大地之上。同时，带给我们更多视角冲击的还有外交风云的变幻。在半岛战争的阴霾刚刚消散之际，朝鲜领导人到访中国，格外吸引我们的眼球。此事未平，南海风云又起：越南在南海的实弹军演，突发征兵令；菲律宾将南海更名，出动海军拆除中国在南海部分岛礁的标志；而美国在南海的介入也若隐若现……种种局势令我们心弦紧扣。

而小小的国关院也在这个季节有了不少变化。关于课改，同学和老师有话说，我们在一起进行了探讨。在华师大 60 年校庆之际，国关院成立了校友会。学术讲座、国际会议，在这小小的学院中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凡此种种都昭示着学院的朝气与活力！

本期《闻道》将给您展示一幅变化的图景。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姜洪教授走过不平凡的人生变化之路，领略教授对事物的不同解读；您也可以看到从转型去解读国际关系的视角；您还可以看到从网络分析的角度去解读国家关系；您更能领略到，同学们对于利比亚局势这一热点话题的解读。同时，您还可以细细品读同学们的所感所悟，点滴感慨。在这个 2010 级同学们共同坚守的畅所欲言的平台上，我们在展示自我！我们在变化中成长！

那么，就让我们在“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时节飘然而至之际，回味“儿童放学归来早，忙乘东风放纸鸢”的季节已悄然过去后带给我们的思考，领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的变幻吧！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班

## 目录

<b>主编的话</b> .....	I
<b>学人访谈</b> .....	1
读书滋味长——专访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姜洪.....	1
<b>国关论道</b> .....	6
能源禀赋与转型国家经济分析——以俄、印尼为案例的研究.....	6
未完成的“革命”——麦克福尔眼中“俄罗斯”.....	18
社会网络、结构分析与国际关系 ——评《国家的网络：国际网络的演变、结构和影响，1816-2001》.....	32
<b>时事焦点</b> .....	44
利比亚问题.....	44
<b>他山之石头</b> .....	49
阿红译者宝典.....	49
<b>品茗闻道</b> .....	57
一个女性视角下的中国复兴——陈衡哲和她的《西洋史》.....	57
<b>百花齐放</b> .....	61
手捧“蔷薇”，抒写一心的爱恋.....	61
南开梦里赋南开.....	61



---

心痛因不舍，江湖终无奈.....	63
永远的毛瑟.....	65
中国是否适合造航母? .....	66
关于养生的一些鄙见.....	69
<b>院系来音.....</b>	<b>72</b>
国关院举办校友会成立大会 各地校友欢聚一堂.....	72
《闻道》编辑部主办师生课改论坛.....	73
首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征稿通知.....	74
<b>注释体例.....</b>	<b>77</b>
国际关系论文注释体例.....	77
<b>征稿启事.....</b>	<b>83</b>



## 读书滋味长

——专访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姜洪

**【人物简介】**姜洪，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曾任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长，国家审计署社会保障审计司司长等职。

曾主持和参与过多项国家级重点科研课题，并多次获奖。其中主持了《2000年我国劳动就业的预测与对策》（六五国家重点课题）；参与主持《200年的中国》之《200年中国的人口与就业》分报告（六五国家重点项目）；参与主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研究》（七五国家重点课题）；主持中国人民银行93—95年度的全国金融重点课题（共计80余项课题）（八五期间）；参与主持国家行政学院课题《我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研究》；主持国家行政学院课题《中外干部培训体制比较研究》。其中，他参与并主持分报告的《2000年的中国》课题研究总报告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劳动就业》研究报告获中国社科院二等奖，《我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研究》获国家行政学院2009年特等奖，《中外干部培训体制比较研究》获中组部2009年优秀奖。

独著、编著学术著作12部，译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中国企业的正当行为》、《利益主体：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层结构》、《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利益主体问题》、《马克思在晚年放弃了“亚细亚”概念了吗——论马克思“亚细亚”概念的两重性》、《中国经济学未来大厦的特征》、《“新权威”论争的意义与不足》、《中度通货膨胀已经出现、须当即采取有力措施》、《解决与当前资金紧张的两点建议》、《论中国国民经济中货币—信用含量的高速增长》、《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对专业银行商业化进程中问题的分析》、《准确把握中央的“一保一控”的方针，保持当前国民经济的增长势头》等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提出的思想和论点也为最终的实践所验证。

**《问道》编辑部记者（以下简称“《问道》”）：**姜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您曾经在北京大学求学，在北大的大学生活给了您什么样的感触呢？

**姜洪老师（以下简称“姜”）：**北大有一个湖叫做未名湖，校园内还有一座未名塔，后来得知“未名”塔得名为“博雅”塔。这给了我很多感慨，两个“未名”总是给人有很多想象空间，这种感觉是胜于言传的。“未名”的名字对人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尽管“博

雅”很有韵味，但还是没有“未名”那样有魅力，它意味着知识就像那浩瀚的海洋等待学子去探索、开发，也是我对北大最美好的

遐想。其实你们还忽略了一点，我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过研究生，这样人大也是我的母校，风格与北大迥然不同。提到人大，我可以想到延安的宝塔山、革命传统、马克思主义……因此这两所大学给了我有力的精神支撑。

**《问道》：**我们听说您还曾是厉以宁先



生的学生，您能简单和我们谈谈他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姜：**我在北大求学期间厉以宁先生还是个年轻教师，所以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互相也都熟悉，他的博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他的故事我也知道不少。他曾要我持续关注一个西方或大经济学家，不断的理解、评介与翻译，这是做学问的捷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按照他说的去做，但我至今仍认为这个方法不失为是做研究、做学问的好方法。

**《问道》：**您对马克思主义有所研究，您是否也在关注它？

**姜：**的确，我现在就在为国关院的研究生讲这门课。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深刻、最丰富完整的体系。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是确立世界观和社会进步观念的最直接的桥梁和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学者而言有一种特殊的作用，我在求学的时候读了很多马克思的书，虽然现在不时兴读马列原著了，但我仍然觉得读马列的原著是人获得智慧，获得启迪的非常有效的途径。当然，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的时间等原因，通读马列全集不一定适合每个人，但是我觉得读一点经典著作是非常好的。

**《问道》：**您觉得马列经典对于指导我们的现代生活有什么作用吗？

**姜：**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教给我们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具体的结论，如果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会使我们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力大大提高，使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不是具体的结论，个别具体的结论我们恰恰还要加以改正，或者说赋予时代的特点，但是其方法论和基本的框架对我们依然有效。

**《问道》：**那您如何看待当今中国一部

分大学生对马列主义等政治课的排斥情绪呢？

**姜：**我觉得这需要做到两个方面：首先，年轻人需要沉下心来，不要急于追求所谓的“热点”，对做学问更应该如此；另外我们要尊重中国的近现代的传统，中国的近现代传统不是虚空的，国家之所以将马克思作为指导思想并不是某个人的想法，历史的形成是沉重的，而且是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还有一方面，我认为主管部门应该反思中国的政治教育，政治课需要大规模地改进，不能将其教条化，不能将其和当前的政治口号完全绑在一起，要保持一定张力。课堂上所讲的不一定每一句话都是直接论证现实所发生的情境，应该通过所学的课程得到一些想法，甚至提出问题，对现行的某些政策提出质疑。这并非政治教育的失败，保持张力的意思是我可以对政策进行批评，但是我还是很爱这个党，很爱这个国家，很爱马克思主义。如果这个都不被允许的话，那就不用上这门课，直接喊口号就行了。所以我们的政治教育课需要改进。

**《问道》：**这是我听到过的对这种现象最有思想的解读了。姜老师，我们得知您承担了许多的课题和项目，请问这些课题给了您什么感触？

**姜：**我确实承担过许多国家重点课题，这些重点课题对我而言是第三所大学，在中国的社会科学而言，北大和人大都不能替代我对国家重点课题所得到的教育与培训，正是在参与国家重点课题中，我才对中国的现实有了深刻的了解。如果说在北大和人大我学到的主要是理论的话，那么在参与课题就是对我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很好的锻炼。因为这些课题都是国家最急于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也不能照搬教科书，而是需要我们开动脑筋，把问题一一解决并得出新的结论，这些结论还要让政府部



门觉得可行。这对你的知识储备和感悟力是巨大的考验，也对我应对现实问题能力有很大的提升。

**《问道》：**我们作为国关院的研究生，有的也正在承担一些课题的写作任务，您认为研究生参与科研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姜：**我觉得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参与重大课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也参与过这些工作。我虽然从 1983 年才正式参与国家重点课题《劳动就业预测与对策》，但我早在研究生时期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而且这个问题与实际相联系的。其实我所学专业是世界经济，在那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们，我们便开始了这项研究。后来我们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系，他们觉得很有意义，便拨给我们经费。我提出了在当时很震动、耸人听闻的观点，即“降低妇女的就业率”，迄今为止依然存在争议。但我们也是出于一种“仁爱之心”，其实我指的是一些重体力劳动，你们想想，当时的重体力劳动部门比如煤矿中，女性从事搬运等工作，非常艰苦。当时我们已经预测到中国的就业问题会很严重，面临供大于求的局面，我们提出的一系列总体的解决办法中，有一条就是适当降低妇女的就业率。提出来之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问道》：**现在有一本书叫《中国震撼》，引起了高校广泛的讨论，大部分学生认为中国崛起是积极、和平的崛起，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崛起这个现象的？

**姜：**我在上次一个演讲中说，我不太喜欢“崛起”这个词，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自我的一个表述，相当于我经常给大家举例子说，现在有些用语有些主客观不分，不能说“我对你表示亲切的慰问”。我觉得这个词不当，因为亲切不亲切是别人看的，比如说“姜老师，你很亲切”是你们说的，我不

能说我很亲切。有人经常说“我对大家表示亲切的慰问”，实际上这个一个病句。但是我注意到现在似乎有所解决。中国也是这样，你说你自己“崛起”，这个本身就有“亲切慰问”的意思。这就相当于说我们在内心里面可能觉得这个世界体系，最好是中国第一，可能我们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是你要这样想是要有一个反身原则。人类与动物一个本质区别就是人他可以反躬自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觉得你可以为龙头，但是反过来人家说崛起你高兴吗？比如说现在，北朝鲜、南朝鲜、日本或者我们周边的国家说我们在崛起，印度在崛起。你肯定要警惕。所以不要这样讲，要平和对待，还要释放掉我们以往的屈辱史。尽管我们 1840 年来有一段屈辱史，但是不能因此就变成一个见人都要吵架的样子。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我们有 5000 年文明史，并不输给任何人，因此我们讲我们高速成长，这个就已经够了。不要再加一些东西，就像我们的足球赢了，我们的排球赢了就雪了国耻，这种说法是很天真的。特别是学国际关系的研究生和一般的宣传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容忍、允许、包容一些人出于某种想法讲一讲，但是这个既不能成为我们知识界的主流，也不能让它影响我们的对外政策。其实说得难听一点，这是带有一种弱势沙文主义的特点。强势沙文主义是令人反感的，也是令人不愉快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相信，世界一切不分种族不分民族都是平等的、都是爱好和平的。

**《问道》：**在国开行在进行的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实践您刚才所说的理念？

**姜：**国开行在国家走出去战略方面是担当重要的责任，也有很多职能。你们知道，金融是综合服务的部门，金融服务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企业和其他经济部门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率。所以开行在这方面是



自我认识是到位的。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开行现在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都派出了自己的工作组，并且我们对外金融合作的步伐非常之大，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所谓两位数就是百分之二十、三十这样一个增长速度。我们从五年前还是一个一二百亿规模，截止到今年一季度已经达到了1400亿美元的规模。今后我们的目标可能要在短期内要实现5000亿的目标。所以，这个事业是朝气蓬勃。

**《问道》：**您能不能透露一下：由于中国的投资方向是新兴国家，它们政治都不是很稳定。开行有没有大致统计过由于这些国家政治不稳定，我国造成的损失大致是多少？

**姜：**开行是力避风险的金融机构，所以对风险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这方面的审查制度复杂得难以想象。因此它的结果是到现在为止，国开行在外面的对外损失非常之小，像有几个热点国家出事情，国开行恰恰没有在里面。当然这不意味着从国家的角度来说，风险控制就不重要了。国开行是国家的一个部门，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这个仍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现在面对这种海外的风险，我们似乎还没有想成熟，还一时没有很有效的思路和举措。我们应该正在长跑中。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过在世界这么大的范围内主动去投资，去做海外的发展。如果说有的话，我们最强盛的时候也是在周边国家，和我们接壤的国家。这种跨境的发展从来没有过，因此我们现在没有完全想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是总体的“走出去”的战略，而不是搞“单打一”，我们产权的制度在海外以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维度在海外体现地很充分，这一点我们实际上是有缺位的。另外我们的外交怎么和我们民间的经济活动相配合，这个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在很多人的眼里面，国家等于政府，

政府等于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等于外交部门代表机构，完全划等号，这个概念一轮一轮地缩小，使我们无法行动。实际上，国家是很大的一个概念，广义地说，我们是一国两制，两岸三地都是中国。而且国有的概念不能与国家相比较，国家里面包含着许多成分。所以我们国家的对外战略是非常大的概念，不能够把它变成部门化、机构化。所以控制风险地思路一定要多方面，不能变成外交风险。

**《问道》：**您能不能结合您的工作经历，您觉得我们研究生在这个时候应该积累哪个方面的能力？您对我们有哪些期望？

**姜：**这么短的时间说这么短的话是比较难的。我记得我在念研究生的时候，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这个人上大学的时候如果不是一个具有逆反精神的人，这个人可能就缺乏创造力”，“如果他四十岁还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就缺乏理性”。我借用他的话，不是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我觉得人的一种思想状态要同他的年龄相匹配，现在研究生的年龄也是基本上二十多岁，应该是理想主义的年龄。这个时候现实的事情或者说世俗的问题不要想得过多，虽然你很现实，但是可能影响你的创造力，影响你的未来飞行的高度。这时候我觉得充满了理想主义、甚至有一点浪漫主义，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我认为是很好的。等到你年龄比较大的时候，你回首往事时就会想“我们当时还那么的天真”。这是很好的；如果三十年以后你回想你二十岁时候，发现那时候就很世故，就说明世界对你来说已经终结了，这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如果我说一个期望的话，就是希望我们国关院的同学现在还是要充满理想。

**《问道》：**学习国际关系有没有统一的标准？

**姜：**孔夫子学生三千，杰出者七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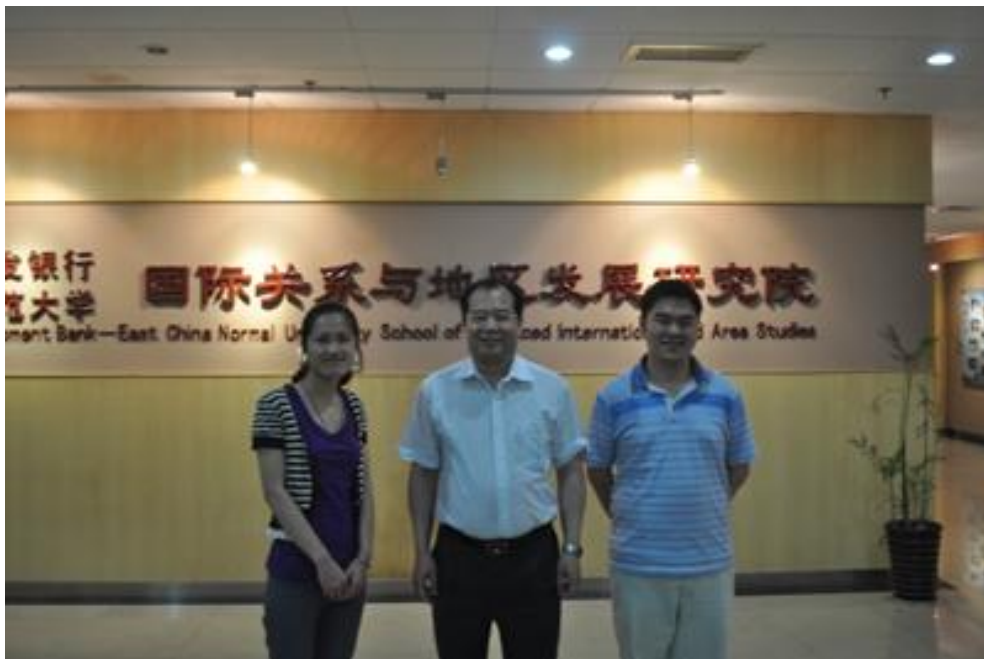




各有各的特点。未来国关院学生的走向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提炼共性的东西。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知识、技能，这个可能还是看家的本事，还是要多学一点，像外语、国关史、历史、世界史、经济地理，基础肯定要打好；除此之外，要多读经典著作，这是获得智慧力量的捷径。共性的东西基础的知识技能，看家的东西多学一点：如英语，经济地理和国际关系史；除此之外，如果能够认真读很好的书、经典著作，可能是一个人获得知识，获得力量的捷

径。如果进入到工作岗位后，快节奏的生活就使你很难用心来读书，更不要提那些大部头的著作了。大部头有的时候不见得马上有用，但是它的精神力量会影响你的一生，对你的境界会有很大提升。所以，如果要我说希望的话，就是希望国关院每个同学都能列出十本重要的、在世界上产生意义的著作来阅读。如果能把这个活动开展下去，我觉得效果会非常好。

《闻道》：十分感谢姜老师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



采访结束后，姜洪老师与《闻道》编辑部记者留影

（责任编辑：孙超、李荟、王娟）





## 能源禀赋与转型国家经济分析

### ——以俄、印尼为案例的研究

李沛\*

**【内容提要】**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关乎这些国家的转型过程,因而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作为地区性大国,俄罗斯与印尼同时也是能源资源与能源出口大国。两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对于地区的稳定具有重大影响。而“资源诅咒”理论认为,资源丰裕的国家不能够利用资源禀赋优势实现本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基于此,本文对俄罗斯与印度尼西亚的能源经济模式进行分析研究,就两国是否陷入“资源诅咒”进行探讨。在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俄罗斯能源经济的发展使其陷入了“资源诅咒”,而印尼却避免了“诅咒”。在对比分析这一现象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如何限制“资源诅咒”的建议。

**【关键词】**资源诅咒 能源禀赋 转型国家 俄罗斯 印尼

## 一、引言

长期以来,学界都普遍认为,自然资源禀赋较为丰裕的国家,往往蕴含着更大的发展潜力。但是,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有一些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却令人失望,丰裕的自然资源反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探究原因时,他们提出了“资源诅咒”这一命题<sup>1</sup>。认为对于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资源的丰裕并不总是有利的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条件,“资源优势”有可能将经济扭曲到使优势变成事实上是诅咒的程度<sup>2</sup>。对于“资源诅咒”产生机制的论述虽各有不同,<sup>3</sup>但其中主要的观点就是:能源等资源产品的出口,带来了巨大的外汇收入,引起了一国货币汇率的上涨,同

\* 李沛,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sup>1</sup> “资源诅咒”这一概念被认为最早由理查德·奥蒂(Richard M. Auty)在1993年提出,可见:Paul Stevens,“resource impact: A curse or a Blessing?”, Paper for a literature survey, Scotland, UK: University of Dundee, 25th March 2003, p. 5.

<sup>2</sup> Richard M. Auty,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London: Routledge, 1993, the front page.

<sup>3</sup> 关于“资源诅咒”的论述可见: Jeffrey D. Sachs and Andrew M. Warner, “Sources of Slow Growth in African Economies”,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Vol.6, No.3, December 1997, pp. 335-376; Jeffrey D. Sachs and Andrew M. Warner,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Revised Version” Mimeo, Harvard University, November 1997; Jeffrey D. Sachs and Andrew M. Warner, “Natural Resou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5, 2001, pp. 827-838; Michael L. Ros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source Curse”,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2, January 1999, pp. 297-322; Richard M. Auty,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London: Routledge, 1993; Richard M. Auty, “Industrial Policy, Sectoral Maturation, and Postwar Economic Growth in Brazil: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Economic Geography*, Vol. 71, No. 3, Jul 1995, pp. 257-272; Richard M. Aut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source-driven growth”,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5, Issue.4-6, 2001, pp. 839-846.



时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一是导致本国制造业与资源部门相比竞争力的下降，形成资源部门对制造业等非资源部门的“挤出”效应。接着而来的是为满足本国的消费需求，转而进口制造业产品，最终造成本国制造业的毁灭性后果；二是使本国满足于提供初级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造成了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导致产业结构初级化；三是由于资源价格的不稳定性，造成了本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也使政府无法制定长期有效的经济规划。这些效应的综合作用最后造成了一国经济无法长期稳定的增长。

转型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处在激烈的变动之中，其经济的增长关乎国家转型的进程。因而，探究资源禀赋丰裕的转型国家能否克服“资源诅咒”，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尤为重要。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义，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地点的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sup>1</sup>能源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和物质财富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由于其重大的经济价值，能源禀赋状况与出口量往往是一国资源禀赋的重要构成部分与衡量指标。因此本文将能源资源禀赋作为衡量资源丰裕度的指标。<sup>2</sup>而俄罗斯和印尼都是两个地区性的能源禀赋与出口大国，两国在转型过程中能源经济的发展不仅影响到两国及所在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而且由于两国的经济转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而尤其值得研究。基于此，本文对两国能源经济的发展是否使本国经济的增长陷入“资源诅咒”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克服“资源诅咒”的相关措施。这不仅对于我们认识和克服两国能源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而且对于转型国家如何克服“资源诅咒”也具有借鉴意义。

## 二、能源出口影响分析

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都是重要的能源生产与出口大国，两国的能源出口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尤其是能源出口对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经济的长期增长所带来的影响如何，是分析两国是否陷入“资源诅咒”的主要考量因素。因而，本文在此对两国的这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以求更好的进一步进行分析。

### （一）俄罗斯能源出口影响分析

#### 1. 能源出口情况

转型以来，能源出口在俄罗斯的出口贸易与 GDP 增长中都占据重要地位，造成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出口能源和原材料为主导。就俄矿物产品（包含油气等能源产品）的出口总值来看（见图表 1），在转型后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2008 年经济危机打击使得 2009 年出口有所下降）。就出口结构来看，矿物产品在俄出口贸易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份额（见图表 1）。而能源产业部门在矿物出口中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份额，仅石油、天然气部门来看，199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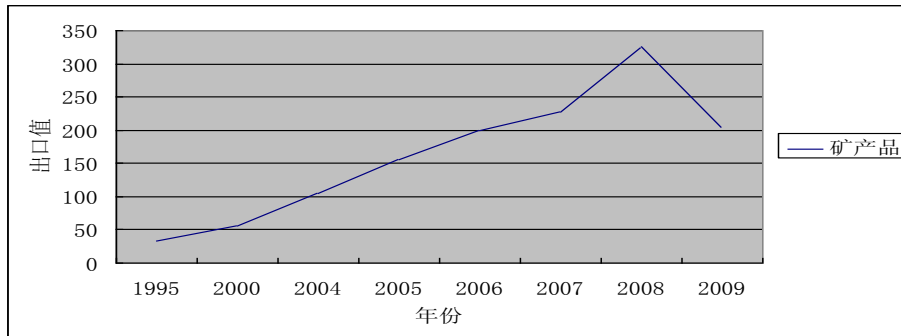
<sup>1</sup> 杨云彦主编：《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5 页。

<sup>2</sup> 用能源储量禀赋来衡量资源禀赋的研究成果可见：Jean-Philippe C. Stijns,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sited”, *Resources Policy*, Vol.30, Issue.2, June 2005, pp.107-130; Richard M. Auty,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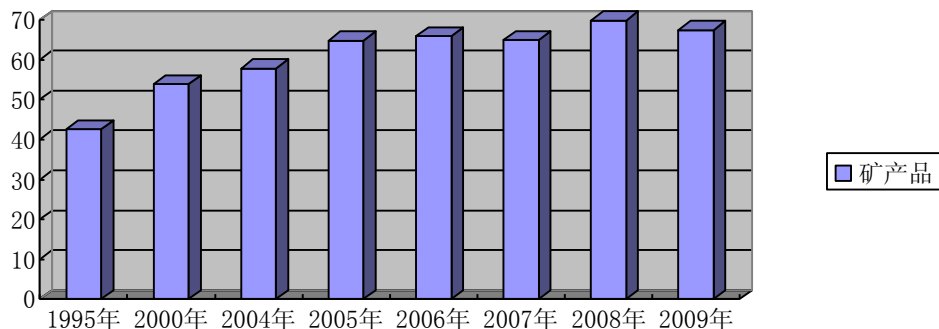
所占出口比重为 36.9%,2000 年为 50.3%,<sup>1</sup>而 2005 年为 62.1%。<sup>2</sup>使得能源部门在俄出口结构中一支独秀。俄出口中矿产品等资源产品份额不断上升并始终占据主导,也就意味着制造业等非资源部门的份额很小,并呈下降趋势。同时,在 2000 年,原料出口保障了俄罗斯 71.5% 的外汇收入,而在 2008 年,这一比例达到了 79%。<sup>3</sup>足见能源出口对于俄罗斯经济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俄出口结构呈现出能源依附型现象。

图表 1: 俄罗斯矿产品的出口值 (单位: 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网站 (<http://www.gks.ru/>)。

图表 2: 矿产品在俄罗斯出口商品的结构所占比重 (单位: %)



数据来源: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网站 (<http://www.gks.ru/>)。

## 2. 贸易情况

俄罗斯的出口占 GDP 的比重在 2006 年达到 28.1%, 同时进口占 GDP 的比重达 19.3%。<sup>4</sup>可见对外贸易中的进出口增长对于俄罗斯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 能源出口对于俄对外贸易造成的影响尤其值得研究。

从转型以来俄罗斯的贸易进出口情况可以看出 (见图表 3), 俄贸易出口除受 2008 年经

<sup>1</sup> Matthes J. Sagers, "Developments in Russia Crude Oil Production in 2000", *Post-Soviet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42, No.3, April-May 2001, p.157.

<sup>2</sup> Christian Gianella and Corinne Chanteloup, "Assessing Russia's Non-fuel Trade Elasticities: Does the Russian Economy React 'Normally' to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 510, Sep.2006, p.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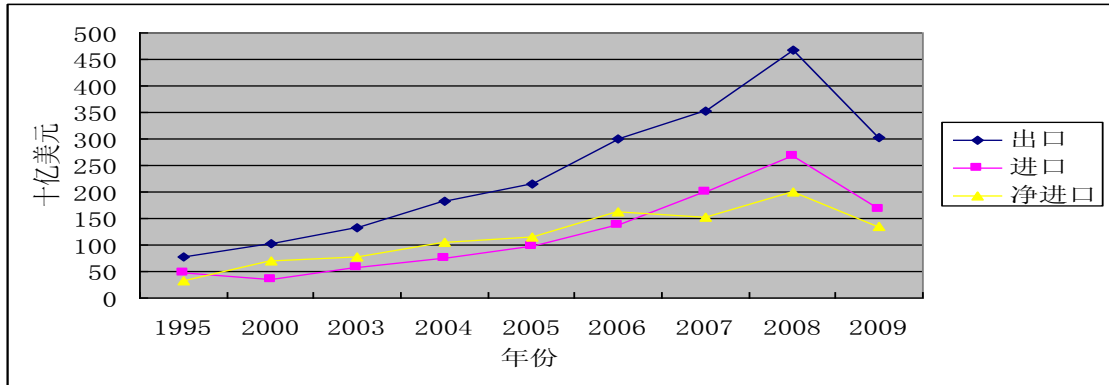
<sup>3</sup> 李新: "俄罗斯经济危机的特点及根源",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10 年第 2 期, 第 22 页。

<sup>4</sup> 田畑伸一郎: "俄罗斯油气资源依附型经济论析", 《俄罗斯研究》, 2010 年第 3 期, 第 3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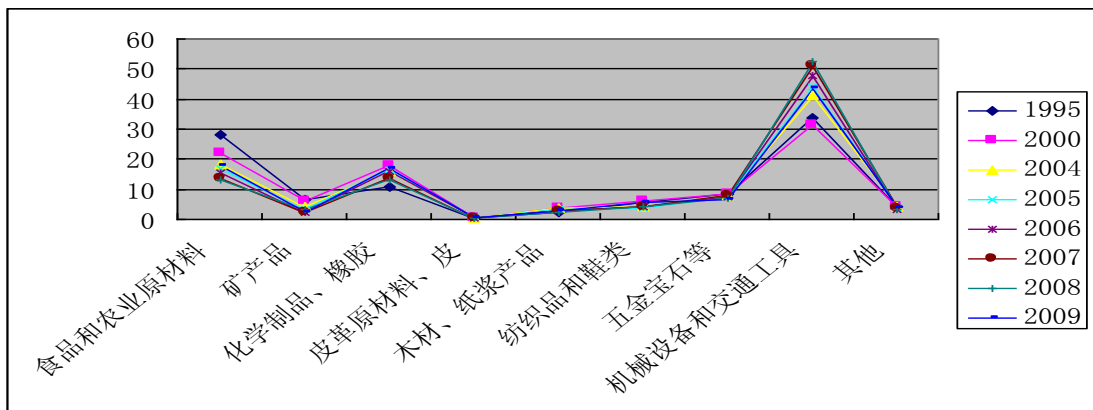
济危机影响使 2009 年的出口额有所下降外，贸易出口一路攀升。而进口值也体现出同样的增长情况。同时，净出口额除 2009 受经济危机影响有所下降外，也不断增长。可见，贸易出口对于俄罗斯经济具有极大的拉动作用。

图表 3：转型以来俄罗斯的进出口贸易情况（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网站 (<http://www.gks.ru/>)。

图表 4：俄罗斯进口结构（单位：%）



数据来源：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网站 (<http://www.gks.ru/>)。

进一步从进出口结构分析（见图表 4），可以发现俄罗斯的出口结构以矿物资源，尤其是以油气能源为主，而且比重不断上升。因为净进口值的不断上升，可以看出外需在俄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而能源又是极为重要出口产品，因而能源产品在拉动外需上起着极为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进口结构上，可以看到俄主要以制造业产品为主。体现出俄能源资源的出口对国内制造业造成一定打击，国内被迫依赖制造业进口来弥补自身不足。

### 3.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是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分析能源出口导致的产业结构变动，对于分析一国经济增长情况也极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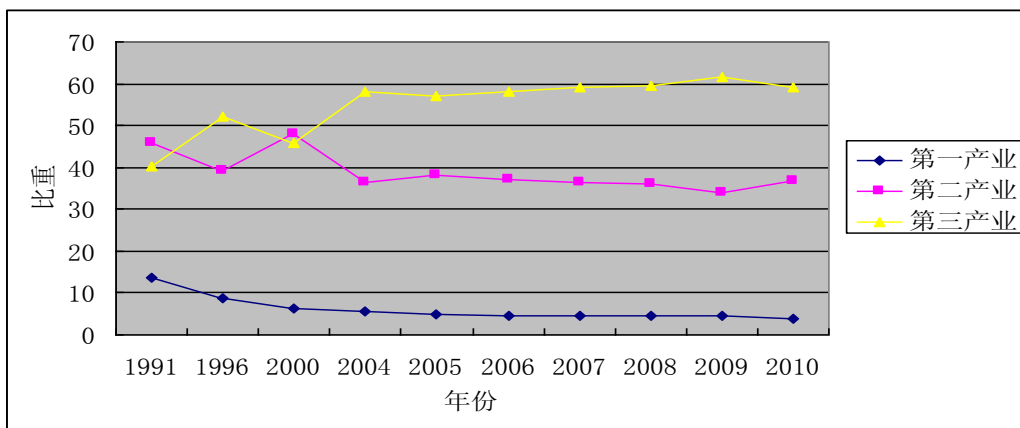
从三次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变化来看，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产业结构有所优化（见图表 5）。从就业人数来看，由于能源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所需劳动力的比重比较低。



尽管近年来能源产业的就业人数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占总就业量的比重尚未到达 1%。<sup>1</sup>因而能源产业在解决就业上和影响三次产业就业人口结构上所起的作用较为有限。

从第二产业内部来看,能源在第二产业产值中所占比重很大,能源产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接近一半,充分体现出,俄工业部门结构的畸形化。同时由于 2000 年以来俄能源工业的发展和出口的增加带来了卢布汇率的上涨(见图表 6)。进一步增加了俄制造业等部门的竞争压力。以 2008 年的比重来看,有学者估计,仅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总值就占俄罗斯 GDP 比重的 30%。<sup>2</sup>可见,俄罗斯能源部门,特别是石油、天然气部门正逐渐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部门,在影响俄罗斯产业结构上起着重要作用。

图表 5: 俄罗斯三次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变化(单位: %)



数据来源: 1991、1996 年数据引自:【波】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学》(刘小勇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99 页。2000 年数据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编:《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0 页。2000 年之后数据引自:《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2 页。

表 1: 俄罗斯能源部门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单位: %)

年份	1995	2000	2002	2004
能源部门	44.3	40.8	40.6	4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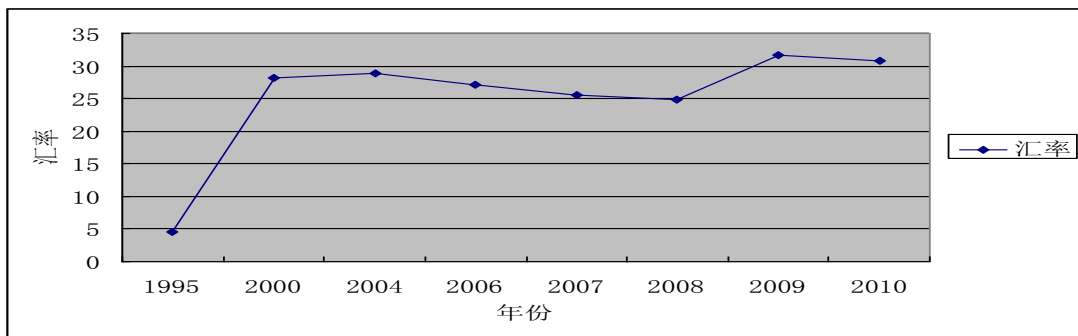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关雪凌、宫艳华:“俄罗斯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与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第 119 页。本文根据有关数据整理所得。

图表 6: 卢布兑美元汇率(卢布/1 美元)

<sup>1</sup>边恕、孙雅娜:“能源禀赋与俄罗斯产业初级化倾向研究”,《东北亚论坛》2008 年 7 月,第 4 期,第 99 页。

<sup>2</sup> Anders Aslund, Sergei Guriev, and Andrew C. Kuchins, eds., *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Washington, D.C: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0, p. 19.





数据来源：<http://www.cisstat.com/eng/>以及 OECD 网站：<http://www.cisstat.com/eng/>。

因此，从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出，俄罗斯能源出口对于俄罗斯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二元”的，即在产业高级化上能源具有积极作用，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但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上，能源却起着相反的作用，能源部门的过度增长使得产业结构变得更加不合理。

## （二）印尼能源出口影响分析

### 1. 能源出口情况

能源在印尼外贸出口中的比重，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印尼独立后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印尼经济结构的落后，以及其本身丰富的油气资源，使得油气出口在其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位置。特别是在两次石油危机期间（1974-1982 年），印尼的石油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度从 1969 年的 44.9% 提升到 1983 年的 76.33%。<sup>1</sup>但是，由于从 1982 年开始，油价的大幅下跌，迫使印尼在 1980 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向依赖制造业产品出口过渡<sup>2</sup>。印尼充分利用日本“雁阵分工”模式在东南亚国家的推进，<sup>3</sup>从苏哈托执政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84-1989 年）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大力促进印尼从依赖油气的出口结构转向了出口工业化结构。在这种转型的影响下，印尼在 1981 年到 1996 年之间，非油气产品的出口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在总出口的比重发生了巨大变化（见图表 7）。这种转变使得近年来非油气产品的出口额远远高于油气产品出口额，而且两者之间的差额也不断增大（见图表 8）。同时，也应看到即使印尼长贸易结构的长期调整造成了油气产品出口份额的下降，但是从近期形成的出口结构来看，能源产品的出口在印尼的对外贸易中依旧占据重要地位，大约保持在 31% 左右（见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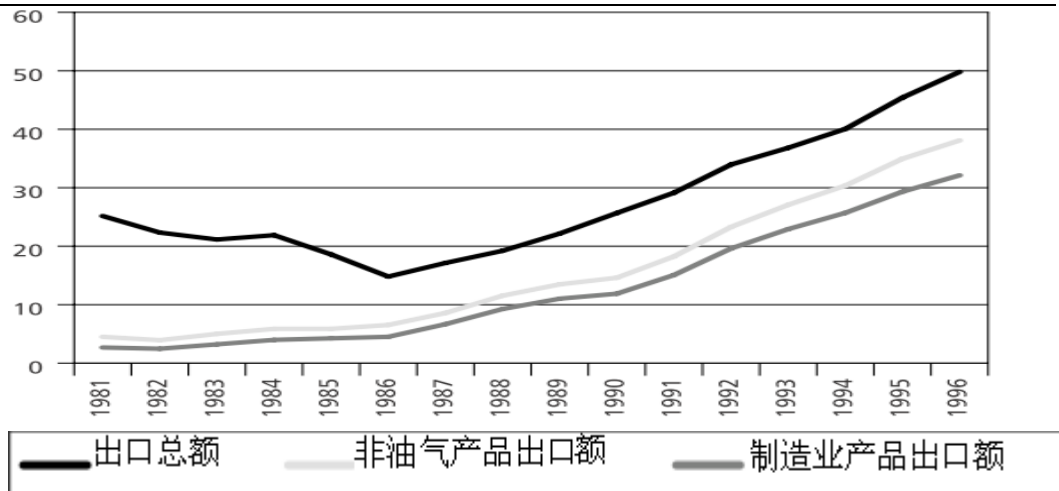
图表 7：印尼非油气产品、制造业和总出口额变化（单位：十亿美元）

<sup>1</sup> 汪慕恒：“印度尼西亚的石油供需关系与经济发展”，《南洋问题研究》1998 年第 1 期，第 70 页。

<sup>2</sup> Howard Dick, et al., *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al econom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Indonesia, 1800-2000*, New South Wales: Allen & Unwin, 2002, p.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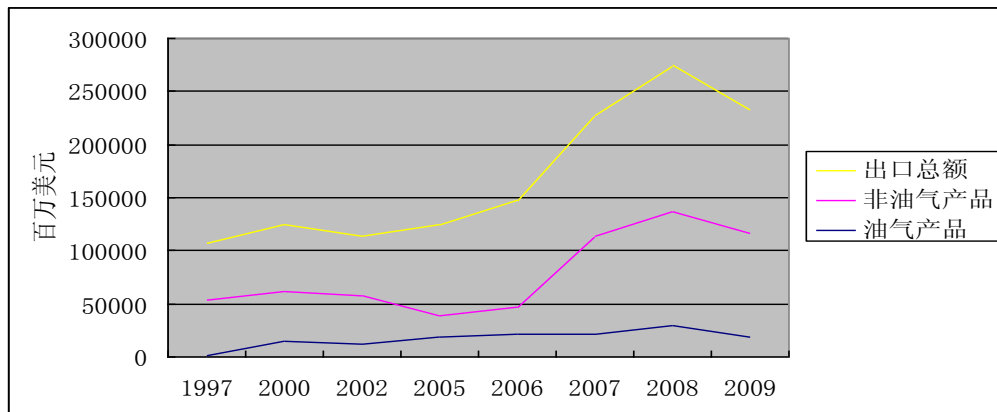
<sup>3</sup> 关于“雁阵分工模式”的相关文献可见：王荣艳：“东亚地区生产者服务贸易结构变迁研究——基于‘雁阵模式’的实证分析”，《亚太经济》2010 年第 3 期，第 42-46 页；吴英、张晶宇：“从‘雁阵模式’看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对策”，《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4 期，第 14-21 页。张红霞：“东亚地区产业分工模式的演进及中国的对策”，《东北亚论坛》2006 年第 5 期，第 26-30 页。





图表及数据来源：Howard Dick, et al., *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al econom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Indonesia, 1800-2000*, p.224.

图表 8：印尼出口贸易中商品的结构（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2005 年以前数据转引自：彭旭、王珊珊：“印尼的对外贸易结构分析”，《东南亚纵横》2004 年第 12 期，第 41 页。2005 年及以后数据来源：BPS-Statistics Indonesia, *Trends of Selected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of Indonesia*, Jakarta: C.V. National Indonesia, 2009, p.85,87; BPS-Statistics Indonesia, *BPS-Statistics Indonesia Strategic Data*, Jakarta: C.V. National Indonesia, 2010, pp.21-30.

表 2：能源产品占印尼出口贸易额的比重（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出口总额	85660.0	100798.6	114100.9	137020.4
能源产品	27341.9	32112.8	36638.6	51987
① 比重	31.92	31.86	32.11	37.94

注：①能源产品包括：油气产品、棕榈油和煤矿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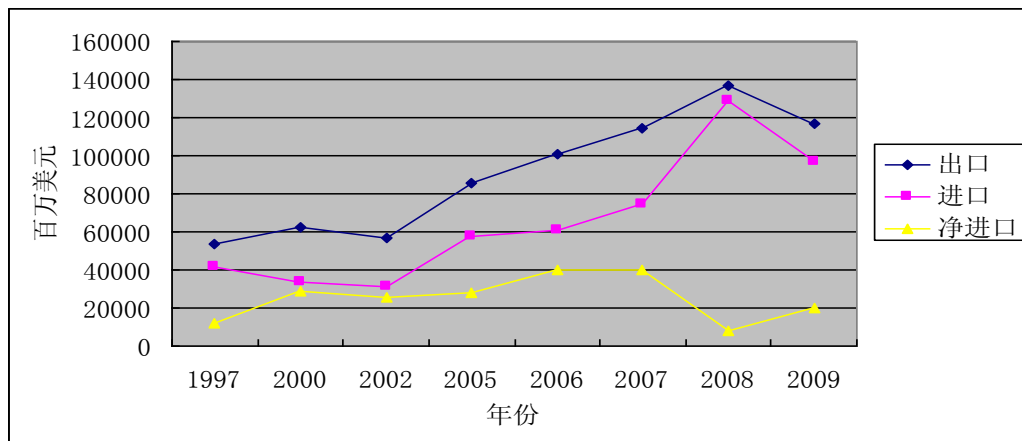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根据 BPS-Statistics Indonesia, *Trends of Selected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of Indonesia*, 2009, p.87 有关数据整理所得。

印尼以油气为代表的能源产品，在印尼的整个转型过程中，曾在出口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但是经过印尼产业调整调整后，能源产品在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但是从近期来看依旧占据着 31% 以上的重要比重。

### 2. 印尼的贸易情况

在印尼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的转型进程影响下，印尼的出口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油气产品的出口不断减小。在这种出口结构影响下，印尼的出口贸易从近期来看，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见图表 9）。即使在 2008 年经济危机袭来之际，印尼出口虽有下降但不是大幅度下降，受损轻微。印尼进口也在近期不断增长，体现出对经济的强大拉动力。从净进口来看，相对而言其总值比较稳定，变化比较平缓。综合分析可见，出口贸易在印尼经济增长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这主要归功于制造业等非能源产品的出口份额的增加，与此同时能源产品同样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图表 9：印尼的进出口贸易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2005 年以前数据转引自：彭旭、王珊珊：“印尼的对外贸易结构分析”，第 41 页。2005 年及以后数据来源：BPS-Statistics Indonesia, *Trends of Selected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of Indonesia*, 2009, pp.85-89; BPS-Statistics Indonesia, *BPS-Statistics Indonesia Strategic Data*, 2010, pp.21-30.

### 3. 产业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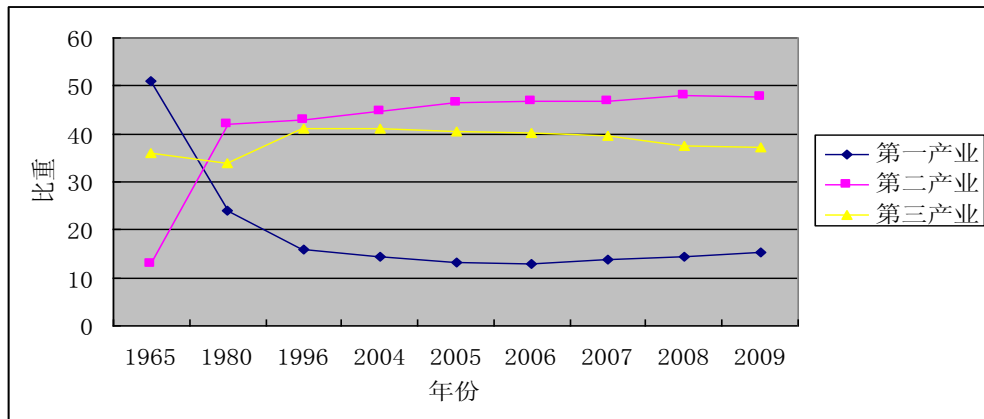
印度尼西亚从独立至今，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 GDP 的比重由 1965 年的 51%、13% 和 36% 演变为 2009 年的 15.3%、47.6% 和 37.1%（见图表 10）。可见，印尼的产业不断优化升级，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大，逐步摆脱了以前依赖农业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初级化现象不断减弱。在就业人数上看，能源产业由于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其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一直在 1% 左右，在直接解决就业上所起作用不大。

从产业结构内部分析，能源产业在 GDP 中的比重从石油繁荣时期结束的 1982 年以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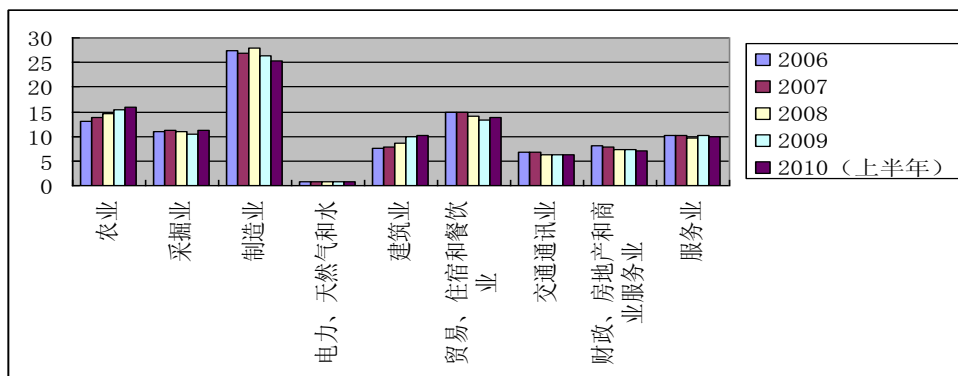
直在下降<sup>1</sup>，而制造业的比重却得到了进一步的上升。1993年，非石油天然气产值在工业制造业的总产值中占 79.9%，从此印尼的经济结构已不是以石油为主体的结构。从 2006 年到 2010 年上半年的据来看，在印尼 GDP 增长来源的贡献上，农业、制造业、贸易-宾馆-餐饮业连续占了超过一半的份额（见图表 11）。同时，制造业的发展速度也没有受到油气业的影响而减缓，反而油气业在印尼增长速度不佳（见图表 12）。

图表 10：印尼三次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2004 年以前的数据来源于：Howard Dick, et al., *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al econom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Indonesia, 1800-2000*, p.199；2004 年以后的数据根据 BPS-Statistics Indonesia, *BPS-Statistics Indonesia Strategic Data, 2010*, p.17 计算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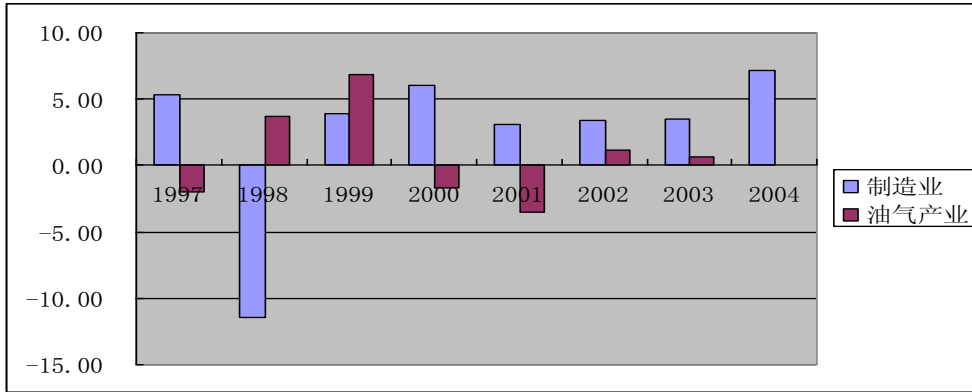
图表 11：印尼 GDP 构成的产业来源所占比重（%）



数据来源：BPS-Statistics Indonesia, *BPS-Statistics Indonesia Strategic Data, 2010*, p.17.

图表 12：近期印尼的油气产业与制造业增长速度对比

<sup>1</sup> Thee Kian Wie, "policies Affecting Indonesia's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ttp://hi-stat.ier.hit-u.ac.jp/english/research/discussion/2005/121.html>(最后访问：2011 年 6 月 1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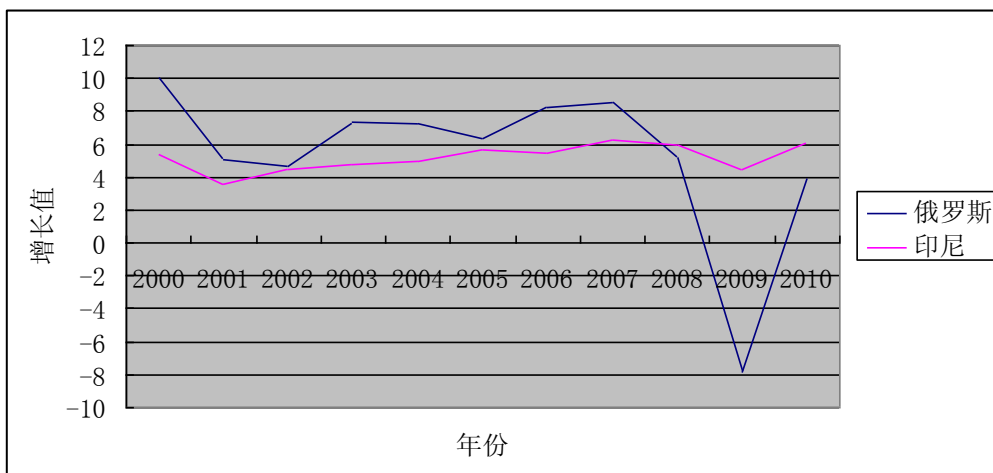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Thee Kian Wie, “policies Affecting Indonesia’s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由上述分析可知，印尼能源产业作用在减弱的同时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同时，能源产业的发展并没有造成印尼制造业的萎缩，反而使制造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取代能源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力量。而制造业发展的同时，能源产业，特别是油气业却不断衰弱。印尼的产业内部结构变得多样化、合理化。

### (三) 经济增长情况比较

在能源出口的影响下，俄罗斯与印尼形成了不同的贸易结构状况和产业结构状况，并最终影响着两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本文选取 2000 年以来两国的经济增长情况作为参考，并就 2008 年经济危机中两国的经济增长下降和恢复情况做一对比分析，考察两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情况和变化状况。

图表 13：印尼与俄罗斯经济增长情况对比



数据来源：俄罗斯经济增长率：<http://www.cisstat.com/eng/>。

印尼经济增长率：ASEAN Secretariat,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8*,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p.34; *BPS-Statistics Indonesia Strategic Data*, 2010, p.13; 印尼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bps.go.id/eng/index.php>。

通过图表我们可以看到,两国自 2000 以来,经济都取得了较高的增长率水平。事实上,俄罗斯经济从 1999 年就已开始飞速发展,1999-2008 年经济增长年均超过 7%<sup>1</sup>,保持了十年的高速增长。印尼在 2000-2009 年的 GDP 年均增长率为 5.1%<sup>2</sup>,同样实现了十年的较快增长。但是,从经济增长的平稳程度来看,俄罗斯经济的增长明显比印尼经济增长更具波动性和不稳定性。从 2008 年经济危机来看,俄罗斯经济遭受了重创,GDP 增长下降了 8%,但是印尼的 GDP 增长仍然保持了 4.5% 水平,受损程度较轻。可见,印尼经济增长的平稳程度远远好于俄罗斯。

### 三、结论及启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转型以来俄罗斯形成了主要依赖以矿物产品,尤其是油气产品的出口结构,呈现出能源依附型特征。这种能源依附型的出口结构,拉动了俄罗斯出口贸易的不断增长。同时,其进口的不断增长也体现了俄内需能能源出口拉动下日渐兴旺。但是,这种拉动效应是随着能源价格波动而波动的,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在 2008 年经济危机中,能源价格的大幅下降,导致了俄进出口贸易的急剧减少。能源的出口,同时也带来了俄罗斯制造业的萎缩,迫使其不得不依赖进口制造业产品来填补国内不足,进而导致了国内制造业遭受进一步打击。从长远来看,俄罗斯的贸易结构的确有陷入恶化的倾向。能源部门高速增长带来的影响,反映在国内产业结构上体现出“二元”的特征:一方面导致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进一步高级化,这体现出能源经济的有利一面;同时,从第二产业内部分析,可以发现能源部门挤压了制造业部门的发展空间,造成了能源部门一支独大的结构现象,体现出能源部门的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不利影响的一面。贸易结构和国内产业结构的状况,最终造成了俄罗斯经济在能源价格上涨时期的高速发展。但是,由于能源价格的波动性特征,也使得俄罗斯经济的增长充满了不稳定性,面对着能源价格的下跌,特别是经济危机的冲击,其经济状况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印尼的情况则与俄罗斯相反。印尼在转型过程的早期,曾依赖于丰富的油气资源,形成了能源依附型的经济结构。能源出口及价格对印尼经济的增长产生近乎决定性的影响。在两次石油危机期间(1974-1982 年)的 1973-1981 年,印尼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7.9%<sup>3</sup>。随着 1982 年油价的下跌,印尼的经济增长也受到较大影响,1982 年到 1985 年的 GDP 平均增长率降为 4.0%<sup>4</sup>。但是,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印尼大力发展制造业,使制造业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大幅上升,成功的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经过长期的调整之后,印尼的出口结构在近期体现出了多样化的特征。这种多样化的出口结构,进一步拉动了印尼出口贸易的不断增长。由于印尼出口的快速增长及贸易在 GDP 增长中的重要性,使得出口成为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而由于印尼出口的多样化,使得印尼的外贸增长比较具有稳定性,受

<sup>1</sup> Anders Aslund, Sergei Guriev, and Andrew C. Kuchins, eds, *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p.10.

<sup>2</sup> OECD, *OECD Economic Surveys: Indonesia*,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0, p.35.

<sup>3</sup> 汪慕恒:“印度尼西亚的石油供需关系与经济发展”,《南洋问题研究》1998 年第 1 期,第 71 页。

<sup>4</sup> 同上,第 71 页。



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小。印尼能源部门的出口状况对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 1982 年之前，印尼依赖油气工业的发展，开启了国内产业的高级化进程。在 1982 年之后，产业结构发生了更加巨大的变化。印尼为摆脱能源依附型的经济结构，开始利用能源出口带来的“第一桶金”实现产业结构的第二次调整。实现了印尼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进一步转变。同时也使得在第二产业内部，有效的降低了油气部门的比重，使得制造业部门比重不断增长，形成了近期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分布。贸易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印尼经济高速稳定的增长。而这种增长经过 2008 年经济危机的考验证明，更具平稳性，也更具抗击风险的能力，从长期来看，具有持久性。

因而可以得出结论：俄罗斯能源经济的发展使得其经济增长陷入了“资源诅咒”的怪圈，而印尼则没有发生这一现象。

同样是能源生产与出口大国，俄罗斯陷入了“资源诅咒”的怪圈，而印尼却跳出了这个规律。为何俄罗斯与印尼在发展能源经济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后果呢？

从整体的转型过程分析，可以发现，印尼利用其油气出口带来的“第一桶金”实现了经济的第二次整体转型。也就是说，印尼在转型的早期依赖油气能源产业发展经济，摆脱了主要依靠农业的产业结构，并为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一定财富，实现了国家经济的第一次转型，在面对能源价格下降的挑战时，及时的进行第二次经济大转型，从依赖能源产业转移到依赖制造业上来。这种转移既实现了贸易的稳定增长，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高级化和合理化，最终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而这种发展也更具持久性。从俄罗斯转型过程的整体进程分析，俄罗斯能源经济带来的影响所显示的特征表明其目前尚处在第一次经济转型之中，即利用能源产业赚取“第一桶金”的过程中，还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已开始进行第二次经济大转型。因而其贸易结构、产业结构都较为不合理，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平稳性和持久性。

因此，俄罗斯和印尼的能源经济分析给转型国家发展资源经济一个重要启示：“资源诅咒”命题并不总是有效。资源禀赋丰裕的国家，能够依靠资源实现贸易的长期增长和结构优化，并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最终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从而打破“资源诅咒”的神话。但是，实现这一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转型国家必须在实现经济结构向资源依附型转化之后，利用资源所带来的经济积累，及时的进行第二次经济结构转型，即发展能够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制造业等非资源部门。以俄罗斯与印尼比较的结果，可以说明转型国家的第二次经济转型能够有效克服“资源诅咒”，并仍能够利用其资源优势，更好的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发展稳健的市场经济体制。

（责任编辑：孙超）





## 未完成的“革命” ——麦克福尔眼中“俄罗斯”

孙超\*

**【内容提要】**麦克福尔，作为美国中生代斯拉夫研究的典型代表，担负着新一代美国学人理解、分析和诠释俄罗斯全景的任务。麦克福尔在其著作中使用大量的一手材料给我们描述出一幅清晰的转型期图像，并探索了转型理论的可能性，同时开拓了转型理论的“人”的分析架构，为我们理解更多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提供一个清晰的视角。这位尊崇美国民主价值观，崇尚自由的学者，将俄罗斯自解体后近二十年的发展理解为“未竟的革命”，并通过大量的转型研究，表达了美国学人对俄罗斯转型的担忧。

**【关键词】**转型 革命 麦克福尔 俄罗斯 民主化

作为斯坦福大学的著名政治学家，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A. McFaul, 1963-）并不是一开始就关注俄罗斯的“革命”。<sup>1</sup>1988年，这位将“革命研究”作为自己博士论文选题的年轻学者，期望在访问俄罗斯的时候能够获得更多的收获。<sup>2</sup>但是，这场经历被证明“完全失败”（total bust），并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a kind of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sup>3</sup>20世纪80年代末不仅是麦克福尔的转折点，也是前苏联的重要的转折期，更是美国对苏政策的转折时段。在这个时段，戈尔巴乔夫革如火如荼开展的国内政治改革，东欧国家正在酝酿革命，美苏之间多次举行首脑会晤，就世界问题寻求一致看法。这个时段也是欧亚社会主义版图变革的前夜。麦克福尔恰巧在这个时段接触到了那些“真正的革命分子”（true revolutionaries），

\* 孙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sup>1</sup> 事实上，中国学者唐贤兴认为麦克福尔所使用的“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者所使用的“革命”并不是同一回事，麦克福尔在这里所使用的“革命”并没有过多的价值判断，而集中于“对重大社会的政治变迁的描述”，由于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变革是剧烈的，甚至是暴力的，用革命一词更能够体现出其彻底性。关于这方面的著述可见他的博士论文，“Michael McFaul, “South African Liberation and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1991., 以及其早期的文献：Michael McFaul, “The Demise of World Revolutionary Process: Societ-Angolan Relations Under Gorbachev,”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6, no. 3, (March 1990); pp.165-189; Michael McFaul, “Russian Centrism and Revolutionary Transition,” *Post-Soviet Affairs*, Vol 9, No.4, (July-September 1993); pp.196-222; Michael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6. 笔者通过阅读文献，发现其使用革命的逻辑正如上述所言，唐贤兴分析见[美]迈克尔·麦克福尔著，《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译者序，第2页。

<sup>2</sup> Michael McFaul, “South African Liberation and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1991.

<sup>3</sup> Robert Dreyfuss, “The Rise and McFaul of Obama's Russia Policy”, July 2, 2008, <http://www.thenation.com/blog/rise-and-mcfaul-obamas-russia-policy>.



那些以推翻共产主义政权为志业的人。这段经历不仅让麦克福尔得以认识那些信奉“撒切尔主义”（Thatcherite）的自由论者，也丰富了这位西方学者的研究“革命”的方法。<sup>1</sup> 浸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麦克福尔感受到了苏联即将到来的“巨大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并投入其中，积极参与苏联的变革，与此同时得到了很多宝贵的一手资料，<sup>2</sup> 这为他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调。正如这位先生所说，“我的许多朋友成为后苏联时代的高级官员，而我也被俄罗斯吸进去了”。<sup>3</sup>

在苏联解体后，麦克福尔将目光聚焦在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的身上，出于对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的强烈兴趣，麦克福尔开展了自己的研究。1993年的《磨难中诞生的俄罗斯民主》（*The Troubled Birth of Russian Democracy: Political Parties, Programs, and Profile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3, with Sergei Markov）、《后共产主义政治：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民主前景》（*Post-Communist Politics: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3），1997年的《俄罗斯1996年的总统选举：极化政治的终结》（*Russia's 1996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End of Polarized Politic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7），2001年《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2003年的《权力与目的：冷战后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选择》（*Power and Purpos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Russia after the Cold War*, with James Goldgeier,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大众选择与被组织的民主：1999年和2000年的俄罗斯选举》（*Popular Choice and Managed Democracy: The Russian Elections of 1999 and 2000*,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with Timothy Colton），2004年的《在独裁与民主之间：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政治改革》（*Between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Russian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Reform*, 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4 with Nikolai Petrov and Andrei Ryabov）和2009年的《民主的必需：美国为什么和怎样支持世界的民主发展》（*The Democratic Imperative: Why and How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upport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Roman & Littlefield, 2009）展示了麦克福尔对俄罗斯转型和民主发展的持续关注。麦克福尔创造性地使用“革命”话语，在重构美国人心中俄罗斯的实质的同时，极力宣传俄罗斯的民主发展和民族进步的重要性。作为“民主的斗士”，麦克福尔的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描述和政策动议要求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的民主进步负起更多的责任来。

作为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麦克福尔不仅目睹着巨大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和新兴的民族国家的重建。如何认识这一复杂的政治现象？在麦克福尔看来，这种现象的最好的理解方式就是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革命性过渡”。<sup>4</sup> 因此，过渡、转型、革命和民主等关键词是认识后苏联地区复杂变迁的关键。基于此，本文将分四个部分考察麦克福尔的思想。第一部分是理论部分，通过对麦克福尔所运用的主要理论工具进行介绍和分析，概括出其基本的

<sup>1</sup> 具体内容和有趣介绍见, Meredith Alexander, “Stanford political scientist Michael McFaul takes a revolutionary new look at Russian politics”, NEWS RELEASE, [http://news.stanford.edu/pr/01/mcf\\_aulprofile1128.html](http://news.stanford.edu/pr/01/mcf_aulprofile1128.html).

<sup>2</sup> 麦克福尔积极帮助“民主俄罗斯”集团（Democratic Russia）与西方国家取得联系，使其活动得以获得资金支持。

<sup>3</sup> Ibid.

<sup>4</sup> Michael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观点和立场；第二部分将运用第一部分所提供的理论工具，析出这个美国学人所理解的“俄罗斯”的转型特点与方向，将麦克福尔心中的“俄罗斯”意象呈现出来。第三部分探讨麦克福尔的国际政治观，并尝试分析其与美国对俄政策的关系。在此之上，粗浅地思考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最后一部分用于总结，归纳麦克福尔的核心思想，探索这位美国学人俄国观。

## 一、转型：行为体·制度·国家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作为政治和社会实体出现了。俄罗斯“从破到立”所经历巨大的空间与时间的变迁不仅给这个国家和领土上的人民带来深刻的影响，也对研究苏联的学者带来巨大的冲击。苏联的解体给西方的斯拉夫研究带来大量值得研究的课题：苏联为什么会砰然倒塌？俄罗斯又是什么？该如何看待俄罗斯？俄罗斯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的巨大价值以及西方学者解释苏联崩溃的乏力要求人们用一种新的视角进行观察。

在麦克福尔的眼中，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变迁正是“转型的体现”。<sup>1</sup>俄罗斯的转型是“第四波”浪潮的体现。不同于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麦克福尔认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大量前苏东国家的体制转型是同时带有“民主和独裁”的特点。<sup>2</sup>与僵化的、不可见的结构性分析和制度分析不同的是，第四波“转型”则更加强调“人”的因素，将“行为者”（actors）的因素放在首位，而非经济影响力、文化影响和历史制度安排。<sup>3</sup>麦克福尔研究指出，最近三十多年里许多研究民主化问题的理论家早已相当注意行为体的作用，特别是精英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讨价还价，并把这些看作是转型过程的关键的事件。<sup>4</sup>由此麦克福尔开始将更多的目光转向行为体，从权力、偏好与制度设计入手，分析转型国家的转型过程和创建新制度之间的联系。<sup>5</sup>

### （一）行为体——转型的中心

麦克福尔将个人的作用和个人的选择置于解释转型的核心。<sup>6</sup>他认为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的前途由精英斗争的结果来决定。在旧制度瓦解和新制度未确定的转型期，所有的国家精英都面临着多种选择。由于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些精英们往往倾向于按照自己所构想出来的意图设计新的国家。由于偏好的不同，权力在各类精英集团的分布不同，加上信息的不对称、不确定性以及路径依赖等因素的作用，制度设计总是呈现出精英们心目中理想

<sup>1</sup> 事实上，对于这个英文单词的翻译“transition”，国内通常翻译为“转型”，也有的学者翻译其为“过渡”，而两者的区别是一个是“即将完成的过程”，有积极结果导向；而后一个有“正在进行，不知结果的过程”的意味在里头。事实上，麦克福尔“transition”在其文章和特别是其代表著作中，主要指的是“从共产主义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的过程”，有积极导向在里面，因此，在笔者看来，将此英文单词翻译为“转型”似乎更为合适。

<sup>2</sup> Michael Mcfaul,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World Politics*, Vol54, January 2002, p.212-244.

<sup>3</sup> *Ibid.*, p.214.

<sup>4</sup> Michael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6.

<sup>5</sup> Michael Mcfaul, *Institutional Design, Uncertainty, and Path Dependency During Transitions: Cases from Russia*,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 p.27.

<sup>6</sup> Michael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6.



政治设计的次优解。<sup>1</sup>在麦克福尔看来要了解一个国家转型的关键是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精英的表态以及为此所付出的成本判断其偏好，他们促进或阻碍变革的能力，才能从中判断出国家转型的方向和结果。

为了有效解释后共产主义转型国家的精英在旧制度瓦解到新制度建立这一过程所发挥的作用，麦克福尔改变了仅凭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合作型的转型模型”来解释后共产主义国家转型的策略（认为协商（negotiation）、起草草案（crafting）和妥协（compromise）在国家转型过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他强调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中，转型的实现主要是精英之间的斗争与不合作的结果，而通过有效的契约（successful pacts）实现国家的转型的作用很小。<sup>2</sup>为此，麦克福尔区分了两种情况：暴力的非协商性的过渡（non-negotiated transition）和协商性制度变迁（negotiated regime change）。<sup>3</sup>他同时着重强调了争议性的变迁议程和行为体之间权力平衡在协商性制度变迁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理解俄罗斯转型和政权类型的关系的关键。而精英在过渡时期的重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sup>4</sup>：

1、精英有目的性的创建体系（institutions），并让之服务于自我的需求。这些创造出来的体系大多反映了精英们的偏好。

2、当然体系的创建并不是精英们一致同意的结果，他们之间的权力的平衡以及为符合自身的体系所付出的代价和筹码影响着体系的结果。往往体系的创造在精英看来是次优的结果，这是由于精英之间妥协决定的。

3、精英本身在创造制度时候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且在有限时间内对自身的力量和制度的期许是不同的；复杂的体系创造以及对他人的行为的思考也是“不完全理性”的，况且精英是在未知的条件下创造制度，因此制度的产生或许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应对”出来的。

4、受到旧制度的影响，精英们或多或少的在转型的过程中甚或是建立新制度的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的状况，这种状况影响着制度的产生的结果。

从其“角色中心”论可以看出，麦克福尔始终将“精英行为”放在“转型的中心考虑。这样一来，一切的转型的核心动力来源于“精英的制度设计”。<sup>5</sup>精英是构建转型模型分析的核心，换句话说，一切理论的基础依赖于精英队外界变化的认识和行动。麦克福尔在这个逻辑的指导下开发出许多概念工具，如果“制度设计”、“不确定性”、“偏好”、“信息不对称”等等，将这些工具用于解释精英们在面对巨大的政治变迁所作出的决策和行动。虽然，这一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研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政治科学家强调“科学的结构和历史”等等结构分析框架，为我们提供一定意义上的“人”的解释。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定的风险，即仅看到微观群体而忽视了社会整体、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的演变。这种微观化的分析视角与麦克福尔的研究“转型”的经历不无关系，但是也正是这种视角让人们看到俄罗斯政治转型的微观进程，对这种转型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理解。

<sup>1</sup> Michael McFaul, *Institutional Design, Uncertainty, and Path Dependency During Transitions: Cases from Russia*,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 p.28.

<sup>2</sup> Michael McFaul,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World Politics*, Vol54, January 2002, p. 221.

<sup>3</sup> Michael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7-8.

<sup>4</sup> 具体的内容参见：Michael McFaul, *Institutional Design, Uncertainty, and Path Dependency During Transitions: Cases from Russia*,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 pp.28-33.

<sup>5</sup> Michael McFaul, *Institutional Design, Uncertainty, and Path Dependency During Transitions: Cases from Russia*,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 p.27.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麦克福尔虽然强调精英的作用，他在另一篇实证性的文章中指出了影响国家转型的另一个变量：代际变化（generational change）。<sup>1</sup>他用俄罗斯作为案例，分析俄罗斯青年对资本主义、民主、西方的看法，并与其父辈做了比较，认为“可口可乐”一代的青年俄罗斯人更加倾向于支持资本主义和民主，更亲西方，反对车臣战争，反对极权，认为他们将会对俄罗斯的民主进程作出巨大的贡献。<sup>2</sup>

**（二）制度——转型的方向**

关于“第四波浪潮”的转型，麦克福尔强烈反对学者们的“帝国意图”，即把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国家的研究吸收进一般性的比较分析之中去。并认为东欧与前苏联发生的变化和其他地方发生着的制度变迁相类似，用“民主化第三波”来解释这些新的转型。<sup>3</sup>事实上，第四波浪潮与第三波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个核心不同就是第四波浪潮的方向是不确定性的，即各国转型后并不都是向着民主的道路迈进。参见表一：

	独裁	部分民主	民主
求得改变的均势		亚美尼亚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格鲁吉亚	克罗地亚 捷克 爱沙尼亚 匈牙利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波兰 斯洛维尼亚 斯洛伐克
不确定的均势	塔吉克斯坦	摩尔多瓦 俄罗斯 乌克兰 阿尔巴尼亚 阿塞拜疆 马其顿	保加利亚 蒙古
寻求旧制度的均势		南斯拉夫/塞尔维亚	罗马尼亚

表一：后共产主义政权的分类<sup>4</sup>

按照麦克福尔的说法，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中，不同的观点和权力构造了各国的制度。如果权力分配有利于民主分析，那么自由民主制度很可能会在这个国家建立；同样，如果权力

<sup>1</sup> Michael Mcfaul, Generational Change in Russia, *Demokratizatsiya*, Heldref Publications,2003, pp.1-16.  
<sup>2</sup> Michael Mcfaul, Generational Change in Russia, *Demokratizatsiya*, Heldref Publications,2003, pp.1-16.  
<sup>3</sup> Michael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7.  
<sup>4</sup> Michael Mcfaul,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World Politics*, Vol54, January 2002, p. 227.



分配支持独裁分子，那么威权制度也会得以建立，这两种制度都会非常稳定。<sup>1</sup>相比之下，如果各类分子的权力均势产出的是不稳定的民主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在十年之后还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sup>2</sup>因此，第四波浪潮并不是具有一致的方向——民主化。

显然，这是麦克福尔重大的贡献。他发现了：

转型模式影响着（随后）产生的政治体制的类型。……如果不同的转型模式能够导向相同的结果，那么以前我们所认为的模式对于民主制度的成功和失败所具有的决定意义就不一样了。<sup>3</sup>

虽然，麦克福尔发现了这个事实，但是他还是非常支持各国民主化的，特别是俄罗斯。麦克福尔想尽一切办法去发现支持俄罗斯民主的因素，批评俄罗斯的“民主倒退”<sup>4</sup>，并多次撰文呼吁美国从外部支持俄罗斯实现民主化。<sup>5</sup>

### （三）国家——转型的必要条件

正是区分了转型期和转型后的政治体制类型，整个的转型国家的政治分析就可以采用较为科学的方法。这从时间上解决了分析转型国家的困难，但是如何从空间上解决我们对转型国家的认知呢？换句话说，转型期的国家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如何考虑转型期国家的主权和其边域？

这也是麦克福尔思考的主题。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存在着国家和民族的边界问题，同时经济问题也较为突出。如果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解决的是政治体制的变革问题的话，那么第四波则是全面解决政治经济问题，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和联邦政体转变为民族国家和独立行为体的问题，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这是转型本身？还是转型的结果？

正如麦克福尔自己在分析俄罗斯联邦建立时候所谈及的<sup>6</sup>：

……俄罗斯的革命者们被赋予了同时进行政治变革和经济转型的机会，当然，还有相应的负担。更为迫切的一个问题是厘清国家边界。……即使在1991年12月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签署的时候，俄罗斯的政治定位、疆域定位和心理定位都还是个未知数。……在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制来治理国家之前，俄罗斯领导人必须先确定他们国家的位置在哪里。对于经济而言，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彻底失败，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几年里的失败，意味着经济改革必须马上进行。

上述材料反映出了麦克福尔认为国家在转型中作用是“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和“建立政治体制的前提”。可见麦克福尔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确定国家边界是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

<sup>1</sup> Ibid., p.226.

<sup>2</sup> Michael McFaul,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World Politics*, Vol54, January 2002, p.226.

<sup>3</sup>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著，《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39页。

<sup>4</sup> For example, McFaul, Michael, The Democrats in Disarra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4, Number 2, April 1993, pp. 17-29; Is Russian Democracy Doomed? Explaining the Vot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5, Number 2, April 1994, pp. 4-9;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1, Number 3, July 2000, pp. 19-33.

<sup>5</sup> For example, Michael McFaul, American Efforts at Promoting Regime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n Russia: Lessons Learned, discussion draft, Sep 27<sup>th</sup>, 2004; Democracy Promotion as a World Valu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8:1 pp. 147-163.

<sup>6</sup>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著，《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135页。





<sup>1</sup>他同时也赞同，转型国家的领导人首先应该解决议程上的其他两个问题——重组经济和划清国家边界。<sup>2</sup>作为制度设计的重要议程之一，麦克福尔认为精英们有必要将国家本身政治定位、疆域定位和心理定位确定下来，为体制转型奠定基础。由此可以判断，麦克福尔是将国家作为体制转型的前提以及最需解决的迫切的问题之一提出来的。当然，当我们把距离拉近，就可以观察到，麦克福尔所要说明的“国家”具有模糊性的特色。一方面，他承认也同意国家的构建是后共产主义国家转型的前提；但是在具体的论证中，特别是关于俄罗斯的体制转型的论证中，他又认为国家构建是制度设计的重要议题之一，作为制度设计最迫切的议程需要加以解决。正如他所说，这是后共产主义国家转型的必要条件。他引用别人的观点指出<sup>3</sup>：

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一些多民族国家也不得不在议程中加入第三个议程——民族与国家的边界问题。这些多民族国家——尤其是此国家（subnational）的边界与其族群的居住地相符的那些多民族国家——要么分崩离析，要么在巩固民主政治问题上比那些民族更为单一的国家做得失败。

事实上，当我们仔细思考麦克福尔的“国家”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这种模糊性其实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第一，他所谈及的确立“国家”问题实质上是在国际意义上获得“主权”的问题。自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和各加盟共和国签署独立《别洛韦日协定》，已经确立了俄罗斯在国际上的独立地位，而这一“国家”问题剩下来的工作就是谈判确定与他国的边界和利益的问题；第二，他所谈及的作为迫切议题“国家”的问题，其实质是指国内层面，换句话说为了防止民族分裂和分权化倾向要塑造心理认同上的“国家”。这里的“国家”涉及到转型的核心议程：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结构形式、建立多民族的国家认同感等。“国家”意识成为转型的动力。因此，国家不仅是转型的必要支撑点（从国际意义上看），也为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从国内意义上看）。国家无疑成为转型的重要条件。

## 二、俄罗斯未完成的“革命”：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转型

全球化的今天，变迁无处不在，并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技术变迁、人口变迁、快速的生态变迁以及由经济和政治模式内在的不一致和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变迁。<sup>4</sup>与这种社会变迁所不同的，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是剧烈的、动荡的，是国家重新塑造、意识形态重新构建和整个社会制度急剧变化的历程。麦克福尔经历了、关注了这一过程，他认为这是一种革命，是一种从共产主义统治过渡到民主的“革命”，是一种社会革命，是一种长期转型下的革命。<sup>5</sup>

<sup>1</sup>Dankward Rustow, "Transition to Democracy: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 (April 1970): 351.cited from Michael McFaul,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World Politics*, Vol54, January 2002, p. 216.

<sup>2</sup>[美]迈克尔·麦克福尔著，《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134-135页。

<sup>3</sup> Linz an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29, n.29; Philip Roeder, "Peoples and States After 1989: The Political Costs of Incomplete National Revolutions," *Slavic Review* 58( 1999): 845-882.Cited from Michael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0.

<sup>4</sup> [美] 史蒂文·瓦戈著，《社会变迁》，王晓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3页。

<sup>5</sup> Michael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thaca: Cornell



### （一）政治的革命：共产主义·民主·“独裁”

俄罗斯的转型不仅是长期的而且也充满着冲突与暴力。<sup>1</sup>在其名著《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之中，麦克福尔用大篇幅来描述俄罗斯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制度改革到崩溃，到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制度设计从构建到失败，再到“第二共和国”的制度设计从构建到发展中的这一历史过程。<sup>2</sup>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旧政体的领导人与新制度的精英们围绕着制度本身展开激烈的斗争，实现协议的主要手段并不是通过谈判而是依靠强力，强迫成为转型的主要模式。<sup>3</sup>值得麦克福尔记住的是三个重要的关节点：1991年的十月事件，1993年的炮轰白宫事件以及1999年的普京担任总统。这三个时点对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而言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而这三个重要节点又是划分麦克福尔所规定的俄罗斯的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的重要时间变量。按照麦克福尔的话来说<sup>4</sup>：

对俄罗斯而言，十月事件是一场国家悲剧，……还使俄罗斯不再以浪漫的姿态拥抱民主。十月事件在总统和议会之间制造了权力高度不对称的状态，削弱了权力分立的原则。如果1991年的军事对峙的解决标志着民众开始支持新政权以及它所宣称的代民主理念的话，那么，1993年的冲突的结束标志着民众对俄罗斯政府的支持率降到了最低点。当民主政府不再以民主的方式行事，它会失去社会合法性，转而阻碍民主制度的巩固和深化。

正因为第一共和国的失败和结束，麦克福尔开始重新思考“俄罗斯的民主”。自1993年之后，俄罗斯的政治进程会不会因为出现挫折而重新回到威权状态，俄罗斯会不会返回到苏联的“独裁政权”？<sup>5</sup>麦克福尔认为这种说法“言过其实”。<sup>6</sup>按照他的逻辑，1991年到1993年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政治设计是通过设定议程，推翻计划经济并进行市场化变革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制度改革并没有放在首位。而随着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全面确立，叶利钦所关注的议题已经不再是经济问题，转向政治制度设计。通过1993年的事件，叶利钦展示出了相较于其他势力所不能具有的权力并获得了在政治游戏中设置的新规则的能力，而正是这一强制性甚至充满暴力的结果使得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获得了“强力”的支持，并开始向“自由民主”的国家迈进。<sup>7</sup>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或者用麦克福尔的话来说为“过渡的立宪政府”时期，俄罗斯开始逐步进行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建设。从新宪法的设立，到国家内部政治制度的建构，到议会选

---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8-11.

<sup>1</sup> Michael McFaul, Russian Democracy: Still Not a Lost Cau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3:1, p.161.

<sup>2</sup> 依照麦克福尔的说法，第一共和国是特指俄罗斯从1991年8月八月政变到1993年10月炮轰白宫为止，为第一次民主转型；而第二次共和国是特指从1993年炮轰白宫后以及新宪法的颁布作为第二次的民主转型，以下未加说明，均为特指。

<sup>3</sup> Ibid.

<sup>4</sup>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著，《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227页。

<sup>5</sup> The idea comes from Vladmier Pastruknov, "Comic-Opera Authoritarianism in Russia," *Megapolis Express* 41 (October 20, 1993):19; *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 45(November 10, 1993):8; Yuri Krasnov, *Vybory-93*(Moscow: Institute Politiki, 1993),3; Philip Roder, "Varieties of Post-Soviet Authoritarian Regimes," *Post-Soviet Affairs* 10(1994):94; Donald Murray, *A Democracy of Despots*(Boulder, Colo.;Western Press,1995),224.

<sup>6</sup>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著，《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228页。

<sup>7</sup>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著，《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228页。



举和总统大选，再到新执政党的成立，叶利钦不断用其权力平衡中的优势地位强化民主在俄罗斯人心中以及俄罗斯政治制度中的力量，开始自戈尔巴乔夫就已经进行的，第一失败后的再一次（或者说是第三次）民主化努力。<sup>1</sup>这些措施虽然有利于构建俄罗斯的民主制度，但是超级总统制、一个制度化很弱的政党制度、一个组织不力的公民社会，一个没有效率的政府和进展缓慢的法治，构成了俄罗斯新民主政体的一长串缺陷，俄罗斯的民主缺少自由民主的特性。<sup>2</sup>麦克福尔认为俄罗斯的民主制度缺乏西方天然的自由庇护，缺乏自由的文化或者说是后共产主义所遗留下来的制度痕迹在俄罗斯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而这种非自由制度反过来也会威胁俄罗斯脆弱的民主制度。

经过第二共和国长期的政治努力，俄罗斯的已经成型的“选举民主制度”会成为“自由民主制”吗？<sup>3</sup>麦克福尔以此问题结束了对《俄罗斯未竟的革命》的讨论，但事实上“俄罗斯的政治转型还远没有结束”。普京成为俄罗斯的总统则是麦克福尔所称之的第三个转折点。对叶利钦时期的那种反对其他学者谴责其“否定俄罗斯民主”的论断所不同的是，麦克福尔看出普京将要“给俄罗斯带来新的开始”。<sup>4</sup>这种开始是实质反民主的“可控民主”的开始。麦克福尔“气愤地”写道<sup>5</sup>：

普京执政一年以来所做的最大的破坏性工作就是摧毁俄罗斯最大的自由媒体组织，这很清楚地表明普京在削弱俄罗斯脆弱的民主制度。他们寻求创造都是正式的民主机制：选举、政党、媒体、市民社会等等。但是这些机制的自治权以及能力的发挥和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是极度受限的。

在另一篇文章中，麦克福尔毫不掩饰对普京的不满。他指出<sup>6</sup>：

普京是由叶利钦和其手下的寡头将其作为忠诚的继承者选举出来的，其目的是维护寡头利益并确保寡头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为了让普京的当选并获得支持，寡头们挑起了车臣战争。

麦克福尔在《外交》的另外一篇文章也丝毫不掩饰他对普京对民主的倒退和强化中央集权和政权稳定的不满。“不论普京时代人们将获得什么收益，在民主社会中这些收益将会变得更多。”<sup>7</sup>麦克福尔历数普京的种种“反民主措施”，控制媒体自由，减少地方政府的自治，加强总统权力，削弱议会，强化政府对政党和 NGO 的控制，以稳定为优先考量标准等。<sup>8</sup>麦克福尔反对将“独裁政治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他同时指出“俄罗斯想做下一个中国，但很可能是下一个安哥拉，那个靠出卖石油发家而不是提供公共物品和维护大众利益的国家”。<sup>9</sup>

<sup>1</sup> Michael Mcfaul, Russian Democracy: Still Not a Lost Cau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3:1, p.161.

<sup>2</sup>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著，《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356页。

<sup>3</sup> Michael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sup>4</sup> Masha Lipman and Michael Mcfaul, "Managed Democracy" in Russia, Putin and Pres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June, 2001, vol. 6, no. 3, p.116.

<sup>5</sup> Ibid.

<sup>6</sup> Michael Mcfaul, Russia Under Putin,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1, Number 3 July 2000, p.19.

<sup>7</sup> Michael Mcfaul, The Myth of the Authoritarian Model How Putin's Crackdown Holds Russia Back,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 February, 2008, Volume 87, Number 1, p.70.

<sup>8</sup> Michael Mcfaul, The Myth of the Authoritarian Model How Putin's Crackdown Holds Russia Back,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 February, 2008, Volume 87, Number 1, pp.70-75.

<sup>9</sup> Michael Mcfaul, The Myth of the Authoritarian Model How Putin's Crackdown Holds Russia Back,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 February, 2008, Volume 87, Number 1, p.84.





麦克福尔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同情倾向与对普京的极力反对会让人产生有意思的联想。这位维护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学者典型代表了欧美学者思考俄罗斯政治转型的重要立场。在这位学者的眼中，“自由民主”是最高的价值体系，而且不容分割，“可控民主”，“选举民主”等一切制度设计不符合“自由民主”的标准就等于违背了最高的价值体系，应该受到批判和指责。这种明显的价值观倾向影响了麦克福尔对普京的公正评价，也使得其分析俄罗斯的政治变革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事实上，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结束了政治经济相对混乱的时期，建立起比较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也正是在这一秩序下，俄罗斯的民主才能真正的生根发芽。普京的民主虽然被看成是“可控的”(managed)，但普京从来就没有否定过民主，其保留了自叶利钦以来的民主遗产。这种强人政治的出现不仅是社会需要，也是民主长远发展之需。如果仅仅从一个角度看到普京为实现社会稳定而采取的部分措施就否定普京对俄国政治进程的“民主化”努力的话，那就显然没有看到整体的俄罗斯的“民主气氛”的活跃，没看到俄罗斯中产阶级的成长和俄罗斯民众对民主政府期望增加等维系和实现民主的关键因素。

## (二) 经济的革命：计划经济·自由化·寡头经济

麦克福尔相信经济转型对政治转型的影响非常巨大，甚至可以说经济转型能够改变政治转型的方向。但是，他还是将经济转型的分析放在了政治转型的后面。正如他所说，成功的革命有一个先后次序的特征：国家的变革在先，紧接着是经济变迁。<sup>1</sup>一个自主有效国家对国家的经济转型是必要的条件。<sup>2</sup>虽然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当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之后，强国家自然需要从市场领域退出，但是在此之前一个强国是必要的。一个国家的转型不仅涉及到制度的变革，还涉及到程序，组织，规范和规则的变更。<sup>3</sup>在麦克福尔看来，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叶利钦和盖达尔政府的急速私有化的“休克疗法”不仅扫除了自苏联以来社会主义那样的使用“强力、暴力和集体谋杀的手段”完成任务的极权主义弊端，还为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改革铺平了道路，为俄罗斯的新型政治转型奠定了基础。<sup>4</sup>

在盖达尔的领导下，刚建立国家的俄罗斯立即放开价格和贸易管制，并接着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sup>5</sup>这一私有化暴露出俄罗斯经济的许多问题，脆弱的经济基础和长时间的通货膨胀使得盖达尔当初坚持的“国家到最后干预越来越少”的理念不断受到冲击。麦克福尔认为盖达尔在争取时间，即争取让经济衰退的时间早于社会信任度崩溃的时间。盖达尔清晰认识自己将不会在政府中担任长久的职位，所以他的目标就是在他退任之前俄罗斯的市场化变革已经得到稳定。<sup>6</sup>

麦克福尔分析经济转型的范式与其政治转型的范式分析基本相符，其重要的目标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自由民主”服务。他自然地认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是为俄罗斯的政治改革扫清障碍。俄罗斯的经济改革的目的并不单纯，它是改变政治势力对比的重要手段。

<sup>1</sup> Michel Mcfaul State Power,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Privatization in Russia, World Politics 47, January 1995, p.213.

<sup>2</sup> 这一论点在麦克福尔的论文中已经得到梳理，参见 Michel Mcfaul State Power,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Privatization in Russia, World Politics 47, January 1995, p.213.

<sup>3</sup> Michel Mcfaul State Power,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Privatization in Russia, World Politics 47, January 1995, p.215.

<sup>4</sup> Ibid, 225-230.

<sup>5</sup>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著，《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153页。

<sup>6</sup> 同上，155页。



这一点在随后的第二共和国的发展进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得出来，盖达尔的私有化政策形成了许多新的利益集团，市场经济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获益，并牢牢确定其地位。产权、竞争和市场意识逐步形成，对抗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观念开始在俄罗斯人的心中占据重要位置，俄罗斯经济开始复苏。一时间市场经济的发展蒸蒸日上，而政治制度的改革也有所进展。

然而，这一连续性被普京打破了。麦克福尔认为普京利用市场经济改革的成果采用非民主化措施。<sup>1</sup>他使用公共物品（例如下表中<sup>2</sup>的自由住房指数）论证了在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的GDP的高速增长是通过牺牲本来应提供给普通大众的公共物品和经济福利为代价。<sup>3</sup>



换句话说，麦克福尔认为，经济急速变革后的国家应该放下手中的权力，尽量少干预经济的发展变迁。但是普京的大政府逻辑完全改变了这一进程，“越大越好”成为麦克福尔讽刺的对象。这种经济转型在麦克福尔看来不是更好而是更糟糕，又走向安哥拉的寡头经济的可能。<sup>4</sup>

麦克福尔于此将俄罗斯与中国和安哥拉进行了比较<sup>5</sup>：克林姆林宫的官员和处理公共关系的职员们频繁将中国作为一个模式：似乎连续三十年保持年度经济增长在10%以上的现代化独裁国家。俄罗斯同样羡慕的是俄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性大国。如果中国是成功的威权主义新模范，那么俄罗斯将会是下一个。

麦克福尔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例外”，而不是一个“规律”。<sup>6</sup>有中国这样的权威国家的经济成功存在，同时也存在很多相同的失败国家如缅甸、刚果。<sup>7</sup>而对于俄罗斯来说，稳定但缓慢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权威国家如中国这么好运气的。麦克福尔在此得出结论，认为普京的冒险行动不仅摧毁了俄罗斯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影响了俄罗斯的经济的可持续性。这不仅危害了俄罗斯的“自由民主”的建立，也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经

<sup>1</sup> Michael Mcfaul, *The Myth of the Authoritarian Model How Putin's Crackdown Holds Russia Back*,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 February, 2008, Volume 87, Number 1.

<sup>2</sup> *Ibid.*, p.71.

<sup>3</sup> *Ibid.*, p.71.

<sup>4</sup> Michael Mcfaul, *The Myth of the Authoritarian Model How Putin's Crackdown Holds Russia Back*,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 February, 2008, Volume 87, Number 1, p.71.

<sup>5</sup> *Ibid.*, p.76.

<sup>6</sup> *Ibid.*

<sup>7</sup> *Ibid.*





济的未来”。

### 三、民主化：美国的责任

作为影响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的俄罗斯问题专家，麦克福尔在美国政府对俄战略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在的麦克福尔是奥巴马内阁的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不过其任务并不轻松。作为对俄罗斯民主强烈支持和对“俄罗斯极权回归”的强烈反感，麦克福尔的立场遭受众多的批评。许多人指责麦克福尔与国际上的新保守主义运动有所联系，并称其为“冷战斗士”。<sup>1</sup>而麦克福尔也并不隐藏其立场，在他的多篇文章中他表达了对俄罗斯民主倒退的反感以及对普京的不满。<sup>2</sup>不过，麦克福尔观点却提供了一个理解当代美国对俄政策理论基础和实践动向的重要窗口。

在麦克福尔极具美国特色的文章《民主和作为国际规范的民主实现》(*Democracy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as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as International Norms*) 展现了他对“自由民主”的热切推崇，他拒绝同意德米特里·西美斯(Dimitri Simes)所提到的“追求普适的乌托邦会损毁美国利益”。(*Pursuit of a universal utopia is damaging American interests*)<sup>3</sup>他认为当今在世界上推广民主仍然是有价值的，这是因为<sup>4</sup>：

第一，民主作为一种国际规范比在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第二，今天将推广民主制度作为对外政策的一部分比过去获得更多的认可。

第三，美国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国家，推广它不仅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其他国家的发展之需，只有这样，国际规范才能真正称之为国际规范。

麦克福尔根据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民主分析，确定民主是最好的政府体系。虽然上个世纪美苏之间的竞赛属于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较量，而今，美国又遇到一个新的竞争对手，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的威权主义。<sup>5</sup>这一系列的手的持续存在使得美国有必要加强对自由民主的宣传与推广。

这一立场非常契合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单边主义观念，美国也是在这种立场之下发动了打击“反对自由民主的美国”的基地组织，打击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同时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不遗余力地推进民主。

麦克福尔不仅仅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实践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就曾经帮助俄罗斯民主集团与西方国家取得联系，以支持其活动。在研究俄罗斯转型的过程中，麦克福尔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在莫斯科推广“民主”的重要性。在对俄罗斯的领导人叶利钦的评价中，

<sup>1</sup>关于美国坊间对麦克福尔的有趣的评论可见，“How Much Worse Can Obama's Foreign Policy Team Get? I Give You MichaelMcFaul, January 17, 2009,6:33PM”。

[http://tpmcafe.talkingpointsmemo.com/talk/blogs/dan\\_k/2009/01/how-much-worse-e-can-obamas-fore.php](http://tpmcafe.talkingpointsmemo.com/talk/blogs/dan_k/2009/01/how-much-worse-e-can-obamas-fore.php)

<sup>2</sup> 其中较为典型的文章有他在2007为外交关系委员会所作的陈述：“Russia: Rebuilding the Iron Curtain”;以及2008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见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The Myth of the Authoritarian Model How Putin’s Crackdown Holds Russia Back”, Volume 87, Number 1, January/February, 2008.

<sup>3</sup> Michael McFaul, *Democracy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as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as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ume 28, Issue 1, Winter 2004, p.147.

<sup>4</sup> Ibid., p.148.

<sup>5</sup> Michael McFaul, *Democracy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as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as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ume 28, Issue 1, Winter 2004, p.149.



麦克福尔就谈及，叶利钦和俄国革命者并没有享用设计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所带来的好处。<sup>1</sup>他们要先处理苏联解体后剩下来的帝国，经济改革，政治变迁的问题。<sup>2</sup>过去的阴影对后苏联时代的发展影响巨大，造成后苏联的“革命者”用暴力来解决转型问题。麦克福尔在表达对叶利钦的惋惜之情的同时大加批判普京主义，并认为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不确定的未来”。<sup>3</sup>正是这层坚定的价值观使得麦克福尔对小布什总统的第二届任期为了反恐与普京寻求合作而放弃“推进民主”的错误看法。<sup>4</sup>麦克福尔认为，在前苏联解体和俄罗斯国家建设的巨大变迁时期，美国仅仅提供民主的信息，而却没有对其所作出的民主选择给予充分的指导。在俄罗斯的制度设计期间，美国仅仅对政党、贸易联盟和市民社会进行浅层的帮助，这些努力对俄罗斯民主社会的培育并不够。最后，当普京上台后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限制民主发展的政治变革，美国竟仍然不去加以阻止。<sup>5</sup>对于如何推进俄罗斯的民主，麦克福尔也提出了自己的3M策略<sup>6</sup>：

首先，在特定时刻（at certain moments）涉及到特定议题，美国政府和大量的非政府主体要以积极的方式推进苏联和俄罗斯的民主化。

其次，在危机关头（at critical moments）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应该要直接帮助俄罗斯精英组织独裁行动或者扭转这种行为。

最后，在俄罗斯政治制度设计的关键时刻（at key moments），美国组织应该提供给俄方关于不同选举法律、法律实践、联邦主义等西方经验，为俄方提供观点，模板和进行此种决策的自信。

上述这些态度和措施反映了麦克福尔对俄罗斯的民主化的坚定立场。这无疑得到了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普遍赞同。小布什总统的处于反恐之需的考虑与普京交好引起了麦克福尔的不满，他认为这等于是承认了俄罗斯“独裁统治的存在”。<sup>7</sup>

布什政府的最后任期并没有缓解与俄之间的矛盾，反而激化了美俄矛盾。而此刻美俄之间的政府改组也在悄然进行。2008年5月，梅德韦杰夫总统取代普京成为俄罗斯国家元首；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取代小布什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美俄两大国之间的最高领导人的更换，无疑为美俄关系的重新发展带来了新的内涵。美俄关系在2008年由于军事安全和格鲁吉亚的八月战争“阴云难散”。美国需要获得喘息的机会重新应付被“硬权力”过度使用的布什政府所带来的外交式微，提出了“巧权力”的概念，而梅德韦杰夫也在寻求各种方式积极谋求俄美关系的改善。麦克福尔临危受命，成为奥巴马的对俄幕僚的核心成员，对美俄关系的发展发挥重大作用。2009年，俄美关系的重启，不仅是奥巴马政府开展“巧实力”外交，化解小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理念给美国软实力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也重新塑造了美国在俄国心目中的形象。2011年5月31日，作为重启的设计师，麦克福尔被美国总统授命为俄罗斯大使，以表明美国继续增强对梅德韦杰夫的支持和改善俄美关系的决心。<sup>8</sup>作为美国政府官员的麦克福尔，此刻考虑的问题更多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对民主的推进的渴望也因为

<sup>1</sup> Michael McFaul, Yeltsin's Legacy, *The Wilson Quarterly*, Vol. 24, No. 2, Spring, 2000, p.51.

<sup>2</sup> Michael McFaul, Yeltsin's Legacy, *The Wilson Quarterly*, Vol. 24, No. 2, Spring, 2000, p.51

<sup>3</sup> Michael McFaul, Russian Democracy: Still Not A Lost Cau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3:1, p.172.

<sup>4</sup> Timothy F. Colton and Michael McFaul, America's real Russian Allies,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6, 2001, p.54.

<sup>5</sup> Michael McFaul, *American Efforts at promoting Regime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n Russia: Lessons learned*, discussion draft, Sep27, 2004.

<sup>6</sup> Ibid.

<sup>7</sup> Ibid.

<sup>8</sup> Joby Warrick, Obama to name McFaul as ambassador to Russia, *The Washington Post*, May31.



成为政界人士而有所回落。麦克福尔此刻关注的是，发展对俄的多维关系，而不仅仅停留在军控领域，强调导弹防御体系合作和支持俄罗斯加入WTO作为美俄的核心议程。麦克福尔从仅仅考虑推进俄罗斯民主到全面思考美俄之间的关系是其思想从“理想”到“现实”的巨大转变，是从学界到政界的职能的转变。麦克福尔推进民主的责任将更多地依托在未来的可能继任者——梅德韦杰夫身上，而这次大使之任也隐含着美国对梅德韦杰夫连任总统的支持。

#### 四、结论

作为一位在美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很有影响力的俄国专家，麦克福尔对俄罗斯的认识是极其复杂的。这里既有在冷战时代养成的“反苏”情绪，也有在对苏联解体中和之后产生的同情和支持俄罗斯民主和发展的成分。麦克福尔一直号召在俄罗斯转型期间推进俄罗斯的民主，同时也开始强调发展美俄关系，提升美俄合作水平。从学术思想上看，麦克福尔对俄罗斯转型分析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使用大量的一手材料给我们描述出一幅清晰的转型期图像，并探索了转型理论的可能性；第二，麦克福尔开拓了转型理论的“人”的分析架构，为我们理解更多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提供一个清晰的视角。从外交上看，作为奥巴马对俄幕僚的核心成员，麦克福尔一直强调与俄国“重启”（Reset）关系，多层次发展美俄关系，不仅提高了美国的软实力水平，也顺利地部分完成了奥巴马交给其用巧实力提振美国外交的任务。麦克福尔即将成为美国驻俄大使，而这一职位又将给麦克福尔以新的视角去思考和处理美俄关系。

虽然麦克福尔对美国的俄罗斯研究和俄美关系贡献颇多，但是他还是一个坚定地“自由民主论者”。作为“民主化”的坚定支持者，麦克福尔到美国总统布什和奥巴马的信任，他认为在9·11恐怖事件之后，美国得到了俄罗斯的坚定支持。<sup>1</sup>但这并不意味着美俄关系将因此改观，美国要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和平只有在苏联解体之后并且民主价值观在整个俄罗斯存在的时候才会出现”。<sup>2</sup>美国需要的新的盟友，而不仅仅是对抗恐怖主义的权宜之计，并为俄罗斯提出了成为“美国盟友”的主要标准。美国不仅作为一个霸权国承担全球公共物品的责任，而且必须要坚定支持俄罗斯等后共产主义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民主化进程，道义合法性是美国走到现在的重要因素。<sup>3</sup>因此，对于美国而言，民主化“俄罗斯”还是一条很长的路，是“未完成的革命”。<sup>4</sup>他同时也看到，在美俄关系恶化的现实情况下，无论如何推进“民主”化，都不能改变俄罗斯至今仍处在“可控民主”下的现实。美国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先从改善美俄关系入手，将美俄关系作为民主化俄罗斯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支持“自由民主”精英，达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转型的目的。因此，对麦克福尔来说，俄罗斯转型至今仍是一个需要完成的课题。

（责任编辑：孙超）

<sup>1</sup> Timothy F. Colton and Michael McFaul, *America's real Russian Allies*,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6, 2001, p.46.

<sup>2</sup> *Ibid.*, p.58.

<sup>3</sup> *Russia and America: How close an Embrace*,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20, No.4, Winter,2003/2004,p.75.

<sup>4</sup> James M. Goldgeier, Michael McFaul, *Power and purpose: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after the Cold War*,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 printed by R.R.Donnely, Harrisonburg, Virginia,2003.



特约稿件

## 社会网络、结构分析与国际关系

——评《国家的网络：国际网络的演变、结构和影响，1816-2001》

陈冲 刘丰\*

**【内容提要】** 社会网络分析（SNA）近年来开始被广泛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中。齐伟·毛兹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提出了关于国际关系演变的“国际政治网络”（NIP）理论。他将国际关系视为一系列冲突性与合作性网络互动的结果，通过探究这些网络的形成、变化以及互动，对国际关系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这一理论从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出发，综合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核心假设，提出“国家的战略参照组”（SRG）的能力和结构对国家层次、双边层次、体系层次上的国家行为和过程的具有显著影响。毛兹的理论不仅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注国家属性和特征对其行为的解释框架，而且通过分析网络结构和行为体的位置的影响，丰富了社会网络分析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国际体系 网络结构 社会网络分析 分析层次

社会生活的“复杂性”（complexity）常常被认为是理解国际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关键，诸如推动国际关系发展的动力有哪些，国际关系乃至国际社会是如何演变的，又具有何种影响等问题常常因其具有的复杂性而鲜有一致的回答。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设计解释模型、发展相关理论来简化这些复杂性，了解它的特性，进而探究它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国际关系现实的理解，而且也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可以说，简化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的动机直接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

在新近出版的《国家的网络：国际网络的演变、结构和影响，1816-2001》<sup>1</sup>一书中，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政治学系教授齐伟·毛兹（Zeev Maoz）提出了一个全新理解国际关系演变和影响的复杂性的理论。在这部尚未正式出版就已广泛引用的著作中，毛兹通过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简称 SNA），将过去两个世纪复杂的国际关系演变进程看作是国家之间存在的一系列合作与冲突等互动网络演变发展的结果，从而构建了一个解释国

\* 陈冲，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刘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

<sup>1</sup> Zeev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6-200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际网络形成和演变的“国际政治网络理论”(Network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简称 NIP)。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第一部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专著, 全书视角新颖, 论证清晰, 不仅补充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一系列经典国际问题的回答, 而且拓展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空间, 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理解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具有重要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 受哈佛大学学者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等对社会结构的数学模型研究的推动而得到广泛运用。<sup>1</sup> 它不同于传统的类别属性研究路径, 而是通过将社会关系视为一种持续的互动模式(即社会网络), 着眼于行为体的位置及相互关系, 而非行为体本身的属性。<sup>2</sup> 除了在传染病、物理、数学、生物以及计算机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外, 社会网络分析也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组织研究、社会心理学、人类学 and 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然而, 奇怪的是, 在政治学领域特别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中,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路径的研究并不多。<sup>3</sup> 那么,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否可以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 如果回答是, 如何运用这种方式科学地研究国际关系? 它与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路径有何不同, 它能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贡献何种新的知识?

事实上, 国际关系学者对于“网络”一词并不陌生。例如,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 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与“权力”(power)一样的核心概念, 它关注的就是国家之间的“关系网络”(relational networks)是如何塑造现代国际关系的关键特征以及如何影响国家的行为。<sup>4</sup> 尽管国际关系学者已经注意到国际关系的“网络化”(networked)本质, 但长期以来并没有意识到通过一种科学的方法研究国家之间的网络关系, 而大多停留在“网络”这一术语的使用上。人们使用“网络”这个术语, 但却没有领会其要义。一些学者并没有理解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与系统研究国际结构和过程之间的关联性, 另一些学者可能明白社会网络分析的某些方面, 但却将其局限为一种方法论或者测量关系的方式。<sup>5</sup> 然而, 国际关系是关于“关系”的一门学科, 网络分析同样应该适合国际关系的研究。<sup>6</sup> 鉴于此, 近年来一大批学者开始相信社会网络分析路径适合国际关系的研究, 并着手探究如何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国际关系。

<sup>1</sup> 关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发展历程介绍可参考 John Scot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Handbook*,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0, pp. 7-37. 该书中译本已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参考[英]约翰·斯科特:《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第二版), 刘军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sup>2</sup> Stacie E. Goddard, “Brokering Change: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2, 2009, p. 254; Michael T. Heaney and Scott D. McClurg, “Social Networks and American Politic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37, No. 5, 2009, p. 729.

<sup>3</sup> 关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近年来在国际关系领域研究成果的评述可参考: Emilie M. Hafner-Burton, Miles Kahler, and Alexander H. Montgomery, “Network Analysi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3, No.3, 2009, pp. 559-92; 陈冲、刘丰:“国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09 年第 4 期, 第 92-111 页。

<sup>4</sup>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 门洪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sup>5</sup> Heaney and McClurg, “Social Networks and American Politic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p. 728; 陈冲、刘丰:“国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 第 94 页。

<sup>6</sup> 例如米歇尔·希尼(Michael T. Heaney)和斯科特·麦克勒格(Scott D. McClurg)认为, 网络分析特别适合研究以下问题:(1)信息的流动;(2)协调、合作或信任;(3)非正式组织;(4)不同层次上的组织等, 参考 Heaney and McClurg, “Social Networks and American Politic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pp. 729-730。可以说, 这些问题同样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





在社会网络分析看来，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通过一定的联系形成了特定的国际网络。行为体（包括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就是网络中的“点”（node），“联系”（tie）界定它们之间互动的“规则”（rule）。国际网络包括不同的形式，既有合作网络（如安全同盟、贸易网络、对外直接投资网络、国际组织网络、外交关系以及文化网络等）；也有冲突网络（冲突也同样可以被视为国家在网络中的行为——国家A与国家B的冲突可能招致A或B的盟友也卷入其中）。这些网络涵盖了国际体系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维度，行为体在这些不同的维度上互动；与此同时，这些行为体本身也包含不同的制度、社会群体或官僚机构，包含着复杂的结构。可以说简化这些复杂结构需要一种一般化的网络理论。

然而，对国际关系领域而言，既有的社会网络理论除了结构社会学家对世界体系理论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之外，<sup>1</sup>并没有关注国家层次的网络结构和影响。政治学家对于网络在世界体系研究中，大多数研究主要探究的是系统的影响，而对于系统的结构、稳定性和演变原因的探究很少，这样我们关于国际网络形成、演变、互动及其影响知之甚少。国际关系学者则将国际体系视为一系列彼此互动的国家，这种互动受到特定结构下的一系列规则的管理，最重要的两个变量是大国的数量和国家之间权力的分布。<sup>2</sup>尽管这两种路径对国际结构是如何影响不同层次的行为或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它们对于国际体系在何时、为何以及何种条件下发生变化并没有提供有效的经验检验。<sup>3</sup>基于这些研究不足，毛兹在本书中提出了国际政治的网络理论（NIP）。这种理论将国际关系视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网络之间互动的结果，这些互动的网络既有冲突网络，也有合作网络，这些互动对国家行为和国际体系结果产生一种持续的影响，进而推动了国际关系的演变发展，这也是NIP理论的中心观点。<sup>4</sup>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显示，本书主要探究这些网络是如何形成演变的，它们如何塑造了国际结构、网络中的行为体如何互动，网络之间的互动及其影响。

## 二、国际网络形成和演变的理论

在毛兹看来，国际网络的出现是国家与其它国家形成或中断联系的选择结果。NIP理论就是关注这些网络的进化和演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NIP理论源于国家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的政策选择：国家领导人和政策精英最关注的是什么？他们如何应对国家面临的挑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是建构NIP理论的起点。毛兹认为，在无政府世界中，对国家安全和生存的关注是国家恒久不变的使命。这种安全关注根源于它们的外部生存环境和过去的冲突经历。由于许多国家都无法单独凭借自身的权力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因此它们需要结为同盟来应对敌对的国际环境带来的国际挑战。国家之间的同盟形成了一种合作性网络，国家对同盟的选择界定了安全合作网络的结构和影响，并“外溢”（spill over）到其它的合作网络（如

<sup>1</sup> 例如 Ronan Van Rossem, “The World System Paradigm as General Theory of Development: A Cross-National Tes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1, No. 3, 1996, pp. 508-527; David Snyder and Edward L. Kick, “Structural Position in the World System and Economic Growth, 1955-1970: A Multiple-Network Analysis of Transnational Intera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4, No. 5, 1979, pp. 1096-1126.

<sup>2</sup> 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参考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sup>3</sup> 在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主编的《网络政治》一书介绍了关于网络分析的“网络结构”和“网络行为体”两种研究路径，然而作为一本文集，该书对国际关系网络的探究仅仅是一种“掠影式”（snapshot）考察，参考 Miles Kahler ed., *Networked Politics: Agency, Power and Govern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sup>4</sup>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p.6-7.



贸易和国际组织网络),从而不仅影响了网络中的行为体的互动行为和过程,而且共同塑造了国际关系的演变发展。毛兹分两个步骤来建立他的国际政治的网络理论,首先他阐述了 NIP 理论的微观基础,这种微观基础存在于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其他国家形成合作性联系的动机和理性计算中;在此基础上,毛兹详细阐述了根据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文化范式抽象出的 NIP 理论,并通过考察 1816-2001 年的国际关系演变,系统检验了 NIP 理论的主要观点。<sup>1</sup>

### (一) 微观基础

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提供了一套分析国际网络特征的独特工具。<sup>2</sup> 作为社会科学结构分析著作,毛兹主要通过四种测量网络结构的指标——密度(density)、传递性(transitivity)、极化(polarization)以及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t)<sup>3</sup>——追踪了 1816-2001 年以来的安全同盟网络、国际组织网络和贸易网络的演变及相互影响。这四种指标既反映了国际网络的特征,又构成了分析网络之间相互影响的基础。在毛兹看来,国际网络结构的影响是双向的:网络结构既影响了行为体的战略选择和行为;反过来,行为体的战略选择和行为又会对国际网络的结构产生影响。

毛兹关于国际网络的形成和演变的国际政治网络理论(NIP)建立在国家的战略选择这一微观基础上。为了更好地界定国家选择的战略环境,他创造了一个概念:战略参照组(Strategic Reference Groups,简称 SRG)。SRG 指的是影响外交政策精英们对于国家安全挑战观念的国际环境,它关注的是国际环境中的一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决策者认为这些行为体在特定的时间点对威胁或机会的本质、重要性和程度产生即时的、直接的和深远的影响。<sup>4</sup> 这个概念构成了 NIP 理论的基础。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术语来说,SRG 就是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自我网”(security-related egonet)。在国际体系中,安全是国家永恒关注的目标,它促使国家找出对其安全的实际或潜在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对国家价值或资源的威胁或者获得其他资源的机会。因此,决策者会收集制定政策需要的相关信息。在理论上,任何关于国家外部环境的信息都可以被视为与政策制定相关。但是在实际中,大多数国家的利益范围比较有限——并非世界上的所有行为体或事件都与其安全相关。同时鉴于国家的情报收集资源有限,国家必须将目标锁定在有限的国家,这些国家被认为与国家的安全相关。这些目标国就是国家的“战略参照组”(SRG)。构成 SRG 的成员被认为对“焦点国”(focal state)(即网络中的“自我中心”国)的安全具有潜在或实际的影响。<sup>5</sup> 但是,哪些国家构成了焦

<sup>1</sup>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p.110-111.

<sup>2</sup> 本书第二章详细讨论了本书所用到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概念和测量方式,参考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chapter 2.更多关于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的讨论可参考: Peter J. Carrington, John Scott, and Stanley Wasserman, *Models and Methods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Stanley Wasserman and Katherine Faus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这三部著作同为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科学的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 32 部结构分析专著。

<sup>3</sup> 对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相关概念介绍,可参考 Scot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毛兹突破了传统社会网络分析对“相互依赖”的测量,并创立了测量“极化”的方法,参考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chapter 2; Zeev Maoz,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o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cross Levels of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3, No. 1, 2009, pp. 223-240; Zeev Maoz, “Network Polarization, Network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816–200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3, No. 4, 2006, pp. 391–411.

<sup>4</sup>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 111.

<sup>5</sup>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 115.



点国的 SRG 呢？

毛兹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概念上很容易达成一致，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操作。尽管如此，他认为通过将概念定义转化为可以观测的操作定义却是可能的。毛兹通过两个指标对这一概念进行操作：首先，他利用“国际环境的政治相关”（Politically Releva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简称 PRIE）概念界定了 SRG 的地理观点。PRIE 很好地界定了国家之间的战略相关性，尽管主要是在地理环境上；其次，在 PRIE 基础上融合 SRG 的功能特征，他将国家之间过去的冲突、竞争对手经历纳入到 SRG 测量中。在此基础上，毛兹将 SRG 放在了更为广泛的国际冲突的意愿—能力（opportunity-willingness）框架中。这种框架认为，国家之间的战争主要是因为国家具备极高的动机（意愿）和机会。机会主要通过国家的地理邻近性操作，而意愿则常常以国家之间先前的敌人或竞争对手，或者与国家敌人先前的战略联系操作。随后，毛兹将这 SRG 转化为社会网络分析中的自我网概念。网络中特定点的自我网是指与改组拥有直接联系的一组点，战略参照网络便根据近规则“i 与 j 具有战略相关意义”定义，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政策相关网络（politically relevant networks）和战略相关网络（strategic reference networks）。这些网络不仅将国家面临的战略环境缩小到一个更为直接相关的环境之中，同时也构成了国家行为的主要参照体系。

## （二）理论架构

SRG 构成了国家安全政策的微观基础，同时构成了毛兹的国际网络理论的核心概念。在对 SRG 进行操作定义后，毛兹开始建立它关于国际网络形成和演变的理论。他的理论融合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文化范式的核心假设。<sup>1</sup> 毛兹首先以现实主义理论关于国际非合作行为假设作为国际政治网络理论的基准模型（baseline model），吸收了现实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权力的观点。他认为：（1）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主要关注国家的生存和安全，（2）确保安全的最终方式是最大化国家权力，同时（3）国家对他国的意图存在本能上的怀疑。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在对外行为中觉得其 SRG 的因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地理因素（与机会相关），另一种是功能因素（与意愿相关）。一国 SRG 的数量和能力是国家最关心的两个指标。<sup>2</sup> 在进一步建立 NIP 理论之前，毛兹利用他所建立的国际冲突数据检验了 SRG 的效度和基于现实主义的假设。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SRG 确实对国家行为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而且存在很高的建构效度。然而，作为基准模型的现实主义观点的解释力却在 8%-25% 之间，这并不算高。这意味着还有更复杂的因素没有被挖掘出来，因此需要呼唤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其他解释。<sup>3</sup> 如果融合后两种模型，NIP 叠加在一起的解释力提高了，那么 NIP 理论就会更加完善和更具解释力。

在随后的理论建构中，毛兹正是沿着这条思路进行 NIP 理论建构的。他进一步分析了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关于国家行为选择的分析，将 NIP 理论从非合作网络扩展到合作性网络。在现实主义假设的基础上，毛兹又添加了建构主义关于国家认同效果的假设，即（4）国家的认同影响它对国际环境的看法。同时，根据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他修正了（1）

<sup>1</sup> 毛兹意识到了建构主义理论与文化范式之间的差别，这里文化范式主要指“文明冲突论”

（clash-of-civilizations thesis），他认为尽管将建构主义与文化范式“嫁接”在一起可能招致批评，但他认为文化范式同样接受建构主义关于社会现实和认同的社会建构对行为的影响这一核心观点，从而具有相似的影响，参考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p. 165-166.

<sup>2</sup>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 132.

<sup>3</sup> Ibid., p. 139.



关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认为尽管国家本能地怀疑其他国家意图(3)，但这种怀疑可以被(a)共同的利益；(b)共同的认同和(c)过去友好的互动经历所修正。<sup>1</sup>

根据这三种视角形成的NIP理论是如何影响国际网络的形成呢？首先，国家根据其SRG的总能力决定了安全威胁的严重程度，如果SRG的实力超过了焦点国的实力，那么焦点国就需要同盟来补充自己的实力。三大理论对此的解释是一致的。但NIP理论认为，合作的价值不仅在于积聚资源反制衡共同的安全威胁。换言之，国家试图通过合作增进相互信任、减少怀疑，进而产生广泛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从而增加它们的安全。成功和互惠的合作经历有助于减少未来的威胁，与此同时，也有助于在这种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中形成集体身份。其次，合作具有外溢效应，它可能从安全同盟网络中扩展到经济、制度合作中，从而形成经济网络和组织网络，反过来，在经济网络和组织网络中的何种也有可能增加安全合作的前景。<sup>2</sup>如此，NIP理论又解释了不同网络之间的互动及相互影响。NIP理论建立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据此梳理如下关于国际网络形成、演变和影响的机制，见表-1。在此基础上，毛兹提供了一个分析国际关系演变的“国际网络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毛兹并没有视“三大理论”为相互冲突的范式，更多地，他将三种理论对国家行为的解释视为一种补充，对这些不同范式的整合既不是简单相加，也非线性的。<sup>3</sup>他的理论建立在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上，借助SRG这一概念，将NIP理论更为严密地表述出来。作为一种结构理论，毛兹的NIP理论对国际网络的一个根本假设是国际网络是一种“突现网络”(emergent network)。这种“突现”结构具有以下特征：(1)非常新颖(在以前的系统中并没有观察到)；(2)网络之间是相关、连贯的；(3)具有全球(宏观)层次影响；(4)不断演变，是一种动态过程；(5)它是公开的，可以被认识。<sup>4</sup>这些特征直接决定了国际网络的影响，在随后的章节，毛兹系统地检验了这种网络结构和特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表-1 国际网络形成与网络结构

问题	现实主义范式	自由主义范式	建构主义/文化范式
<b>1. 网络形成的国家基础</b>			
(1)国家为什么愿意进行安全合作？	积聚资源以平衡它们的SRG的带来的挑战(机会或威胁)	积聚资源以平衡它们的SRG的挑战	1. 积聚资源以平衡它们的SRG的挑战 2. 文化相似国家共同身份的一种表达
(2)国家如何界定安全挑战(威胁或机会)？	根据它们的SRG数量规模和汇聚的实力大小	根据它们的SRG数量规模和汇聚的实力大小	1. 根据它们的SRG数量规模和汇聚的实力大小 2. 根据焦点国家与它的SRG成员国的文化差异
(3)国家何时可能	1. SRG与它们的焦点国	1. SRG与它们的焦点国	1. SRG与它们的焦点国家实力差

<sup>1</sup> Ibid., p. 179.

<sup>2</sup>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 181.

<sup>3</sup> Ibid., p. 110.

<sup>4</sup> Ibid., p. 147.





寻求盟友?	家实力差异越大 2. 其 SRG 的成员国数量越多	家实力差异越大 2. SRG 的成员国数量越多 3. 对民主国家而言, 体系中的民主国家越多	异越大 2. SRG 的成员数量越多 3. SRG 成员之间的文化相似性越低
<b>2. 双边网络形成过程</b>			
(4)哪些国家可以成为同盟候选者 (按照重要性降序排列)	1. 敌人的敌人 2. 非 SRG 成员	1. 民主国家与其他民主国家 2. 拥有合作历史的非 SRG 成员 3. 敌人的敌人	1. 文化上相似的国家 2. 民主国家与其他民主国家 3. 拥有合作历史的非 SRG 成员 4. 敌人的敌人
<b>3. 网络之间的外溢效应</b>			
(5)环境条件是否影响同盟寻找的模式?	否: 无政府状态一直存在, 这些条件不因时间变化而改变	是: 随着 SRG 的相互依赖和制度化加深, 对安全同盟的需求会下降	是: 根据洛克文化的 SRG 可推导出与现实主义相同的预期; 康德文化的 SRG 可推导出与自由主义相同的预期
(6)战略考虑是否影响贸易模式?	是: 战略商品的贸易限于同盟和非 SRG 成员; 其他商品贸易不受安全考虑的影响	最初是。随着时间变化, 贸易模式受经济考虑影响	在洛克文化的 SGR 中是, 在康德文化的 SGR 中不是
(7)其他类型的网络关系是否影响安全网络?	否: 安全网络独立于国际关系的其他维度	是: 经济和制度合作导致同盟的形成模式不同, 并产生了超出制衡原则所需数量之外的大量同盟	是, 经济和制度网络会社会建构了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变; 同盟在文化上越来越不同
(8)这些考虑对其他网络有何影响?	战略贸易网络: 同盟和战略贸易网络倾向于重合。一般贸易或组织网络中不存在这种重合	在同盟、贸易和组织网络中存在双向的外溢效应	在同盟、贸易和组织网络中存在双向的外溢效应。随着时间变化, 同盟在文化上越来越不同
<b>4. 系统影响——国际网络的结构特征</b>			
(9)出现什么类型的同盟网络?	极化的——倾向于两极	最初是极化的, 但是随着时间变化, 极化会下降	1. 洛克文化: 极化与文化一致 2. 康德文化: 极化下降, 聚类关系与文化相似出现差异
(10) 在同盟聚类或块中, 决定国家成员的因素有哪些?	1. 战略因素 2. 影响聚类和块成员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不会随时间而改变	1. 聚类或块成员最初由战略因素决定, 但是随着网络的成熟这种影响会减少 2. 在成熟网络中, 自由主义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加	1. 洛克文化: 战略和文化因素决定了聚类或块成员 2. 康德文化: 自由主义





(11) 不同网络中成员是否重合?	1. 在联盟和贸易网络中重复 2. 其他网络无法预测	1. 在联盟、贸易、IGO网络中重合 2. 文化网络无法预测	由于网络的文化归属所决定，所有网络成员出现重合
-------------------	-------------------------------	-----------------------------------	-------------------------

表格来源: Zeev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6–200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77-178.

### (三) 理论检验

在系统阐述 NIP 理论框架之后，毛兹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提供的分析工具和概念，以联盟网络、贸易网络和国际组织网络以及国际军事冲突 (MIDs) 数据在随后的章节中分别检验了 NIP 理论的核心观点及其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毛兹在本书关注的是过去近 200 年国际关系的演变，所利用的数据跨度时间特别大，这些网络在长时段里是否是一种稳定方式演变时，所以他假设每一年都会提供一组新的网络，<sup>1</sup> 因此在检验 NIP 理论时，毛兹主要采取横截面时间序列分析 (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方法。作者在第六章中主要通过检验国家在何时、为何以及如何形成联盟、国家选择何种同盟证实了 NIP 理论关于网络形成的假设。同时，通过研究同盟网络与其他网络成员身份的重叠性检验了网络的“外溢”效益和对国际冲突的影响，从而证实 NIP 理论关于网络演变和网络结构影响的假设。

在随后的章节中，作者检验了 NIP 的影响。第七章主要关注影响国家在不同网络中的地位和威望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国家行为 (冲突和战争) 的影响。值得说明的是，毛兹对国家地位和威望的测量主要依据的是网络的中心度 (centrality)。这为国际关系中关于国家地位研究提出了一种可靠的测量指标。在第八章中，毛兹重新检验了民主和平论的悖论 (democratic peace paradox) ——民主国家很少爆发全面战争，并且也很少爆发短期的军事冲突，但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具有同样的冲突倾向，如果民主国家之间不相互打仗，那么随着国际体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体系中的程度应该减少，但是大多数经验研究并没有表明这种关系。毛兹根据 NIP 理论认为，民主化只有在 SRG 成员之间提高时才具有显著影响。在第九章中，毛兹考察了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和战略关系对国际冲突的影响，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他分别综合了敏感性依赖和脆弱性依赖的影响，经验数据支持了自由主义关于相互依赖在各个层次上能够减少国际冲突的观点。在第十章，毛兹修正了结构社会学家关于世界体系研究的不足，根据他自己设计的测量依赖 (dependence) 的指标，重新检验了世界体系理论关于国家的社会阶层地位与经济的关系。第十一章则检验了不同网络在国际体系中互动行为，在体系层次检验 NIP 理论关于网络结构的影响。事实上，在理论检验部分，毛兹悉心挑选了一系列国际关系的经典和热点议题 (如国际声誉与地位、国际贸易理论、相互依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民主和平论等)，从而提出了一些完全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新解释，这也更加突出了社会网络分析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颖贡献。

总体而言，毛兹通过对同盟网络、贸易网络、文化网络和国际组织网络提供的数据检验了 NIP 理论的核心观点，进一步表明 NIP 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影响。

## 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

<sup>1</sup>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 101.



在本书中，毛兹成功地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通过将过去两个世纪国际关系的进化视为一系列互动的网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范围。总体而言，本书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具有以下贡献：

第一，从理论视角看，毛兹提出的关于国际网络形成与进化的 NIP 理论综合了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核心假设，为理论范式之间的对话交流提供了新的范本。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三种主流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既存在明显的不同，但也存在相似的观点，因而在解释国际行为和现象时，具有对话的基础。正如关于国际网络形成的假设中，从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合作出发，我们看到三大理论均认为国家选择安全合作的动机是为了积聚资源以制衡 SRG 的挑战。随后的一系列假设和观点，更多地展示了三大理论之间的相互补充。在此意义上，NIP 理论代表了三大理论综合的理论成果。

第二，从研究思路上看，毛兹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的路径将着力点放在国家的属性研究上，而是将从国家之间关系所形成的结构入手，探究网络的结构形成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毛兹的分析基础建立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之上，而社会网络分析就是一种研究社会互动关系的结构分析方法。从结构因素出发，国际网络的密度、极化、相互依赖以及传递性不仅对国际体系的民主化程度、战略关系和依赖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在体系层次上对国际体系的稳定发挥影响。这种结构分析方法，强调的是网络成员的位置及其关系，如在第十章世界体系研究中，毛兹发现网络成员的结构相似性 (Role Equivalence) 对其生产模式和增长模式的影响远远大于国家本身的实力、民主程度的影响。<sup>1</sup> 不过，强调结构分析并不意味着社会网络分析忽视行为的属性，例如，毛兹着重分析了国家的实力 (SRG 的实力) 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事实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将行为体的属性、关系和结构纳入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中。

第三，本书基于不同层次的分析突出了 NIP 理论的解释力度，并在不同的层次上对该理论进行了经验验证，很好地解决了国际关系乃至社会科学中的“分析层次”问题。分析层次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国际关系研究。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两方面：一是这个问题经常以定义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形式提出，即行为体的行为是由国际体系的结构所致还是单位体的选择和行为聚集的结果。在实际研究中，需要研究者常常用高层次的数据推测低层次的行为，从而容易导致“生态学谬误” (ecological fallacy) 的出现。<sup>2</sup> 从另一方面来看，分析层次既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许多经验研究，特别是关注于国际冲突的原因和影响的研究揭示出一个经验层次上观测的结果与另一个经验层次上获得的结果之间的不一致性。本书在处理不同分析问题时，借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很好地避免了这个问题。毛兹认为，如果行为体的根源在于国际体系的结构，那么这种结构特征的性质就可以用国际网络的属性

<sup>1</sup> 在之前的研究中，毛兹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结构对等性” (Structural Equivalence) 概念探究了行为体的位置对冲突行为的影响，参考 Zeev Maoz, Ranan D. Kuperman, and Lesley Terris, “Structural Equival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0 No. 5, 2006, pp. 664-689.

<sup>2</sup> “生态学谬误”是指将高层次的信息、经验、发现应用到低层次的分析单位上。如果研究理论是建立在个体层次上的，而利用高层次的汇总数据 (aggregate data) 作为对个体层次理论的根据，就有可能犯了生态学谬误。加里·金 (Gary King)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方法，参考 Gary King, *A Solution to the Ecological Inference Problem: Reconstructing Individual Behavior from Aggregate Dat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极、密度、中心度等)来测量。这些属性然后可以用来预测单位体的行为和属性。同样,如果我们认为因果箭头是从行为体的属性和选择指向体系的结构,那么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将体系结构视为一个“突现结构”,然后用这些单位的属性来研究网络整体的属性和过程。<sup>1</sup> 在本书中,毛兹的分析层次不仅建立在单个的国家层次,还包括双边层次、体系层次的网络,例如关于民主和平论悖论、经济相互依赖理论的检验等都突出了跨层次(cross-level)分析的特点。事实上,自从分析层次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提出来以后,虽然国际关系学者试图在不同的层次上(甚至层次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理论,但至今仍然缺乏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和方法,对于层次原因的分析更多的是一种叠加,不同层次的互动如何影响国际结果仍有待探索。鉴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层次分析上的重要贡献,毛兹在本书的分析中为国际关系研究解决层次分析问题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借鉴,将促进不同层次之间的互动研究。

第四,从研究方法上看,本书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严谨和科学特征,提供了一个经验研究国际冲突的“范本”。无论是在研究问题的提出、理论框架的构架,还是在假设检验过程中的变量操作化,统计结果的解读等,均遵循了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在检验NIP理论的相关假设中,毛兹依据大量的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任何一个结论都是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而得出。正是由于这种严谨,本书提出的NIP理论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此外,作者的分析也很好地区回应了国际关系领域所谓的“分析方法问题”。<sup>2</sup> 毛兹关于网络形成和演变的理论通过检验同盟网络、贸易网络、军备贸易网络、文化网络、国际组织网络等进行验证。这些网络提到了多种检验数据,基于此,毛兹的国际政治网络理论得到了强有力的检验。而且,由于作者的分析跨越了1812-2001年近200年的国际关系历史,毛兹在经验研究中对变量的操作、对数据的处理将为其其他类似研究提供很好的借鉴方法。例如,毛兹对同盟承诺的操作化、对敏感性相互依赖、脆弱性相互依赖、国家声誉等变量的操作化以及收集的数据将有利于相关方向的研究。此外,鉴于社会网络分析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经验数据测量上——毛兹受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启示,还涉及了许多适合分析国家关系特征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分析网络数据的软件。<sup>3</sup>

总之,毛兹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国际关系理论传统视角出发,提出了国际网络形成和演变的NIP理论,并系统地检验了该理论对国际体系和过程的影响。本书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的具体问题的结合、在研究方法上的跨学科结合均非常严密和规范。全书视角新颖,结构严密,不仅很好地回答了国际网络是如何演变的问题,而且对传统的国家关系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视角,不失为国际关系的结构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领域的一部佳作。

#### 四、不足之处和有待深化拓展的议题

尽管毛兹在书中试图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试图对国际关系的进化提出新的解释,他的NIP理论建立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主要理论范式之上,通过一种更为系统的分析框架将这些理论观点整合起来,从而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不过,无论是

<sup>1</sup>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 23.

<sup>2</sup> 这个概念由亚历克斯·明茨(Alex Mintz)提出,指对于同一主题使用不同的数据、方法、设计进行研究常常得到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结果,参见 Alex Mintz and Bruce Russett eds., *New Direction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ronting the Methods-of-Analysis Problem*,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4.

<sup>3</sup> 该软件可以在毛兹主页上免费下载,参考 <http://psfaculty.ucdavis.edu/zmaoz/networks/netsoftware.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11年3月17日)。





在理解建构还是在假设检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之处。

首先，本书在变量的操作上存在一些争议之处。SRG 是整个 NIP 理论的核心，毛兹通过地理邻近性、先前的冲突经历和战略对手作为 SRG 的策略指标。正如它对 NIP 理论的建构效度检验结果所表明的一样，这一操作概念虽然总体上与其概念定义相符，但却存在遗漏信息部分，这主要是由于操作定义产生的。例如，先前的冲突经历和战略对手反映了 SRG 的功能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在国际关系中并不存在永恒的敌人。在一个长时段来看，过去的敌人也有可能变成今天的盟友。更进一步地说，先前的经历并不是预测未来行为的一个可靠指标，因而毛兹的这种测量并不能很好地反应出 SRG 的演变。因此，对敌人或冲突经历的测量应该被限制在一个时间区间内，例如国际关系中常见的处理是以五年作为一个观察区间。

其次，本书在对统计数据的解读上存在不足。例如，在统计结果与 NIP 理论预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作者几乎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在社会科学中，这种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不一致往往成为发现新问题、建立新理论的重要突破点。因此，本书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确实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对确实数据的处理。本书采用了大量的历史案例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了 1816-2001 年近 200 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个时间段中，存在许多缺失数据严重限制了本书的分析效力。例如，贸易数据只追随到 1870 年，这严重影响了本书关于网络演变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毛兹对缺失数据的处理上仍有待改进。在毛兹对于这些缺失数据的处理方法是将其全部作为“0”来处理，然而在贸易数额中，“0”表示两国的没有双边贸易，这并不是一种处理缺失数据的有效方法，更何况贸易数据的缺失率甚至达到了 49%，<sup>1</sup> 这将严重影响经济因素的解释力度。人们完全有理怀疑贸易网络的检验效度——这种显著性极有可能是由于数据的偏差导致的。如何通过其他的渠道，收集更为完整的数据，不仅有助于补充本书解释不足之处，也有利于整个国际关系研究的进步。

不过，正如前文所述，作为第一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国际关系的著作，毛兹在书中的分析仅仅向我们展示了社会网络分析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很小一部分前景，还有更多的议题有待继续拓展。例如，贯穿全书的一个假设是国家是单一理性的行为体，尽管毛兹整合了自由主义理论的相关观点，但在数据分析时仍然将国家视为一个单一行为体，因此探究国家内部的结构特征是如何影响国家外部行为将是网络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遇到的一个主要挑战，毕竟社会网络分析将国家视为一个“点”，是一个同质性的“台球”。<sup>2</sup> 国内网络是如何与国际网络互动，并影响国际行为的仍有待拓展。在此基础上，也需要研究者收集更多关于国内国际网络的数据，以便进行系统的经验检验。从研究方法上看，社会网络分析涉及到许多复杂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工具，在未来国际关系的研究中，社会网络分析同样可以与其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正如毛兹在本书中主要使用定量研究方法一样。例如，在政治学研究

<sup>1</sup>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 294. 事实上，缺失数据是困扰所有定量研究（甚至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系统性的数据缺失会严重影响统计效果的解释效力，关于社会科学中缺失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可以参考 Roderick J. A. Little And Donald B. Rubin, *Statistical Analysis with Missing Data*,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7; Adam Davey and Jyoti Savla,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with Missing Data: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sup>2</sup> 对于国内特征影响如何影响网络中的点的外部行为的探索可以参考 Paul Thurner and Martin Binder, “European Union 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olitical Space Beyond The Nation-Stat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8, No. 1, 2009, pp. 80-106.



中，<sup>1</sup> 将社会网络分析与形式模型（formal modeling）结合起来正成为网络分析的一个新方向，然而在国际关系领域仍鲜有尝试。毛兹在书中强调了国家的战略选择对国家间的合作网络形成的影响，而以博弈论为基础的形式模型特别适合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将形式模型方法与社会网络分析结合起来将提供一系列新的关于国家关系互动的理解，这也是国际关系研究有待继续拓展的一个议题和领域。

从本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分析工具，它对概念的测量和操作需要严密的计算，对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陌生的读者来说，准确理解本书的理论观点仍具有一定的挑战，这也是本书为什么要用第二章来介绍社会网络分析的相关技术工具。这种复杂的技术阻碍了社会网络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广泛使用。事实上，这种情况正如作者在本书序言所述，“要让期刊的审稿人或研究项目的管理者相信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对这个领域贡献新的知识真是一件艰难的事……在每一篇文章中，我们都要花大量的篇幅解释社会网络是什么，如何界定网络等等。”<sup>2</sup> 因此下一步研究的重点便是如何将社会网络分析与国际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发展适合于分析国际关系的网络概念，让更多的人相信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对国际关系研究贡献新的知识和理解。

（责任编辑：孙超）

---

<sup>1</sup>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 376; Heaney and McClurg, “Social Networks and American Politic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p. 735. 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考 Mathew D. McCubbins, Ramamohan Paturi, and Nicholas Weller, “Connected Coordination: Network Structure and Group Coordination,”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37, No. 5, 2009, pp. 899-920; Robert Huckfeldt, “Interdependence, Density Dependence, and Networks i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37, No. 5, 2009, pp. 921-950; Matthew O. Jackson, *Social and Economic Network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sup>2</sup>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reface, xi.





### 利比亚问题

#### 【编者按】

执政长达 30 年，曾经叱咤风云的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在短短 18 天的时间里，就由于全国上下声势浩大的反政府抗议结束了政治生涯，这对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阿尔及利亚、伊朗、巴林、也门和利比亚等国接连发生反政府游行和示威，伤亡不断，中东北非地区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那里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整个世界。

本期时事焦点栏目就围绕利比亚局势展开讨论。

自 2011 年 2 月 15 日开始持续至今发生在利比亚的示威活动，从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开始，逐渐向全国蔓延，反对派要求从 1969 年就已经上台统治至今长达 42 年之久的革命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下台并进行民主变革。

以下是利比亚局势大事件：

2011 年 2 月 17 日	中东示威浪潮首次蔓延至北非国家利比亚。在利比亚第 2 大城市班加西，数百名反政府示威者 15 日深夜与亲政府人士爆发冲突。警方遭示威者扔石块和汽油弹，遂发射催泪弹、水炮和橡胶子弹还击，造成 38 人受伤。
2011 年 2 月 18 日	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发表电视讲话，表明不会辞职和离开国家，宁愿牺牲生命，并表示会强硬对付示威者。
2011 年 2 月 19 日	利比亚使用雇佣兵和军队向示威者发射了迫击炮弹并用机枪扫射。截至 20 日已造成 300 人死亡，逾 1000 人受伤。
2011 年 2 月 22 日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决定暂停利比亚参加阿盟及其所有附属机构会议的资格，直至其对本国人民的诉求予以回应。利比亚驻外大使纷纷请辞，切断与利比亚政府关系，强烈谴责利比亚政府暴行，表示卡扎菲失去所有正当性。
2011 年 2 月 24 日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发表演说。他对在游行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并指责以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策划危机，想在利比亚建立伊斯兰王国。
2011 年 2 月 26 日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1970 号决议，决定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禁止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及其家庭主要成员出国旅行、冻结卡扎菲和相关人员的海外资产等。
2011 年 2 月 28 日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首都的黎波里罕见地接受了美国 ABC 电视台的专访。他表示，利比亚人民爱戴他，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利比亚。卡扎菲说，利比亚人民爱戴他，“基地”组织才是利比亚国内动荡的幕后黑手。
2011 年 3 月 1 日	联合国大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决议，中止利比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资格。这是联合国大会首次中止人权理事会某一成员国的资格。
2011 年 3 月 8 日	反对派成立的利比亚“国家委员会”8 日向卡扎菲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卡扎菲在 72 小时内下台，此举方可保证其人身安全。否则，卡扎菲将面临人民的审判。
2011 年 3 月 10 日	法国正式承认利比亚反对派成立的全国委员会为代表利比亚民众利益的合法政府，并计划同此机构互换大使。法国是采取该措施的首个国家。
2011 年 3 月 12 日	阿拉伯联盟（阿盟）在埃及首都开罗的阿盟总部召开外长级紧急会议，讨论利比亚局势和下一步阿盟将要采取的对策。虽然利比亚政府的 7 人高级代表团已抵达开罗，但最终未能被允许与会。



2011年3月17日	联合国安理会以10票赞成，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1973号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要求有关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
2011年3月19日	利比亚政府军进入班加西，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首都再次发表电视讲话，他重申不会选择下台。他还表示已与阿拉伯国家联盟断绝关系。
2011年3月19日	法英美展开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利比亚总人民大会秘书长（议长）穆罕默德·兹韦19日证实，利比亚多处军事和民用目标遭到导弹袭击。兹韦在当晚举行的记者会上说，首都的黎波里和东部城市米苏拉塔遭到来自于某些西方国家的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建筑设施严重毁坏。
2011年3月29日	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决定成立“利比亚联络小组”，以便就针对利比亚采取的国际行动进行政治协调，并与利比亚各派建立联系。但非盟和利比亚各派代表没有出席伦敦会议。
2011年4月13日	“利比亚联络小组”首次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和美国、德国、西班牙以及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2011年4月30日	利比亚政府发言人穆萨·易卜拉欣举行紧急新闻发布会，宣布卡扎菲的最小儿子赛义夫·阿拉伯及3个孙子在当天北约对的黎波里的空袭中丧生。
2011年5月5日	“利比亚联络小组”第二次会议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与会各方谋求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当前利比亚战事僵局。

当卡扎菲利用雇佣军和军队向示威者发射迫击炮弹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因为人民有权通过示威实现自身利益诉求，且不论其是否是受人唆使。

然而，在利比亚事件中，我更关注亦跟为愤怒的是西方世界的所作所为。西方世界打着“民主”的旗号，对利比亚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其根本目的无非是想从利比亚庞大的石油资源中分一杯羹。北约部队口口声声承诺会保护平民，而事实却是因为他们的狂轰滥炸造成了更多的平民伤亡。

虽然卡扎菲的独裁统治应该受到惩罚，但也无需西方国家如此“假仁义，真小人”的替利比亚人民做主。

此外，利比亚局势的发展不仅对其本国影响深远，而且对该地区内各国甚至全球的影响都是巨大且难以预测的。

——程艳阳

利比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西方大国利益的斗争，对石油资源的争夺。西方各国石油集团在利比亚都有大量投资，为了自己的利益免受侵害，也为了推翻对西方政治态度多变的卡扎菲政权，于是西方各国先后发起了对利比亚的打击。可在这样的打击下，受伤最重的无非是利比亚人民。那么，弱国民众的利益又该怎样得以满足？弱国民众的人权又该怎样得以保护？本国统治者一人独大、政府走向腐化、国际社会成员借机谋取利益，民主改革的结果往往是走向更深重的灾难。西方的“民主”就真的是好的民主吗？弱国自身的意志就可以被忽视吗？国际关系中利益的争夺应怎样调和？打击背后，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刘佳琪

我从北方某高校得知一消息，利比亚全国的通讯服务及设备提供商是华为（该行业的世界第三大企业）。因而，反政府军的战争通讯极不方便，他们请求华为给反政府军提供一个独立的通讯终端设备，但华为拒绝了。后来在美国的干预下，终于从中东某阿拉伯国家引进



了一台独立的终端通讯设备。

我想，这很有可能又是某些新闻媒体编出来的无聊故事。

——维一

自由是什么？

不知怎的，想到这个词脑海中立刻浮现的人是切格瓦拉，为了自己的理想为革命牺牲的战士。其实换个角度想，切也是 lucky dog，因为他有为自己和人民的自由而努力过，而且最后这么多年后他仍然活在人们心中。

利比亚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心中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为了利比亚人民的自由？为了人权？为了报复卡扎菲狂妄耍人？为了报复卡扎菲的两面三刀支持台独？啊，No，本质和原因只有一个——经济利益、石油、或者说为了使自己获得经济利益的自由，这是他国袭击利比亚的终极原因。

对于多国部队袭击我是十分反感的。所谓官逼民反，这个“民”指的是本国人民，别国干涉就是干涉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凭什么？人权高于主权？放屁！但是这也确实无奈，国际政治就是这样没有人情味，它讲的是实力，是 power，谁的 power 大，谁就牛掰！从这一点上，近代很多革命家争取的自由、平等是那么的难以接近，这也是人类的悲哀。

再换个角度，袭击和反袭击最大的牺牲者与其说是自由和平等的梦想，不如说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没有生命，什么都没了。民众的要求从来不高，之前，他们失去部分自由，但起码和平在、家人在，为了自己爱的人牺牲自由，那才是自由的本质——LOVE。

——张元

中国在利比亚的损失谁埋单？

利比亚的动荡局势给中资企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中国企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电信等领域。受战争影响，许多在建项目被迫停工，中方蒙受巨大损失。此外，3万多名中国公民从利比亚撤出也需要一笔巨大的开支。

现如今中国有力量在各国投资，却没有相应的军事力量去保护，这值得中国政府去反思。以后中国公司去海外投资时，应将风险成本考虑进去，做一个详细的战略评估。

毕竟，中方企业迢迢万里去非洲无非是为了赚钱。到头来，钱未赚到，却饱受风险之苦，赔了大钱，实在得不偿失。

——王忠鹏

悲剧在重演，上次在伊拉克，这次在利比亚。西方以强力介入利比亚，是对还是错？是为了解放利比亚人民于水火之中？还是浑水摸鱼，乘虚而入，报当年一箭之仇？这些确实难以评判。而这次事件又岂是对错两字能评判的了？受苦受难的永远是黎明百姓。治愈以后利比亚的局势，我想还须看鹿死谁手，历史是不会责备胜利者的。

如果说绝对的权利会带来绝对的腐败，那相对的权利究竟该以何为准绳？国与国之间如何摆脱持续的敌对状态？试想西方的价值真的为全世界所接受并实施，就真的会永久和平吗？恐怕没这么简单。

——胡仕春

民主究竟是一种思想潮流，还是非常有优越性的制度，亦或是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在当今的世界恐怕无法找到简单直接的答案。曾经的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其制度精髓，曾经的欧陆群雄也寻找着普适的治国之道，而如今的超级强国美国也一直在宣扬其所达标的人类共有的理想。可问题是，如果这些追求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为何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会对此道理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上帝教世人向善，真主阿拉亦不会唆使人作恶，只是欧美的先进国们对上帝的改造能力存疑，对真主的领导力也不完全信任，所以冒着风险越俎代庖。



当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利比亚轰炸时，大家都是持谴责态度的。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我想不仅仅是因为石油、因为利益，更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世界理念在里面。这一价值理念有时候还是能解决问题的。一味的不干涉内政并不一定是好事。

——吴庆隆

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留下的是一个“塔利班”；伊拉克战争留下的是“更加混乱”；利比亚该走向何方？Who knows！清晰的只是所有有利益关切的国家一双双虎视眈眈的眼睛，一个非亲西方、一个专制的卡扎菲政权下去了，试问利比亚人民能过上更加和平、更加安乐的日子吗？

人民无罪，错的是政府。西方国家的轰炸死伤了多少人，这就是所谓的“人权”。倘若有一天美国也被这么轰炸，估计世界永无安宁。

弱国无外交，弱国无人权，弱国更无主权。同情卡扎菲，因为要下台也应该是被人民赶下台，而不是被“他们”！

——神合雪

事到如今，“中间道路”是最可行的。西方对利比亚实行“空袭+谈判”的策略是一权宜之计，也是一无奈之举。热衷于自由干预主义的西方大国已日渐缺乏实施海外干预所需的经济资源和民众支持，而正在崛起的“金砖五国”却对干预主义理念深感怀疑，要它们来接过西方的接力棒似乎不可预期。西方的力量与雄心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我担心有一天世界上不再有“警察”，不再有人关注弱国的人权与民主问题。

——王娟

卡扎菲只是一粒棋子，一粒被欧洲与美国所玩弄的棋子。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草原烈火”烧不尽，“黄金峡谷”春又生。看来，奥德赛的黎明最终是难有机会降临到的黎波里的海滩，帝国依旧在寻找着往日的荣光。

也许，上校的内心是难以平静的。但是，上校永远是上校。

——田艺伟

卡扎菲使用雇佣军，虽然没有导致反水的后果，但却极大的损害了卡的信誉。

但是，卡能坚持至今，雇佣军的作用绝不可小视。

我的建议是卡在初期就改革军队，并且保持利比亚当前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这是实践证明了的至今仍忠诚于他的力量。

——罗甘本

有人说，近年来全球一直充满着动荡，就好像地球这座火山进入了喷发期，进而引起一系列地震、海啸。而今年最令人关注的地震莫过于二：其一，日本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和核恐怖；其二，年初从突尼斯刮起的一系列政治地震。前地震已接近尾声，而后一地震还在继续！那么后一地震结束的标志是什么呢？显然很多人都把它归结为卡扎菲的下台。可以说卡扎菲在面对政治民主化、人民主权化等一系列海啸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他已成了强弩之末！历史早已告诉我们，一个抛弃人民的人，终究将被人民所抛弃！卡扎菲现在就是挡在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不管这块石头多大，相信人民的力量最终可以滴水穿石！

——马新伟

卡扎菲仍在硬抗，没有人知道利比亚的明天会是怎样。先不谈卡扎菲所制造的惨剧，先看看卡扎菲其人：曾经的红人，多以出位的举动博取人们的眼球，长达 42 年的统治，子女皆接受了西方精英教育，被视为利比亚民主的未来。但是如今一夜间变天，除了中东国家革命的波及效应外，西方国家的推波助澜恐怕也难逃其咎吧。

利比亚作为一个弹丸小国，总有点身不由己的感觉。政治是精英们的游戏，在这场危机





中，人民的立场是怎样的我在媒体中却没有看到。

——何文婕

中东北非目前发生的事件，有其深刻的原因。这些事件的发生有其国家内部复杂的背景，单单归咎到一两个因素永远都是错误的。但是，西方国家打着所谓的“民主”大旗对主权国家的打击，是一种非正义的行径，也是对人权的最大漠视，更是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嚣张体现。作为西方玩偶的国际刑事法庭拟对一国领导人的逮捕，更是强权政治的露骨体现。

——李沛

关于利比亚的“革命”，是否还有很多的深层次的变革在里头？这一点有待考察。这次“革命”是一场典型的国际关系事件，它所牵涉的势力、利益和原则远远超过利比亚这个国家本身所能承受的范围，升华为各种理念和制度甚至生活方式的较量场。

在这个宗教势力，恐怖主义、阶级矛盾、旧的王室势力甚至部族力量都能发挥影响的地方，小小的利比亚已经超过人们的理解视域。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不能有效地分析这个国家。当代学术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在利比亚不仅遭到了蔑视，更被讥讽的体无完肤；而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在应付此种新问题上也力不从心；更不用提及从心灵和历史出发的哲学和历史学领域了。

新的理解模式的需求已经出现，而如何满足这种需求？这不仅是社会科学界，更是人文思想界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对百科全书式的新的学人的要求已经摆在了历史面前，时代在召唤我们的努力。

——孙超

卡扎菲可比之前几次理性的多，要在十多年前，他可能会采取大规模的报复行动，或许会搞不止一个洛克比空难。只是这一次非盟又让他失望，看似美好的停火协议被北约的轮番轰炸弄成了浮云。这只能说明以下几点：一、西方的强权政治还是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二、非洲联合的路变得越来越漫长；三、不管你是强硬还是理性，在第一条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弱国无外交。

——李荟



（责任编辑：李秋悦、张元）





## 阿红译者宝典\*

作者：陈子恪、张玲 校订：刘骥\*

## I 译文规范与翻译技能

## 一、word 文档的处理

1. 统一将文件按以下格式来命名：“译者\_章节题目\_最后修改人\_修改日期.doc”（例如，czk\_ch1 试译\_liuji\_20091220.doc。但如果是未经他人修改的第一稿的话，不必写最后修改人）。防止因为修改文件而导致文档被覆盖。

2. 多页文档必须要加页码。

3. 将 word 文档统一存为 doc 格式，防止因格式不一致而出现问题。

4. 为了防止在复制粘贴时出现格式错误，粘贴一定要使用“无格式粘贴”。

5. 设置 word 文档的自动保存时间间隔为一分钟，防止突发意外情况导致文档丢失。

6. 尽量不使用自动编号，因为那样可能会在排版的时候出问题。

## 二、格式处理

## 1. 重要的概念与术语

原书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应酌情标出原文，并尽量保持前后一致；大多数人名在第一次出现时，应加上原文，并以括号标出；国内常见的外国地名、人名可不附原文，如马克思、纽约等。第一次出现的机构、法律、条约等名称都必须加原文，并保留原文的格式。

请注意：原书用引号的词经常是重要概念或术语，加原文是要加在引号外面，如：“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而不是：“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

2. 原文中的着重处（或斜体处），在译文中以楷体字表示，此处最好是使用老式的楷体 GB\_2312 字体，不要用新式的楷体，或者华文楷体，因为很多比较老式的电脑无法识别新楷体字。

如果原书中直接写了某本书的书名，并且这个书名也需要翻译出来的话，那么这时就不要再用楷体，改为“《书名》”的格式。

## 3. 保持原文格式：

原文的分段、空格、空行、引用都必须维持，在译文之中忠实地体现出来。自己加原文中没有的括号时要慎重。

## 4. 注意行距、字体的统一：

统一使用一倍行距。

\* 本文版权归南开大学阿红译社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传播。如有任何问题，请与以下人员联系：

陈子恪 chenzikenku@gmail.com 张玲 zhanglingnk@gmail.com 刘骥 liujipku@gmail.com。本刊已特获作者许可刊发此文。

\*陈子恪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 2007 级本科生；张玲 南开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 2009 级硕士生；刘骥 南开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讲师。



word 文档的默认字体调成中文宋体五号字，英文 Times New Roman 五号字；数字也一律使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不能用宋体。同时，当数字的位数大于三位时，每三位请加一个英文“，”，即分节号，如“9,800”。

### 5. 人名翻译：

在翻译姓名时，首先查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如果查不到再去查世界人名大辞典。非英语姓名，能看出来大致属于何种语言的，就直接查相应的译名手册，如果看不出来就查世界人名大辞典。当手头的工具书里都查不到这个姓名时，就用灵格斯和 Google 来搜索。

另外，一些常见的人名可以采用约定俗成的译法，不必拘泥于译名手册。如经济学家 Samuelson，译名手册译为塞缪尔森，这时可以按常见的译法译为萨缪尔森。

一般来说，书中重要的人名、地名、国家和一些学术专有名词都会被列在 index 之中。在开始翻译正文之前，最好先把 index 译出来，保证用词前后一致。

6. 翻译时请注意原文的缩写，如：文章中出现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y，后面又出现多次 NIC，你可以这样翻：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y，简称 NIC），以后可以直接用 NIC。第一次出现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NICs）时，该翻成：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简称 NICs），而不该是：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

7. 年代暂按以下格式翻译：1980 年代。

8. 翻译原文中的图表；如遇到复杂的图可以提交复印件，在复印件上的英文旁用铅笔标注中文译文。学术表格则必须使用三线表，三线表的制作方法在译社的电子资源里面。

9. 用“【页码】”将原文页码标在正文中，在原文每页的最后一句话结束处标。如【8】。

10. p.s. 如果翻译的原文只有纸版的，那么复印之后不要装订，散页用起来更方便。

## 三、注释处理

### 1. 译者注：

原文中如果有讲的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是典故，请加译者注予以说明。但是，译者注能不加就尽量不要加。译者注使用脚注，编号为\*，以防止与原文的注释混淆。每一页第一个译者注使用\*，第二个用\*\*，其余依此类推。注释完之后，请在最后加上“——译者注”。对于一些常见的人名，如康德、黑格尔、尼采等，不必加译者注。

### 2. 原文注释的翻译：

在翻译注释时要坚持一个原则：文献信息本身不必译出（包括标点符号），需要翻译的只是文献信息以外的词句和标点符号。

#### （1）原文中的夹注

① (Hirschman 1979, 98) 保持格式，翻译为 (Hirschman 1979, 98)。

② (cf. Remmer 1995, 103; and Kalyvas 1999) 翻译为 (参看 Remmer 1995, 103; 和 Kalyvas 1999)。

③ (e.g., O'Donnell, Schmitter, and Whitehead 1986; Diamond, Linz, and Lipsett 1989) 翻译成 (例如, O'Donnell, Schmitter, and Whitehead 1986; Diamond, Linz, and Lipsett 1989)

④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Schmitter eloquently express the inadequacy of standard interest group or class-based approaches:

During these transitions ... seem patently inadequate. (1986, 4-5)



此处(1986, 4-5)翻译出来应该是 (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4-5), 注释中信息不全的需要自己补充。但是, 如果这句话中有作者名, 并且标注了英文, 也可以不补全文献信息。

(2) 有些著作正文引用《圣经》经文, 也采取夹注形式, 这种情况下需译出夹注。如, 原文夹注“(Gn 3:23)”, 则应译为:“(《创世记》3:23)”。

(3) 如遇原文注释中原作者加上其解说或讨论, 此部分需全部译出。例如: For further comments by Merleau-Ponty on analytic philosophy, see his discussion in *Texts and Dialogues*, New Jersey and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1992. 顺序译出即: 关于梅洛-庞蒂对分析哲学的进一步讨论, 请参见他的 *Texts and Dialogues*, New Jersey and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1992。

注意: 解说中需要译出人名, 如果是第一次出现就应该加上原文。

英文的标点符号和中文的标点符号不能混用, 除非英文文献出现在中文的句子里, 如上一句, 英文的标点符号仍用在英文文献中, 但最后的标点是中文的句号。

(4) 如需要对原书注释加译者注, 请在原注之后, 以方括号表示。

(5) 注释号码和后面的字必须要有空格。

(6) 正文和注释中人名的翻译一定要一致。

(7) *ibid*, p.56. 翻译成: 同上, p.56.。

#### 四、翻译技能

1. 词: 为了保证对词语的准确理解, 翻译查词的时候不要上来就去看这个词的汉语释义, 而是要先从这个词的英语释义开始看(柯林斯)。对词语的理解一定要摆脱英汉词典的束缚, 从这个词最为原初的意义开始, 以一个 *native speaker* 的角度去思考揣摩这个词语, 理解之后再回到汉语中寻找恰当的替代词语。在这个过程中, 词典只是起一个校验的作用, 不能断章取义地截取词语的一些引申义来往译文上套。

(1) *Authors may carefully hedge their tentative arguments with caveats about...*, but most readers ignore the caveats and...

错译: 作者们可能会小心谨慎地避免对他们的试探性观点进行正面回应, 并且告诫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正译: 作者们会通过告诫读者其初步观点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来小心谨慎地捍卫其观点……

Note: *hedge* 这个词的最原初的意思是“树篱、篱笆”, *hedge the arguments* 即“把观点用篱笆围起来”, 也就是保护、捍卫观点的意思。而且 *hedge* 在做“避免正面回应、闪烁其词”这个引申义讲的时候, 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不可能后面再跟“观点”。

(2) *statistically reliable*

原译: 具有统计上的信度

改后: 统计上是可靠的

注: 这里讲的不是测量, 用“信度”是错误的, *overuse of terms*。不要乱用术语, 当用则用, 不该用则不用。

(3) 重视词义, 避免讹误。

*But it is the size of the sample which determines its accuracy*

原译: 决定统计精度(*accuracy*)的却是样本容量的大小。



改后：决定统计准确性（accuracy）的确是样本容量的大小。

注：accuracy 是准确性，与精确性（precision）有别。

### 2. 词组、句：

（1）坚持直译，尽量避免对句子进行意译，意译往往会改变作者的原意，使读者产生误解。

（2）但是，坚持直译不等于死译硬译，翻译的目的是要把英文翻成流畅的中文，而不是机械地把每个词语转化成中文后进行拼接。

eg:

**Remained largely descriptive for many years**

原译：多年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描述性的。现译：多年以来还主要是在描述。

Note：英语中可以大量使用 descriptive 这类词语，但是汉语中“描述性”这类词就给人以生硬之感，而且，这个词在汉语中也不适合做表语。

（3）只有在准确理解句意的前提下才能开始翻译，否则极易出错。

**The last thirty years have treated students of 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lmost as unkindly as the years did Ozymandias.**

错译：过去的三十年对待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的学者几乎跟奥西曼德斯的年代一样不友好。

正确译法：对于发展中国家政治的研究者来说，刚刚过去的这三十年很不友好。这几乎就跟岁月对奥西曼德斯的消磨一样。

Note：the years did Ozymandias 即 the years treated Ozymandias。

**Cruel and inconvenient facts, often available at the time of composition but not used, eventually...**

错译：残酷且令人不舒服的事实，常常是在创作的时候而不是在被使用的时候可得的，它们最终引起我们的注意并迫使我们放弃我们的创造。

正确译法：残酷且令人不适的事实，常常在创立理论的时候是可得的，但我们却没有使用它们，而这些事实终将引起我们的注意，并迫使我们放弃自己的理论。

Note：at the time of composition but not used 这句话不理解，but not used 连接的是主语 facts，与 at the time of composition 无关。

（4）应特别当心时态问题，尤其是原文中的过去时与完成时。一般而言，完成时习惯会加上“已经”，过去时会加“了”，进行时会加“正在”。但是，有些词在汉语中不管其时态如何，都习惯加“了”，那么也不必太过于在乎。

（5）虚拟语气译法用“本”：

eg：尽管这样一来，本可以实现对经济的干预以减少咖啡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脆弱性。但是他们却没有进行干预。

（6）尽量保持原句的语序和逻辑，不能单为说通某一句话而随意调整语序，打断上下文逻辑的连贯性，尤其是段末与段首的句子。

### 3. 留神易出错的结构：

省略





插入语

代词 it

插入语

虚拟语气

### 五、翻译经验

1. 在翻译的时候，没有看懂的句子或者是有疑问的地方，一定要使用批注或者是将文字标记为高亮，方便自己查看，也方便别人进行修改回复。

2. 如果一句话内有多个问题或错误，那么这一句话最好只加一个批注，尽量不要批注里面套批注。在修改和回复他人的文章的时候，可以直接回复批注。

3. 翻译完一章后一定要立即将自己有疑问的地方发给大家，限定时间讨论回复，然后一定要立即修改。请注意这两个“立即”，不要留待以后做，那样会更费时间，也会影响你以后的翻译。

4. 翻译初期一定要多讨论，一章完成后一定要给人试校并提供意见。第一遍太匆忙，以后怎么改都是很涩。就好比淘洗衣服一样，第一遍一定要到位，把肥皂水尽量拧干，这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5. 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翻译。只会添乱。

6. 翻译完成之后，一定要朗读自己的译稿，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文章中一些不通顺的句子和误用的词语。而且，不要只读给自己听，也需要读给没有看过原文的人听，直到他们也能听懂，觉得没有问题为止。

7. 当自己翻译的实在想吐，已经不会说人话的时候，翻一下大家翻译的经典书籍很有好处。也可以看一会经典的美剧，有同样的效果。

## II 信息资源的使用

1. 手机：在翻译期间，每天早八点到晚十点保持手机开机，以方便联系；换用响声较大的铃声，确保在嘈杂的环境下也能听到；不上课、不开会的时候，请不要使用静音或震动模式，那样容易漏接电话；与翻译有关的短信，请及时回复。手机或 SIM 卡有问题的，马上去修。

2. 邮箱：统一使用 gmail 邮箱；在邮箱里面建立联系人群组，重要信件一定要群发；每天至少登一次邮箱，及时回复邮件并下载附件；上不了网的地方可以用手机登陆邮箱，可以查阅和回复邮件。最为重要的是，一定要对邮件进行分类整理，所有有关翻译的邮件都要加统一的标签，以便查找。

3. 电脑：

(1) 在电脑中建立一个专门的翻译文件夹（不要建在系统盘里面），把与翻译有关的所有 word 文档、背景资料和翻译工具放到一起，不能与其他文件夹混淆，同时在翻译文件夹内建立分类子文件夹。

(2) 及时备份，除了在自己电脑中建立一个备份文件夹以外，还需要在一个不常用的 U 盘中建立备份，同时，每次在翻译完以后，需要把 word 文档上传到邮箱里，防止电脑和



优盘因染毒损坏而导致的文件丢失。

(3) 对电脑定期进行杀毒，维护系统；提防 U 盘病毒，推荐使用 USB Cleaner。

(4) 翻译期间需要经常阅读 PDF 文件，推荐使用 Adobe Acrobat（不是 Adobe Reader）和 pdf factory，Acrobat 可以对 pdf 进行 OCR 扫描和识别，pdf factory 可以自己用来做 pdf 文档。

(5) 用笔记本电脑翻译时，请把电池放上，防止由于突然断电而导致稿件丢失。

#### 4. 词典使用：

(1) Lingoes 系列词典，一定要安装 Collins、牛津高阶（英英、英汉）、Wikipedia 和 Roget 这几个词典包，同时也推荐朗文、麦克米兰、美国传统词典和大英袖珍百科。

(2) 其他姓名、地名和专有名词词典

《英语姓名译名手册》、《法语姓名译名手册》、《西班牙语姓名译名手册》、《德语姓名译名手册》、《俄语姓名译名手册》等姓名译名手册。

《外国地名译名手册》。

《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

(3) 其它相关工具书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牛津实用英语语法》、《政治学新词典》……

#### 5. 经典译文

董乐山的翻译总结：《译余废墨》，很好的一本翻译导论。另外推荐余光中的一篇小文：《怎样改进英式中文？》。

董乐山的经典译著：《1984》、《我为什么要写作》、《英国式谋杀的衰落》、《第三帝国的兴亡》等等。

凤凰与译林的牛津通识读本与外研社的斑斓阅读书系，是国外大家写的通识教育小册子，英汉对照，译文质量均属上乘，可供参考。

#### 6. 相关网络电子资源：

(1) 数据库：如 CNKI、维普、JSTOR、EBSCO 等，可以从这些数据库搜索并下载与翻译相关的文献。（充分利用附在后文的 bibliography，如果原文不好理解，就利用作者引用的文献来帮助理解）。

(2) 搜索引擎：

Google Scholar <http://scholar.google.cn/schhp?hl=zh-cn>

参见《浅谈用 Google Scholar 查找并获取外文文献的技巧和方法》

Alta Vista <http://www.altavista.com/> 一个相对比较学术的搜索引擎

One Look Dictionary <http://www.onelook.com/> 词典搜索引擎

(3) 电子书下载：

谷歌图书 <http://books.google.cn/>

新浪共享资料 <http://ishare.iask.sina.com.cn/>

超星 可以用 pdf factory 把 pdg 文档转成 pdf 格式

人文小屋 <http://www.97renven.cn/forum/> 大量优秀英文原版书



Ebookee <http://www.ebookee.net/> bt 电子书下载

人大经济论坛 <http://www.pinggu.org/bbs/> 大量的经济学类原版书、译著、教材。

搜集原版电子书链接的网站：

<http://library.nu/>

<http://www.cnshare.org/>

<http://www.ccebook.cn/>

最大的文件存放空间：Rapidshare

### 7. E-reserves

有一些 nice 的老师会把密码贴在 syllabus 上

Google 搜索：关键词+Electronic Reserves/E-reserves+password

比如："political economy"+" Electronic Reserves"+password

8. 经常性地跟踪最新出版的杂志，随时保持最新状态，定制 email alert

9. 电子资料的管理：利用 note express 或者 endnote。

## III 翻译团队的建设

### 一、准备工作

1. 几个统一：“规范”、“格式”、“关键词”、一套丛书（或一本书）的整体理念

团队合作是不同的人完成同一项任务，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就会有许多不同的标准和偏好，虽然可以结合集体的智慧，但是也可能因为风格的不同而导致任务最终无法完成。因此，统一是进行合作的首要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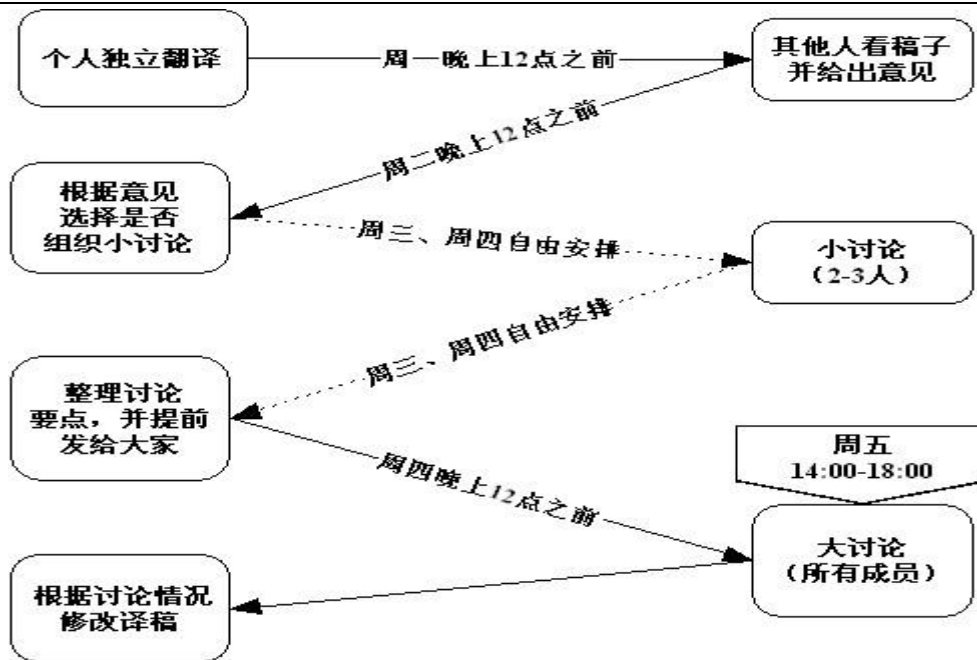
“规范”和“格式”在上面已经讲到。

“关键词”：一般是先翻译一本书的 index，统一主要的概念。在日后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如果有人认为某一概念的译法不是很准确，应及时电邮通知团队其他成员，并给出另一种译法的理由，由团队讨论决定是否需要更改。

对一本书来说，作者的整体理念一般体现在“导论”和“结论”之中，所以为理解作者写作的意图和整体思路，一般可以先统一翻译“导论”和“结论”，然后再开始各章的独立翻译。对一套丛书来说，大致的注意事项也是一致的，团队成员首先应该明确的是翻译这套丛书的意图和目标。

2. 分配每个人负责翻译的章节，制定总体翻译进度安排。

### 二、合作流程



1. 每周至少讨论一次，时间（每次约4个小时左右）和地点尽量固定下来，没有特殊情况不要改变；

2. “个人独立翻译”：在开始具体翻译之前，需要看完整章内容，并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了解背景知识；

3. “其他人看稿子并给出意见”：为避免重复劳动，最好指定一个人作为 partner 主要负责校对稿子；

4. “小讨论”：不一定是必须的，根据译稿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是和自己的 partner 进行讨论，也可根据其他成员的时间和意愿增加讨论的人数；

5. “整理讨论要点，并提前发给大家”：讨论要点应尽量简洁、清晰，标明中英文的几章、第几页、第几行等，以节省讨论的时间，并且要点尽量不超过15个，但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延长讨论时间或者增加讨论次数；

6. “大讨论”：团队所有成员必须参加，由负责的成员主持，讨论之前所列的要点。

### 三、注意事项

1. 改变他人预期：翻译讨论如果有事来不了或者需要提前、延后讨论的，请一定要在讨论前通知大家，以便改期；如果觉得交稿截止日期前交不上稿件，也请提前通知大家，确定缓交的日子。

2. 在细节上多站在他人的角度想问题：例如文件的修改和保存，尽量在批注中给出意见，不要在原文上直接修改或者变更颜色；每次给他人的反馈注意修改文件名，方便对方下载保存。

3. 加强团队的沟通与交流：任何变动和改动都要及时地通知团队所有成员，保持信息的畅通。

4. 试译，每个人在正式开始翻译之前，需要进行试译，试译部分约占其负责部分的十分之一左右。试译完成后，发给审校者审阅并由审校者提出意见和建议。

（责任编辑：李沛）





### 品茗闻道

#### 【编者按】

认识一位大师，品读一部经典，就如品茗，只有细细体会，才能理解其中真意。在学院此次大力推动的课程改革浪潮中，为与同学一起更好的研读经典，共同提高对经典的认知。编辑部特策划“品茗闻道”这一专栏，希望通过对大师的介绍，对经典的见解，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就此创办一个交流的舞台，一起领略大师风采，品味经典之作！本期专栏推出陈衡哲的《西洋史》一书。作者陈洁琼在解读该书的基础上，给我们展示了一本经典的深度，一个大师的风度。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充满无穷魅力的经典吧！

## 一个女性视角下的中国复兴

——陈衡哲和她的《西洋史》

陈洁琼\*

◇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叫我们明白他的。

◇我们当把文化作为历史的骨髓。凡是助进文化，或是妨害文化的重大事迹和势力，都有历史价值。这是这本历史取材的标准。

莎菲

20世纪20年代，中华时局激烈动荡，军阀割据，生灵涂炭，人心思定。文人志士以复兴为任，发奋图强，立志救国。陈衡哲，一位20世纪初期的新女性，虽身于封建旧世，却能以新世之思想，理性之力量，点明了图存之法。



陈衡哲，原名陈雁鸟，字乙睇，生在名门。其祖父陈梅生有12个子女；伯父陈范（《苏报》馆主）、父亲陈韬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诗人。祖母赵氏、母亲庄曜孚都是常州人，能文善画。陈韬是幼子，当过清朝的官吏。父母的才华在陈衡哲的五妹陈鹂的《父母小传》有所涉猎：季略先生（父亲陈韬的字）工诗文，擅书法……精鉴赏，收藏较丰。母亲庄曜孚曾师从恽派画家邑人袁毓卿女士学画，擅长恽派没骨花卉，是当时著名的画家。这样的环境中培养了陈衡哲深厚的国学功底。陈氏自幼因其聪颖故深得舅父庄蕴宽的喜爱，授之新学，并鼓励她上学。庄蕴宽去世后，陈衡哲写了一副感人至深的挽联：“知我，爱我，教我，诲我，如海深恩未得报；病离，乱离，生离，死离，可怜一诀竟无缘”。1914年陈氏考入清华学堂留学生班，成为清华选送

\* 陈洁琼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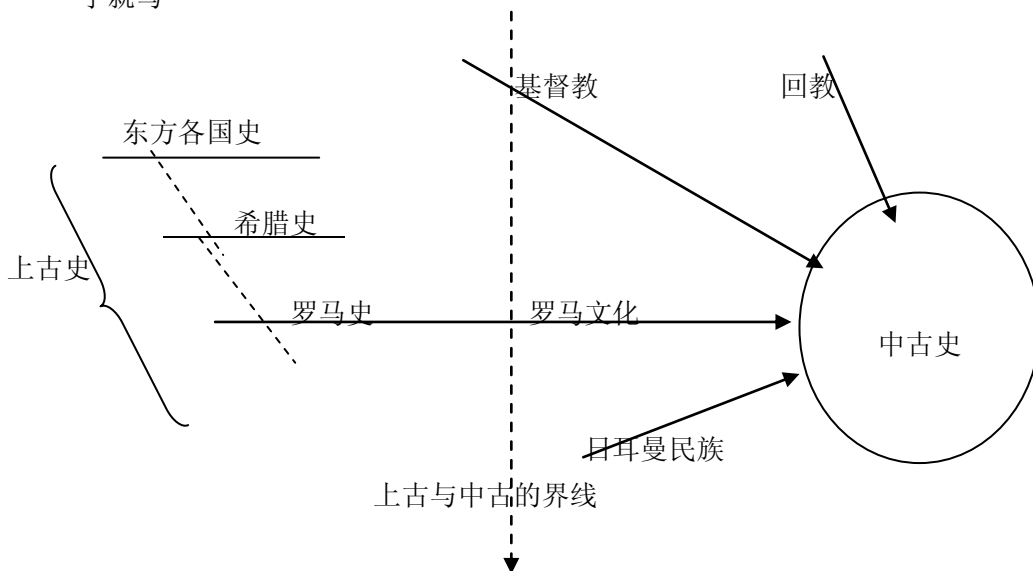


公费留美的女大学生之一。留美期间、她先在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1918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其入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先后在北大、川大、东南大学任教授。多个“第一”可以为这位才女注解，中国第一位公派女留学生，中国第一位以西洋史为专业的留学生，中国第一个白话文小说家，中国第一位新文学女作家，中国第一位女博士。《小雨点》代表了其在文学上的素养，《西洋史》则奠定了她在学术上的地位。

陈衡哲在《中国文化论集》中写到，“所谓西方物质文明，只不过是当代历史的产物，是文艺复兴后期科学发现的结果，而文艺复兴源头的希腊文明，也与现代西方文明不同，因为当时的生活方式几乎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完全相同，与今天的中国相差无几。因此，说到底，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差异的界限，与其说是空间的，不如说是时间的。因此，中国真正需要的与其说是西化，不如说是现代化”。在20世纪初陈衡哲就看到了现代化的意义，但是我们离开西方的帮助，不足以解决与西方接触而产生的问题，因此我们首先要看看西方是怎么做的。

由此，衡哲以文化为主线，并佐以“人”这个历史的创造者，细细勾勒出西洋的千年历史。

“自人类学明，而西洋历史不从埃及始；自生物学明，而人类的历史不从造物抟土为人始。”鉴于此，作者把西洋几千年的历史划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共为三个阶段。一个部分为上古史和中古史连个阶段。上古史以人的起源入手，渐次叙述人类在上古时期创造出的灿烂文化。上古史章章以文化为题，并辅之生动的图片，理清了人类早期的文明。中古史上承上古史，下逮十三世纪的文艺复兴。如下图所示，可窥见上古史与中古史的承接，作者同样把中古史分为四个文化部分，虽没直接用这些来命名各个部分，实则以这四个部分为大纲，细细详尽各个文化的由来和发展，及其之间的关系。第二分部为近世史阶段，作者虽只用十万字就写



了西方六百年的历史，但是简明扼要，提纲挈领，见解独到。这部分尤其对宗教的叙述最为经典。如：“教会的实力，本只是一个基督教义。他如小小的一颗明珠，本来是应该让他自由发光的。可恨此时他已是不但重锦裘裹，被他的收藏家埋藏起来；并且那个收藏家，又是匪外加匪，造巨屋，筑围城的去把他看守着，致使一般人士不见明珠的光华，但见一个围城



重重，厚壁坚墙的巨堡；堡外所见的，是守卒卫兵的横行肆虐。所以宗教革命的意义，不啻便是这个拆城毁壁的事业。国王欲取回本来属于他们的城砖屋瓦，人民要挥走那般如狼如虎的守卒，信徒又要看一看那光华久藏的明珠。于是一声高呼，群众立群，虽各怀各的目的，但他们摩拳擦掌，却是一致的。他们共同的目的，乃是拆毁这个巨堡。因此之故，宗教革命的范围便如是其重要，影响便如是其深远了。”

在文中处处可见其对中国救国之道的深思。“波斯战争之后，雅典和斯巴达的仇恨愈积愈深，白律苛司\*乃利用雅典人的心理，把反抗斯巴达的一件事，作为他的主要政策。我们试想，假使中国是一个民治之国，而又适有一个有才干有计谋的政界人物，在民国四年的夏间，来把反抗日本作为他的主要政策，一般的人民，还有不欢迎他为元首的吗？在同样的情况下，白律苛司此时乃做了雅典的领袖。”

但是，行文中凡涉战争，作者大都一笔带过，只分析其产生的背景环境。这在作者编辑《西洋史》的动机中可窥见其原因。她说：“我编辑有两个动机。其一，是因为近年来读史的结果，深悟到战争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同时，我又深信战争是一件可以避免的事。避免的方法虽不止一端，然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们愚弄人民的黑幕，却是重要方法中的一个。运用这个方法的工具，当以历史最有功效了。”一语道出战争不是解决乱世之道，我们应极力避免战争。那么除了战争西洋的历史还留下了什么呢？



文化。埃及古文化、西亚文化，希腊文化、罗马古文化、中古文化，这些文化一脉相承，代代相继，终至文艺复兴，方爆发出绚丽的烟花，夺人眼目。文艺复兴部分作者着墨颇多，亦为重中之重。

不仅在这本书中单列一章，而后再补增了一个小册子《文艺复兴小史》以更详述道尽文艺复兴。胡适在其《文艺复兴》中写到“1912年名义上的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虽努力想造就一个良好而高效的政府，但却未能如愿。这迫使一些有识之士将其注意力转移到一些与政治没有直接联系的其他问题上。他们厌倦了现实政治，而放眼四周，试图寻找，一些能够成为一种新政治秩序基础的更基本的要素。于是当时最有名的宣传鼓动家之一，多年参加活动的黄致庸，在1915年离开中国前夕，写下了这些悔悟的话：愚见以为居今论证，实不知从何说起。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至根本救济，近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为便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醒，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艺复兴，为中世纪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寄〈甲寅杂志〉记者》卷一）。中国的文艺复兴就这样开始了，其全部意义可以通过回顾现代欧洲国语崛起之历史而得到透彻的理解。”可见当时的有识之士把他们所推崇的“新文化”运动，看做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而陈衡哲在划分中古史与近世史把但丁死亡的年岁即1321年作为分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但丁是第一个运用意大利方言的作家。“方言的成为文学，也是文艺复兴中的一件大事。意大利因为与罗马的关系，拉丁的势力最大，所以他的方言的发达也最迟。但丁不但是第一个运用这个方言而胜利的；并且他能用了他的文艺的

\* 这里指的是古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



甘露，去吧那颗憔悴枯瘦的树，灌培滋养，使他开出鲜明美丽的花朵来。”可见作者也是认同这一观点的。

文艺复兴首先是关乎文艺的，是文艺的复生和新生。复生和新生把西方从黑暗的中世纪解救出来。把当时中国的时局，比照文艺复兴，以文化的改革来拯救中国，复旧学、兴新学，改变中国人的心理，变革中国人的人身观，来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文化救国可谓作者的深意。从中西对比中，剔除战争，抽出文化，以作为救国的明镜，此谓西洋史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但是，在当时的混战的情况下，我们当真就只用文化就能把中国从硝烟解救出来吗？

“但丁是那个重要的过渡时代的人，但是和他同时的人，何啻千万。我们为什么单要纪念他呢？这岂不是因为他对西方的文化，有特别的关系吗？过渡时代的人，比如渡河的人，有的是坐在船上等着上岸的，有的是被渡船挤到水里去淹死的，有的是去造桥的，但丁便是最后的一种。所以我们尤当纪念他”（陈衡哲《纪念但丁》）。陈衡哲也何尝不是这样的人物。“她在少女时代就牢记舅父的话：要‘造命’，在加上历史的胆识，使她对新文化的思想，决不一味求新，赶时髦，也不一味保守。她深知我国文化历史悠久，又必须从文化上改革。但不能全搬西化，那是走不通的，也是历史所不容许的；历史要求我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过去好传统的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吸取人家好的经验，创造我们的命运”（朱维之《陈衡哲散文选集·序》）。新旧文化在她身上激烈的撞击，她虽然没有明确道出两者的融合之道，但是她的这种认识足以警示众人。

《西洋史》是“五四”运动新思潮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出版后，一时之间大有洛阳纸贵之势。当时青年学子，以求得一套《西洋史》为荣耀，商务印书馆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再版了6次（《任鸿隽陈衡哲家书》）。为什么这薄薄的一本历史小书在学界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呢？适之见其著而欣喜其文，叹赏其意，道出真谛：“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野心的著作。在史料方面她不能不倚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然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功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一方面说，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而孙郁先生在给这本书写的推荐序中的一段文字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平静、优雅、爱美者穿越历史的的空间的时候，带给青年的不只是知识与悟性，还有深深的美的趣味，当年阅读此书的人，都多少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即使是今天重读它，那样从容美丽的文本，也非别的著述可以代替的”。

（责任编辑：陈洁琼、孙超）





### 手捧“蔷薇”，抒写一心的爱恋

佚名\*

若今生可得你满身的芬芳，愿来世可以为你续写我未完永远的情愫。

——题记

我的心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爱你是我一辈子的诺言。“蔷薇”的花语是：美丽、圣洁，她表示崇高神圣的爱情，代表了爱的思念。盛开的“蔷薇”给予人对爱情的憧憬，蔷薇就是恋的起始、爱的誓约。



我把“蔷薇”的芬芳藏于心灵的底处，用以吟尽今生宿命里的爱恋。不知何时，已不习惯用擦肩而过来描绘自己的缘分。选择爱你，纵使寂寞包裹着我命运转动的年轮，我依然会像往昔那样对你眷恋着，却未曾改变。你满身的芳香荡涤了我生命中黯淡的底色。低沉、干涩，还有那苍白的时光幻化成你最可爱的笑容；步履、伫望，我已顿神很久，混乱中的我，无力举措，只想携你飘洋过海直到沧海的彼岸。回忆如墨，你的纯真，你的淘气，你的可爱，成为我生命最美的点缀。泛黄的笺成了我，而你则是献于我萧瑟人生的一支朱笔，撰写了我生命年华里的风色，也挥舞了今生韶光的锦瑟。

一袭粉红，一袭蓝色，你用纯真和温柔点燃了我的洒脱，对你的思恋是送给我最幸福的礼物。

只想写点文字记下我的思绪，在纸上落下我一心的爱恋，说与你，心中的“蔷薇”……

想想随笔

（责任编辑：柳文）

### 南开梦里赋南开

李沛\*

今夜无眠，是因为想到了你，想到你淳朴的一切，想到你允公允能的精神，想到了你那平静而又充满生气的校园！你的名字从不华丽，你的声名从不虚浮，你总是那样的质朴，而我却是这样的爱你！我在写下这一个个文字时，眼中包含着泪水，心中充满着感动！并不是因为你曾经和北大、清华组建过西南联大，并不是因为你曾经有“学府北辰”的称号，并不是因为你是千千万万学子憧憬的学校，而仅仅是因为你叫做南开！我的母校！不管过去，现

\* 佚名（作者笔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 李沛，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在，还是未来！

记得知道你的时候，是在我懵懂的少年。那一次读到一篇小小的文章，虽然隔了十几年，文章的题目早已忘却，但我却永远记得这篇文章让我知道了你——南开，周总理的母校。于是，我有了一个南开梦，从此我便痴迷于你！

为了这个梦，我在进入高中的第一天，便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上了我三年的梦——考入南开大学！为了这个梦，我毅然撕掉了另一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进入了让我沉默一年的补习生涯！为了这个梦，在2006年的夏季，我用颤抖的手和激动的眼泪，填下了唯一的志愿——南开大学！为了这个梦，我离开小山村，提着行李走出了大山，走向了你——南开大学！当我走到你的怀抱时，我以为，从此我便圆了梦。但是从入学的那一天，你教会我唱“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这几句校歌时，我便知道，我才刚刚开始我一生的南开梦！

我的梦中清晰的记得，大中路旁的杨柳与蝉鸣；我的梦中清晰的记得，新开湖边苦读的身影；我的梦中清晰的记得，小影河畔朋友的畅谈与争论……太多太多的记忆，我无法一一列举，每一次怀念都会让我心潮澎湃，都会让我充满温暖。我多想再在总理像前，仰望着总理，献一束鲜花；我多想再在敬业广场，席地而坐，拿着一本好书，仰望春天里空中的风筝；我多想再在南开园中，迎着朝阳，骑着车子，和着这匆匆的人流，去图书馆、去二主楼，看一天好书，听一天好课……我有太多太多的再想，虽然我用了最美的四年呆在你的身旁，但是还不够，还不够……

我的南开梦啊，我知道这一辈子都完成不了！你给予我的太多太多，你留给我的太多太多！当我在你身边的时候，我没有感受到，我是如此的爱你！直到离开的那一天，再回头看看赫然醒目的写着“南开大学”四个字的校门，我流下了不舍的眼泪，此刻我才明白，我是多么的不舍！此刻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我才真正的明白，“我是爱南开的”这句话真正的含义！也只有离开你之后，我才知道你有多么大的魅力，多么广的情怀！我才明白了，什么是南开的道路，南开的品格，南开的精神！我才体会到“南开永远年青”这句话的真谛！

我的南开梦啊，你叫我如何能醒来？因为，这所学校的先贤曾说过：怕难的不必来，求安逸的不必来，好奉承的不必来，服了这口气的不必来。这所曾被日寇夷为平地却越“难”越“开”的学校，具有何等的精神！我更不会忘记，1919级62号南开大学文科首期学生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求学志向，具有何等的胸襟与气魄！

这个梦太久太久，我已无法醒来，我也永远不愿意醒来。因为，美丽的南开是我的家，我愿意用青春伴随她；因为，美丽的南开是我的家，我愿意用一生去爱她！请允许我再对你大声的说一声：“我是爱南开的！”

书于2011年5月19日凌晨

（责任编辑：纪媛楠、李婷）



### 心痛因不舍，江湖终无奈

王娟\*

考研岁月已离我们渐行渐远，曾经的昂扬青春亦已无迹可寻。回首当年，一切皆还历历在目……谨以此 CXR 小传纪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套用 CXR 的一句话：“心痛因不舍，江湖终无奈”。

——题记



说起 CXR，就会联想到“江湖”；看到“江湖”二字，就会想起 CXR。在我的想象中，CXR 即江湖中一位倚剑长啸、飘逸非凡、洞察世事却又刻意漠视的少侠！最喜欢看他的个签，总是离不开“江湖”这个主题，总有那么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总让人唏嘘不已。我们曾在餐桌上讨论过 CXR 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会说些什么呢？我说肯定离不开“江湖”二字，可能会释然地说一句“江湖终归梦一场”；菜鸟说 CXR 会摇着头说：“罢了罢了，不说了不说了……”哈哈，还是老菜了解 CXR 啊！

我们班的 Q 群里，只要 CXR 冒了泡，势必卷起一股布袋潮，无休止的图片在默默地宣告着 CXR 的活跃存在。据说他是一个超级布袋戏迷，十几年如一日地专注着布袋戏，且自得其中。这是 CXR 最让我仰慕且羡慕的地方，他对布袋戏的专一、执着和热情彰显着他的人格

\* 王娟，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魅力，而十几年的布袋戏无疑已成为他的巨大精神财富，必将对他的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可钦可敬啊！

对 CXR 最初的印象是在大一的时候，听闻 CXR 会写诗，着实让我吃了一惊。那时候就感觉他一定有很多很多为我所不知的潜质。果然，CXR 那“标准”的广东普通话总能让我们的课堂活跃起来，他强悍的计算机技能将我们的课堂 PPT 技术竞争推向了高潮，他那直率而又幽默的言语总是笑死人不偿命的……CXR，果然很了得呢！

真正开始了解 CXR 是考校内专八那天。考完试后，我、菜鸟、CXR、Tony 一起去“哈尔滨”大吃了一顿，之后我和 CXR 一起回南校。那天的一线迟迟不开，我们就在洗车场避雨兼等车，然后就聊开了。其间我感受到了 CXR 超脱而又实在的人生态度。那时候我才认识到，CXR 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广东佛山男人，他习惯并钟爱着广东的本土菜式、本土生活方式、本土气候、本土环境，不愿意踏出广东省半步，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粤味”，着实非常可爱。那天我才知道 CXR 要考研，要考暨大的国际关系，于是我们就探讨了一番，虽然那天我没说出来，但我心里真的一直相信他能考上呢，应该是一种直觉吧。

从此之后，跟 CXR 的接触就多了起来，要么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要么是去饭堂的途中。剑兄、肥镇、CXR、菜鸟、勤哥、大番薯都算是我的研友了吧，虽然他们都在二四，而我在二楼。跟他们一起调侃的时候应该是我考研期间最放松、最快乐的时光了，现在想起来依然很怀念。还记得 CXR 在饭桌上即兴想象我们的未来，说我将来去朝鲜刺杀金正日失败被押入死牢，菜鸟作为驻朝大使展开紧急援救，待他进入死牢一看是老同学我，随即掉头就走，还说原是娟王啊，不救不救~~CXR 因此被我们群起而攻之，于是他改了剧本，说菜鸟展开紧急救援，结果也被金正日押入死牢，于是我和老菜在牢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时剑某人主席念同学旧情，亲赴朝鲜找金正日谈判，说如若不放二人，他即刻号召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发起对朝战争！强悍！孰料菜鸟说，“我居然沦落到要剑某人来搭救？！呜呼哀哉！宁可一头撞死！”~~于是老菜死了，我们的午餐也结束了~~

在考研资料中痛苦挣扎的我，常常一抬头就会看到来二楼打水的 CXR 和菜鸟，那种感觉就像是深陷绝望之中的我见到了久违的亲人，总会兴奋一番。而 CXR 总是那么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地挥着手跟我打招呼。于是我枯燥的考研生活因为有了这么一群活宝而有了一丝阳光、一份期盼。初试成绩即将出来之际，我和 CXR 常在 Q 上纠结，都很不安很担忧。原来我们都面临着来自家人的压力，主要是害怕他们失望。正如 CXR 所说，一直以来都走得太顺当了，所以他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你就是应该考上的，天佑我们啊！真的很感谢你，CXR，陪我一路走过来了。同样感激你们，我亲爱的好友们。剑兄和肥镇今年终于如愿，真是天道酬勤啊！至于菜鸟，未来的外交官，我会去北京找你的哦！勤哥，以后我回广州了你要开着你的奥迪来接我哈！大番薯，过去、现在、未来都看好你！CXR，你就如愿留守广东啦，在暨大好好干哈，你我切勿相忘于江湖啊！

此时此刻，真希望时光能够倒流，回到考研的那段日子，可以每天看到你们，嬉笑怒骂也是一种幸福啊！只是一切已成过往……

罢了罢了，不说了不说了~~

（责任编辑：纪媛楠、李婷）





### 永远的毛瑟

田艺伟\*

毛瑟（Mauser）这个名字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连毛泽东赞扬丁玲的诗词之中也将丁玲的文章与毛瑟做比，所谓“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不仅在中国，在整个世界里毛瑟的名号也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也是先进武器的象征。

毛瑟并不是指一个人，而是一对兄弟，彼得·保罗·毛瑟（Peter Paul Mauser）和威廉·毛瑟（Wilhelm Mauser）。毛瑟兄弟出生在一个枪械工人的家庭，可谓耳濡目染，日久于心。他们曾在军队中服役，对于枪械了如指掌，并且清楚士兵需要什么样的武器。1867年，毛瑟兄弟发明了著名的“毛瑟”式自动枪机，也是最早的旋转后拉式枪机。这种毛瑟枪机直至今日仍旧是许多运动步枪的核心技术。

有了毛瑟步枪就有了强大军队的基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登基之后，重整军备，建立了新式的陆军。而德皇陆军所采购的第一种毛瑟步枪就是毛瑟 1871 式步枪，这种步枪虽然每次只能装填射击一发子弹，但照比过去的步枪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然而技术的进步导致枪械的发展，随着无烟发射药被采用，制造较小口径的子弹成为可能。由于战斗程度变得日益激烈，装一打一的 1871 式步枪已经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于是毛瑟将原有毛瑟步枪和曼利彻尔步枪的优点融合起来，发明了拥有五发弹仓的新型步枪，Gew88 式步枪（Gew 是德文步枪 Gewehr 的缩写）。这种步枪是世界上第一种采用 7.92 毫米无底缘子弹的步枪，也是毛瑟自动步枪的基本标志之一。除此之外，Gew88 式步枪利用五发桥夹装填的弹仓使德国步兵手中的武器第一次具备了连续射击的能力，单兵的火力密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作为天才的设计师，毛瑟不会就此止步。成功的 Gew88 式步枪给后续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毛瑟兄弟公司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设计出了他们的封官之作，也是最为著名、最为成功的一款步枪，这就是 Gew98 式步枪。

Gew98 式步枪承袭了经典的经过改进的毛瑟旋转后拉枪机，采用与 Gew88 式步枪相似的内藏式五发装弹仓供弹，利用桥夹进行装填。这种步枪设计完善、制作精良，便于保养。即便使用者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和教育，也可以驾轻就熟地操作这款武器。一旦 Gew98 式步枪被优秀射手所使用，那么它的有效杀伤距离可达 1000 米，可谓是一款优秀的战斗步枪。就是这种步枪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皇陆军的标准装备。在战斗中，装备有 Gewehr98 式步枪的德军给法军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当时法军仍将刺刀视为勒贝尔步枪的最重要配件）。

毛瑟步枪的成功令世界所瞩目，大批订单飞向德国，同时利用毛瑟枪机原理设计的步枪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世界各地都可以发现毛瑟步枪主宰战场的身影。

毛瑟步枪性能虽然优异，但有一个大麻烦是不得不认真面对的。这个问题就是毛瑟步枪太长了，在有限的空间里携带和使用都极为不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皇陆军士兵在堑壕之中就饱受其苦，而炮兵和骑兵就更不用说了，长长的步枪经常在他们的身上磕磕碰碰，

\* 田艺伟，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影响了正常的战术动作。因此，部队急需一款枪身较短，威力又相近的新式特供步枪，这一需求催生了毛瑟“卡宾枪”（其实只是一款枪身稍短的标准步枪）。这种似乎仅仅是标准步枪改型的 Karabiner98a 步枪（简称 Kar98a）却开启了毛瑟步枪名垂青史的一页。

Kar98 步枪从外观上与原始的 Gew98 最显著的不同是长度较短并且枪栓拉柄下弯。这两个不同点的共同目的就是为了让士兵更方便地进行操作。1933 年希特勒上台之后，魏玛帝国防卫军（Reichswehr）被更名为德国国防军（Wehrmacht），全新的备战扩军计划几乎在一夜之间拉开。作为步兵主要武器的步枪更是重中之重。重新改进设计的 Kar98 步枪被定为陆军标准步枪，并被命名为 7.92mm Karabiner 98 kurz，也就是 7.92 毫米口径 Kar98 式短步枪的意思，一般简称为 Kar98k 步枪。此后，毛瑟 Kar98k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直是德国军队的主要武器，即使是后来产生了突破性的突击步枪 StG44，Kar98k 步枪的地位也从未发生过改变，总产量在 1938 年就达到了 1693811 支，随着战争的进行，简化工作也不断加强，产量就更为可观了。除了普通型 Kar98k 步枪，狙击型的 Kar98ZF 在战争期间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成为毛瑟步枪最为耀眼的明星。

（责任编辑：田艺伟）

## 中国是否适合造航母？

马新伟\*

最近这段时间国内外围绕着中国“瓦良格”号航母热议纷纷。先是有中国第四代隐身战斗机歼 20 试训照片外泄，后来时不时有中国航母在大连造船厂的改装照片在网络上被发布，最近一家日本媒体甚至爆料称前些阶段中国的新型舰载机歼 18 在内蒙古的试飞的消息，等等。尽管这些信息目前均尚未获得中国官方的正式承认，可是好像大家对这一切都已默认似的，似乎这个消息就像是公开的秘密。尽管如此，今天我还是要在此试图大胆地谈谈中国是不是应该发展航母这个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首先谈下航母的作用问题。

航空母舰（Aircraft Carrier），简称“航母”，是一种可以提供军用飞机起飞和降落的军舰。航空母舰是一种以舰载机为主要作战武器的大型水面舰艇。航空母舰一般总是一支航空母舰舰队中的核心舰船，有时还作为航母舰队的旗舰。舰队中的其它船只为它提供保护和供给。通常一个航母编队一般包括一艘旗舰，两艘



\* 马新伟，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防空巡洋舰，4-6 艘防空反潜驱逐舰，1-2 艘攻击型核潜艇组成。

首先，从其定义可以看出，航母的首要作用就是为作战飞机（舰载机）提供一个流动的机场。这样它就大大地拓展了其飞机的战斗力。众所周知，目前全球只有个别几款战机具备了全球战斗能力（即使具备了这种能力的战机，一方面代价高昂，另一方面更多的是轰炸机而不是战斗机，限制了战机的战斗能力发展，因此不具备大规模布局实施的可能性），因此要想让战斗机极大地发挥其战斗力，必须为其在茫茫大海上提供一个永不沉没的机场。这也是美国能在全世界施展其影响力的主要手段，我想这也是我们国内一些人士一直极力支持发展航母的原因吧。

其次，航母的灵活性。在国际局势千变万化的今天，各类事件在世界各地层出不穷地发生，无论从规模、频率还是从范围来说都可以说是空前的。要应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事件，就需要一件既具备强大战斗力又十分灵活地武器。纵观当今种类纷繁的武器，既有以导弹核武器为代表的强大武器，又有以潜艇和战略轰炸机为代表的灵活性武器。前者虽然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但是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灵活性；后者虽然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但是缺乏强大持久地战斗力（无论潜艇还是战略轰炸机，它们的战斗力持续性均比较弱），而航母却是两者兼而有之。

最后，航母的作用日益综合化。自从航母诞生以来，它承担的作用似乎一直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然而随着时代地变迁，近两年航母在人道救援、灾难救济、打击海盗等非传统安全任务上作用越来越大。从 2005 年东南亚海啸期间美国航母及时送去了大量救援物资，到最近日本的地震海啸及引发核危机中人们随处可见的美国航母的身影，可以说航母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正因为如此，有些人称航母为今天流动的“和平大使”。



俗话说“硬币都有正反两面”，航母也不例外。那我们就来看看航母的消极作用。

首先，航母的花费代价极其高昂。航母作为高技术密集的军事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大量的工程，包括推进、导航、补给等等。况且航母往往

不是作为单独的舰船发挥作用，它还要伴随着反潜、补给、防空，一般要伴随 7 到 10 艘中小型舰只。因此仅仅其造价就极其高昂。据不完全统计，根据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标准，一艘战斗力航母的均价是 20 亿美元。此外，航母的维修保养成本也极其高昂，据美国的有关资料显示，每年均价是 1 亿美元。而这还是对于航母技术成熟的美国而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既缺乏相关技术（主要是推挤系统以及相控阵雷达技术等等）又缺乏制造大型军用舰只相关经验（我国的军用舰只大多吨位保持在 1 万吨以下），并且缺乏稳定外援渠道的国家而言，可以想象，其建造成本会有多高，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其次，隐蔽性不是太好。尽管现在的反潜反导技术还有防空技术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毕竟还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反导技术，就连头号强国美国的技术也是不太稳定，何况其他国家呢！再说到目前为止，航母的防护技术发展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实践论证。以美国为例，我们发现二战之后，美国航母参加的历次战争其对手大多实力较弱，不管其反潜还是防空可以说是没有经过太大的考验，假如其对手是前苏联或现在的俄罗斯，在“花岗岩”反舰导弹的饱和攻击下，美国的航母要想顺利地离开，其困难可想而知。

最后，航母的综合保障措施极其严格。有人说现代战争打的是一场后勤战争，哪个国家后勤保障做得越好，那么其赢得战争的几率就越大。我们可以发现，美国航母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综合性的。导航方面，它有领先全球的 GPS；侦察方面，它有无数的军事侦察卫星，无人机，还有极其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后勤物资保障方面，它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先进的保障船，运输机等等。可以说无论缺了哪个方面，航母的作用都将大打折扣。

纵观上述各个方面，我个人认为对于现今中国而言，最好的方式是储存航母技术，加大与国外先进国家合作的力度，甚至可以做些实验性的技术。但是现在发展自己的成型航母，未免太过仓促。理由如下：

首先，中国的战略需求还没有达到需要航母来作为维护其利益的工具的地步。尽管人们都说，今日的中国利益遍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我们所谓的巨大利益仅仅是与过去几乎“闭关锁国”的状况而言。中国的利益与西方相比还是相对弱小的，并且目前我们的主要麻烦制造者是美国。如果我们想通过造航母来解决问题可以说是缘木求鱼。至于人们经常热议的与东南亚的南海争端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比如中国的中华神盾级驱逐舰、



现代级驱逐舰及建造潜艇和发展先进岸基飞机和运输机及导航定位系统解决等。相反，如果我们过早的发展航母，还可能造成局部地区的军备竞赛甚至动荡。

其次，风险巨大。一，尽管近年来我们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去年一度超过了日本跃居全世界第二，GDP 达到了 14 亿人民币。但是在这个接近 14 亿人口的国度里，面临的问题却层出不穷。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稍不注意，都可能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里，需要用钱的地方数不胜数。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中国的国防政策还是应该保持积极的防御政策，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航母这个项目上花费太多的钱财。二，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发展有战斗力的航母，那么至少得建造 6 艘，





北海舰队 2 艘，东海舰队 2 艘，南海舰队 2 艘（一艘是巡逻值勤另一艘是保养值班），这样才可以充分发挥其威慑作用。这样 6 艘航母在配备相应的扫雷舰，护卫舰，驱逐舰，补给舰等等，可以说其花费绝不是一两年的军费可以解决（这里假设在这一两年内把所有的军费都用在造航母上，实际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在建造航母过程中，因为急于上马而出现问题，那么造成的不仅是巨大经济损失，还会损害一些国防、外交和政治利益。

最后，中国不具备美国那种已有的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其一，从世界军事基地来看，美国就是 19 世纪的日不落帝国，几乎处处都飘着她的星条旗，而中国却不具备这种条件。试想下，如果现今的中国参加推翻的卡扎菲的军事行动，仅仅依靠几条国内发送的补给船，显然是杯水车薪，那时的窘况将会是令人尴尬的。其二，我们建造航母的配套技术的发展还远远落后，如果仓促上马就会有跃进的风险，而且这种技术不是几年能够赶上的，是需要长期积累和探索的。况且我们要发展的航母技术至少不能和美国相差太大，否则就失去了其建造航母应对对象的意义。

因此，在我看来，最近被人热炒的所谓瓦良格号航母不过就是个即将建成的一个大型实验室，我们将从这个实验室里研究探索明日的航母发展，而不是一艘即将奔赴沙场的战将（有完整战斗力的航母）。

（责任编辑：柳文）

### 关于养生的一些鄙见

维一\*

应友人所邀，小生就谈谈自己关于养生的一些看法，基本都是“舶来货”，大部分都停留在理论层面，有些倒也躬身实践过。读者们切勿轻信啊。

#### 一、关于睡眠

养生最重要的就是排毒，排毒最重要的就是靠肾和肝，还有毛孔。所以多喝白开水有利于排毒，因为促进了新陈代谢；所以经常锻炼身体，出汗——尤其在不容易出汗的冬季，有助于人体排毒。

有人说，养生取自“养肾”的谐音，可见，肾在人体排毒过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肾脏功能的健全与否，将会决定一个人的衰老程度，肾脏不好的人，往往表现为体虚多病，疲倦乏力，腰酸脚软，甚至面色憔悴。因此，对肾脏的保养，是养生的第一要义。



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主张通过人体的自平衡系统，来调节各主要经络的虚实。而在

我们所有能做的事情当中，吃和睡是两个最经常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在吃方面，我的看法比

\* 维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较简单，饮食宜清淡，少油少盐，多食蔬菜水果鱼类，少食肉类，在必不可少需要补充蛋白质时，尽量食用高质量的肉类。

而睡眠则是更加重要的方面，因为人体排毒需要在深度睡眠中进行，人体的各个器官也需要在足够的睡眠中完成一天当中的自平衡。因此经常晚睡和缺少睡眠的人，其健康状况一定是堪忧的，尤其是晚睡再加之喝咖啡吃泡面或者酗酒，那就是挑战生命的极限了，其精神无异于极限运动爱好者。

关于睡觉，我最后简单建议一下，人体的最佳排毒时间是从 23 点到凌晨 4 点，因此最好在 23 点以前躺在床上，以保证在 23 点时人体已经进入深睡眠状态。尤其不要在凌晨 12 点到 12 点半之间做任何的工作，哪怕你决定熬夜，这半小时最好也要躺一会。因为这时心脏受到的引力是最大的，人会最累。一般来说，过了 12 点还没睡的话，可以一直熬到凌晨 2 点是不会困的。理论上说，凌晨四点之后就可以起床了，但是为了考虑到心脏的保健，建议还是在 7 点之后起床，但是也不要太晚，因为根据达芬奇睡眠法，如果睡眠时间过长的话，应该会进入睡眠周期曲线的下降区间，也就是负睡眠。最后，睡觉时不要开空调、电扇等设备。睡觉前不宜食用辛辣生冷的食物，因为胃寒是会失眠的。此外，睡前半小时尽量不要说话，尤其是滔滔不绝的侃大山，因为说话会导致肺经动，继而心经动，人就容易进入亢奋状态，导致失眠。还有就是睡觉前，请保证手足温暖，因为手足寒也是会引起失眠的。相反，如果手足暖的话，是有助于入眠的，比如说泡脚。

## 二、关于排毒

### 1、食物

枸杞：每天咀嚼一小把，养肝。

莲子芯泡茶：莲心可以发散心火，虽然有寒性，但不会损伤人体的阳气，不妨再加些竹叶或生甘草，能增强莲子芯的排毒作用。

冬瓜：刺激肾脏增加尿液，排出体内的毒素，食用时可用冬瓜煲汤或清炒，味道尽量淡一些。



山药：可以同时滋补很多脏器，以补肾为主，拔丝山药是很好的一种食用方法，用焦糖“炮制”过的山药，补肾抗毒的功效会相应增强。

### 2、时间表

早上 5~7 点最适合肾脏排毒，早晨毒素都聚集在肾脏，起来喝一杯白水冲刷肾脏。

早上 7 点~9 点肺脏最强，此时最好能够通过运动排毒。在肺最有力的时候进行慢跑等有氧运动，能强健肺排出毒素的功能。

能。

11—13 点是心脏最强的时间，宜吃保心、助排毒的食物，例如茯苓、坚果、黄豆、黑芝麻、小枣、莲子等。

吃完饭 1 小时吃 1 个水果帮助健脾、排毒。

### 3、按穴位



(1) 按压心脏排毒要穴

少府穴：位置在手掌心，第 4、5 掌骨之间，握拳时小指与无名指指端之间，按压这个穴位不妨用些力，左右手交替。

(2) 按压肝脏排毒要穴

涌泉穴：人体最低的穴位，在足底的前 1/3 处(计算时不包括足趾)。这个穴位比较敏感，不要用太大的力度，以边按边揉为佳，持续 5 分钟左右即可，经常按揉，排毒效果明显。

(责任编辑：柳文)



### 国关院举办校友会成立大会 各地校友欢聚一堂

五月的上海繁花似锦，美丽的校园春风和煦。值华师大六十周年校庆之际，5月15日上午，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校友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校友代表大会在理科大楼 A508 召开。华师大副校长范军教授、校长助理杨伟民教授、国关院院长冯绍雷教授和老教师代表周尚文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各行各业的 70 余位校友和部分在校师生参加了大会。成立大会由国关院何明副院长主持。

范军副校长首先强调了建立校友会的重要意义，校友会不仅是各位校友和母校联系的桥梁，还是校友们相互之间交流信息和互相帮助的平台。他还为校友们简单介绍了近年来华师大在办学方面取得的发展。校长助理杨伟民教授代表华师大校友会欢迎各位校友回到母校，并表达了学校对国关院成立校友会的支持。他提到，自华师大校友总会 2002 年成立以来，学校历来十分重视校友工作，将其纳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之中，明确校友工作的定位和思路，不断健全完善校友工作机制，推动校友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冯绍雷院长在致辞中指出，一所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不仅仅取决于她日常的教学、科研等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她的校友在祖国建设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推动社会和谐与进步中所赢得的口碑。他鼓励校友秉承母校“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各自岗位上取得优异成绩，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更为母校增光添彩。周尚文教授则回顾了同学在校学习期间的喜怒哀乐，用温暖的故事拉近了校友们的距离，他希望国关院校友会从无到有，最终发展成为大家喜欢、校友满意的组织。

博士校友代表赵银亮和硕士校友代表段春义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纷纷表达对母校的感恩和美好祝愿。赵银亮饱含深情地说，一生事业的基础是在国关院打下的，在国关院学习的经历是一生拥有的最大财富。段春义表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关注母校的发展，关注校友的进步。

接下来，校友大会推选了赵银亮、段春义、陆迪民、许一欣、张红五位成为首届秘书组成员。随后，许一欣代表秘书组宣读校友会章程，与会校友对章程中的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并提出具体建议。赵银亮向校友大会报告秘书组的工作思路，包括尽快完善校友会组织机构与工作机制、成立校友会通讯并建设网站、组织校友论坛和联谊活动、争取成立校友会发展基金以资助贫困学生等。

最后，何明副院长向与会校友通报了校友会主要活动安排及 10 月即将召开的首届校友论坛，诚挚欢迎校友们届时再次返校并积极参加校友会活动。

（责任编辑：刘佳琪）





### 《闻道》编辑部主办师生课改论坛

课程改革是我院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2010 级硕士研究生作为第一批上《西方政治理论》课程的同学，是幸运的，同学们都切身地感受到收获颇丰，但同时心中也不免有很多困惑和疑虑；同样，作为这门课程的授课老师——邱立波老师和周保巍老师，也有不少想法和心得要跟同学们交流。为此，《闻道》编辑部主办了师生课改交流论坛，为师生的交流建立起一个平台，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增进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共同促进问题的良好解决，同时促使同学们保持学习课程的热忱。

课改交流论坛于 2011 年 5 月 4 日在理科楼 A416 举行。出席并参与此次交流会的还有冯绍雷院长、林佩云书记、于向东老师、何明老师、潘兴明老师、余南平老师、王铁军老师。在交流论坛中，两位任课老师首先针对会前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并进一步和同学们进行了深入交流。之后，参与论坛的同学还与其他参会老师交换了对课改的看法，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最后，林佩云书记和冯绍雷院长分别作了发言和总结。

通过论坛，同学们与老师敞开胸怀，各抒己见，坦诚交流。

（责任编辑：李沛）



### 首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征稿通知

为加强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的交流与学习，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自主发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生《闻道》编辑部承办的首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将于2011年9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提升研究生的学术研究兴趣，拓展学术视野，提升学术研究能力，搭建不同高校研究生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实现不同高校研究生之间资源共享。欢迎四校及其他兄弟院校研究生积极参与，踊跃投稿。

#### 现将论坛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题：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方法

二、时间：2011年9月10-11日

地点：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三、参会对象

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其他兄弟院校国际关系相关专业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优秀的本科生。

四、论坛组织

本次论坛设立由四校代表组成的组委会，并在组委会下设立秘书处。各校组委会代表负责本校论文的征集、评选和推荐工作，秘书处负责其他院校的论文评选和会议的具体组织实施活动。

五、征文与参会要求：

1.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方法”，在论坛主题之下，将设立若干分议题。分议题由各高校根据论坛主题写作论文后分类确立，或根据各高校的意愿向论坛秘书处提出分议题。

2. 请欲主持分议题讨论的高校在2011年6月15日前向论坛秘书处提交主题申请。请四所高校欲提交论文的同学联系所在高校组委会代表，并在2011年7月1日之前向本校的组委会代表提交参会申请回执表和论文提纲，8月20日之前提交论文初稿。四所高校组委会代表将邀请本校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组织评审提交的论文，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向论坛推荐优秀论文参与。8月30日前，论坛秘书处将公布入选优秀论文，入选论文作者将受邀到华东师范大学参加论坛活动，所有论文届时将根据主题及写作内容编入相应的分议题进行交流讨



论。

其他兄弟院校欲参会及提交论文请直接联系论坛秘书处，以便组委会进行安排。

提交论文的同学如对其他分议题有兴趣，还可向论坛秘书处提交发言稿，届时将安排其参与相应分论坛发言讨论。发言稿应包括题目、提纲和主要内容，字数在 3000 字左右。

3.所提交的论文要求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原创性，字数以 10000 字左右为宜，论坛不接收已公开出版或发表的论文。严禁一切形式的剽窃、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

4. 为加强学术规范，行文请参照《世界经济与政治》注释体例。

5.主办方将提供外地参会代表食宿费用，差旅费用由参会代表自行解决。

6.入选论文在会后经修改将汇编成册，优秀论文将推荐在相关领域核心刊物发表。论文作者同时将获赠出版论文集。

## 六、联系方式

1. 分议题申请、拟推荐论文、各高校参会代表报名表回执请提交至会议秘书处，电子邮箱为：[guoguanluntan@yahoo.cn](mailto:guoguanluntan@yahoo.cn)。

2. 本次论坛四高校组委会代表联系方式：

陈冲（南开大学）：电邮：[nkchenchong@gmail.com](mailto:nkchenchong@gmail.com) 电话：1365-2112-775

徐立峰（复旦大学）：电邮：[06307050015@fudan.edu.cn](mailto:06307050015@fudan.edu.cn) 电话：1362-1967-779

张志龙（北京师范大学）：电邮：[yu\\_zhang28@163.com](mailto:yu_zhang28@163.com) 电话：1342-6308-461

李沛（华东师范大学）：电邮：[nklipei@gmail.com](mailto:nklipei@gmail.com) 电话：1880-1626-472

3. 华东师范大学论坛秘书处联系人：

李沛：[nklipei@gmail.com](mailto:nklipei@gmail.com) 电话：1880-1626-472

孙超：[sunchao\\_226@163.com](mailto:sunchao_226@163.com) 电话：1521-4336-517

刘佳琪：[liujiaqi8878@hotmail.com](mailto:liujiaqi8878@hotmail.com) 电话：1592-1548-860

李荟：[jimlihui@hotmail.com](mailto:jimlihui@hotmail.com) 电话：1358-5989-529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年5月25日

附：参会申请回执表



首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报名表

姓名		性别		专业	
学历	<input type="checkbox"/> 本科生		<input type="checkbox"/> 硕士生		<input type="checkbox"/> 博士生
电话		电子邮件			
地址				邮编	
论文（或发言）题目					
是否有意组织专题讨论	是（    ）		否（    ）		
是否有意参与分议题发言	是（    ）		否（    ）		

（责任编辑：李沛）





### 国际关系论文注释体例

(2011年5月第一次修订)

**编者按：**撰写学术论文是研究生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检验研究生学习成果的手段，也是对研究生逻辑思辨能力的锻炼。为了确保论文的原创性，避免产生因漏注、误注导致的误会，规范的引注格式需要从撰写论文之初开始培养。我们从本期开始，将持续刊载本注释体例，旨在为同学们的论文写作提供可靠的参考，帮助大家培养正确的论文写作格式。

本注释体例主要参照了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出版的《俄罗斯研究》杂志，并参考了部分大陆出版的国际政治类杂志如《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等和部分国内高校对论文注释体例的说明以及一些国外出版的大学写作教材。本次修订也参照了罗伟主编的《法律文献引证注释规范（建议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特此向上述出版物的编辑及作者致谢。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杂志对文章注释和标准的要求不一。本体例的编写以参照《俄罗斯研究》的标准为主，并结合其他核心类期刊的体例。

尽管本体例的编写参考了相关已有成果并进行过反复的比对推敲，但肯定还会存在不足之处甚至错误。我们衷心地希望各位老师同学能及时对本体例提出反馈意见，并将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

#### 一、总则

论文的注释均为脚注，每页按顺序重新编号；

注释的中文字体为宋体，外文字体为 Time New Roman，小五号字、单倍行距；

《俄罗斯研究》杂志中用以标注顺序的序号为圆圈内数字，如①②③……标注时，符号置于正文需要进行注释之处的后面，如注释之处须断句，则符号置于断句的标点符号之后。例如：

“在西方加强防御，在东方寻找朋友”被认为是涅夫斯基给自己的后人留下的对外政策遗产，<sup>①</sup>但以此概括涅夫斯基外交并不完整。

政治价值观对决策过程有直接的或间接地制约作用，一定的公共政策总是带着一定的价值观念的。<sup>②</sup>

2010年2月，梅德韦杰夫在访法前夕再次表示：“苏联的社会、它的原则、它的运转和我们自己的选择相去甚远。从根本上来说，我不愿意回到过去。”<sup>③</sup>

#### 二、中文文献注释体例

##### （一）著作

###### 1. 专著

引用文献为中文专著时，标注体例一般为：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名称，XXXX，第X页，句号结尾。如作者为两人以上，用顿号分开。如为连续页数的内容，则标为“第XX—XX页”；如为不同页码内容，则为“第XX页、XX页”。期数、日期、年份、页数均用阿拉伯数字。例如：

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73页。

姚海：《俄罗斯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6—121页。



### 2. 文集

如引文出自文集，作者位置应标明主编或编辑者姓名后加“主编”、“编”等字样；如引文为收录入文集的某篇文章，应在作者前加入：文章作者：“文章名”，逗号结尾。文集编者不明的，可不标出。例如：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48页。

普京：“2006年致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普京文集（2000—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82页。

如引用革命导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全集、文集一般不出现编纂者或组织的名称。例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41—142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

### 3. 译著

如文献作者为外籍人士，须在作者姓名前标注中用半角方括号“[]”并在其中注明其国籍的简称，如“[英]”、“[法]”、“[日]”等。如作者国籍简称不常用或容易引起误会的，则用国家全称，如“[埃及]”、“[阿根廷]”等。书名后需注明译者。例如：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如文献为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出版的中文书刊，标注同上述方法，用简体字标注。例如：

吕亚力：《政治发展》，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47页。

## （二）报刊、杂志文章

一般来说，文献来源是报刊、杂志时采用如下标注方法：作者：“文章名称”，《期刊名称》，XXXX年第X期，第X页，句号结尾；或：作者：“文章名称”，《报刊名称》，XXXX年X月X日，句号结尾；外籍作者标注为：[国籍]作者：“文章名称”，译者，《期刊名称》，XXXX年第X期，第X页，句号结尾；如为编译类文章且无原作者信息，则在作者处标明编译者姓名并加上“编译”；新闻报道可不用标明作者。例如：

娄芳：“论俄罗斯农业转轨与贫困问题”，《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4期，第49—53页。

李晓春：“哈萨克斯坦打造多元能源合作空间”，《环球时报》，2006年2月20日。

[新加坡]郑永年：“中国如何应对国际力量再‘集团化’”，《联合早报》，2009年10月27日。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第二部分会议 胡锦涛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11月23日。

## （三）其他形式文献

其他形式文献包括新闻电讯、会议宣言，文件、政府出版物以及访谈记录、电子图书、磁盘存储介质等，应作如实标注并可参照上述方法。政府出版物及官方文件可不标出作者，法律条文应说明条数。例如：

### 1. 新闻电讯：

张朔：“胡锦涛在联合国讲坛阐述中国新安全观”，中新社纽约2009年9月23日电。



### 2. 官方文件、会议宣言：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第5条（2003.05.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国引渡条约》第5条（1994.03.05）。

《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第8条（商务部令2004年第8号）。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8条第2款（2004修正）。

### 3. 电子、微缩等存储介质：

《北大法宝（专业版）：合同范本库》（CD-ROM），北大英华公司，2004年。

李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讲解”（VCD），第1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

顾昂然：“刑法修改报告”，《国务院公报》，1997年5月25日，第10页，人大微缩胶片，1998：101。

顾昂然：“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合同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法制日报》，1999年3月15日，第2页，中国微缩出版物进出口公司，胶片，2002年。

### 4. 访谈、邮件：

1991年9月13日在吉尔吉斯的比什凯克与伊努拉·埃连巴耶娃（Inura Elebaeva）的对话。

据1992年6月4日在莫斯科所做个人笔记。

罗伟致赵晓海电子邮件：“统一中国法律引用注释标准研讨会会议项”，2004.06.15 北京时间9:30。

### 5. 学位论文、研讨会论文、报告等未公开出版的文件：

张建勋：“论美国在中亚外高加索的战略利益及其制约因素”，新疆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贺卫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学术研讨会论文，西北政法学院法学研究所，2001年9月22—23日，第9—11页。

贺卫方：“撑起中国宪政的九大支柱”，2003年10月28日在南京财经大学的报告，有删改，藏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第3页。

如引用宗教典籍，可采用脚注的方法，也可在引文后标注。如典籍为正式出版物，脚注同上述方法；如为非正式出版物（如《圣经》），则需要注明引用的具体版本。在引文后注则只需注明章节序号，按“（章数：节数）”格式即可。例如：

《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第3—17节（和合本）。（脚注）

《圣经》中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20：3）（引文后注）

《古兰经》说：“准许他们吃佳美的食物，禁戒他们吃污秽的食物。”（7：157）（引文后注）

## 三、外文文献注释体例

外文的注释顺序同中文文献，但标点符号须为英文半角字符。这里仅对英文和俄文文献的引注规范进行说明，其他语言的标注方法可参照相应文献给出的惯例。

### （一）英文文献

#### 1. 专著

专著格式为：作者名（名在前姓在后，中间用空格隔开）. 著作标题（斜体），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YYYY），页数（p. XX/pp. XX—XX/pp. XX, XX）.如果作者为两人以上，须用逗号分开。例如：



James M. Henslin. *Essentials of Sociology*, Boston: Allyn and Bacon, 2004, p.12.

### 2. 文章

报刊、杂志文章的引注格式为：作者名.“文章题目”，*刊物名*（斜体），卷数（Vol.XX），期数（No.XX），页码。例如：

Paul Krugman. “The Angry People”, *The Great Unraveling*, New York: Norton, 2003, pp. 272—274.

“The Silk Road Catches Fire”, *The Economist*, Vol.325, No.7791, 1993, p.32.

### 3. 其他形式文献

其他形式文献包括新闻电讯、会议宣言，文件、政府出版物以及访谈记录、电子图书、磁盘存储介质等，应作如实标注并可参照上述方法。政府出版物及官方文件可不标出作者，例如：

*Funding Your Education 2003—2004*, Washington: Dep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Federal Student Aid, 2003, p. 16.

Lesley Stahl. “Musically Speaking”, 60 Minutes. Report. CBS, 28 Sept. 2003.（新闻报道）

Ann McClintock. Personal interview, 23 June 2004.（访谈）

如引用联合国决议或官方档案，格式宜采用“resolution number（决议号码），issuing organization（发布机构），session number（第\*次会议），supplement containing the resolution（含有决议的补充文件），page cited（引文页），U.N. document number（文件编码）year of resolution（决议年份）”。例如：

G.A. Res. 832, U.N. GAOR, 9<sup>th</sup> Sess., Supp. No.21, at 19, U.N. Doc. A/2890 (1954).

U.N. GAOR, 10<sup>th</sup> Sess., Supp. No.6A, at 5, U.N. Doc. A/2905 (1955).

## （二）俄文文献

注释顺序和体例大体同英文文献。专著的书注格式为：作者名. 文章名.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YYYY），页码（C. XX/CC. XX—XX）。报刊的书注格式为：作者名. 文章名 // 杂志名. YYYY. №X. C. X. 例如：

Владимир Парамонов, Алексей Строгов, Олег Столпов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Бишкек, 2008, С. 155.

Александр Либман. «Интеграция снизу»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2009. №1(2). С.21.

Досым Сагбаем. Эффект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7 марта 2006 г.

## （三）其他语种文献的引用规律可参照英文文献

## 四、重复引用及转引时的注释体例

### （一）重复引用

不论中外文，如多次引用相同的文献，第二次标注时只需标明作者、文章/著作名和页数；如在同一页出现两次以上相同引注文献，第一次之后的引注可简略为“同上书”或“同上文”，后跟逗号加页数，句号结尾。英文文献第一次之后的引注可简略为“Ibid”，后跟逗号加页数，实心句号结尾。若均为同一页，则为“Ibid.”；俄文文献第一次之后的引注可简略为“там же”，后跟逗号加页数，句号结尾。若均为同一页，则为“там же.”。例如：





周定国：“俄罗斯远东七个地名探源”，第8页。

海运、李静杰总主编，许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第180页。

同上书，第8页。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pp. 112—113.

## (二) 转引

如引用部分不是第一手资料，则须同时标明最初出处和转引出处，规范同上，先标注最初出处，句号结尾，后标注转引出处，二者中间用“转引自”（英文为“Quoted in”）或“载”、“摘自”等隔开。

## 五、网络资源注释体例

网络资源的标注格式为：作者：“文章标题”，网站名称，网址（以“http://”开头，多以“.html”结尾），句号结尾。作者为外籍人士或作者不详等问题的标准同上。在一些杂志中，还需要提供资源发布日期（可见于文章首尾）和最后登录日期（即本人最近一次查询该资料的日期），格式为：作者：“文章标题”，网站名称，XXXX年XX月XX日（资源发布日期），网址（最后登录日期：YYYY-MM-DD），句号结尾。例如：

刘歌：“‘金三角’时过境迁”，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5962041.html>，2007年07月09日。

[英]理查德·罗斯、[美]唐·科尔·辛：“反向的民主化：第三波民主的问题”，王正绪译，<http://www.politics.fudan.edu.cn/picture/1535.pdf>。

Katherine Hobson, “Cancer: The Best Tests to Find a Killer”, *USnews.com*, 1 Sept. 2003, <http://www.usnews.com/usnews/issue/archive/030901/20030901041310.php>, assessed on: 9 Oct. 2004.

## 六、图表的注释体例

文章中引用的图表、插图等一般不用脚注，多置于图表的下方，居中，以“来源：”开头，仿宋字体、小五号、单倍行距。其他同上。

## 七、参考文献编写方法

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时须将参考文献列于正文之后，课程论文一般不作要求。本方法供制作学位论文时参考。

### (一) 中文部分

中文文献的编写体例基本与中文注释体例相同，排序规则如下：

1. 中文作者按姓氏拼音排列；
2. 译著按照作者中译名顺序排列；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期刊和文集中的论文须注明起止页码。

例如：

1.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2. 吕亚力：《政治发展》，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3.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吴恩远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4. 姚海：《俄罗斯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5. 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

### (二) 外文部分

1. 第一著作者姓名以姓前名后的顺序书写，姓名以逗号分隔；
2. 以第一著作者英文姓氏顺序排列，首行缩进2字符；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同一作者姓名多次出现则以“——”代替；
5. 期刊和文集集中的论文须注明起止页码。

例如：

Waltz, Kenneth N.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1, 2000, pp.4—41.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班

---

### 征稿启事

**亲爱的同学们：**

世界每天都在变化，世界风云总是变化多端！赶快拿起笔来，用你独特的视角解读当今时事、评说热点话题吧！

读一本书，也许会有百般感触；看一部电影，也许会有久久回味；听一首音乐，也许会有无限共鸣。还等什么呢？写出你的感受，让我们心得齐分享！

如果你爱生活，爱写作，爱记录生命中的点点滴滴，这里将是你书写自我的天地！诗歌、散文、小说、游记……尽情挥洒你的文采吧！

因为，我们不仅欢迎同学们把学术论文贡献出来，一同品味；而且也欢迎同学们把你们点滴的感受，拿手的特长一起拿出来共同分享！

这是一个多元的舞台，这是一个交流的平台，这是一个展示自我的空间！

让我们在这青春年华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起撞击思想的火花！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班刊，我们自己就是主办方！

投稿请发送至：[ggwendao@gmail.com](mailto:ggwendao@gmail.com)

《闻道》编辑部

2011 年 6 月

非 道  
道 不  
也 遠  
人  
遠  
人

姜洪  
二〇二二年六月

编辑部成员





